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58期 | VOL.48 NO.4

4 ·2026

TAIZHOU XUEYUAN XUEBAO

台州学院智能制造（航空工程）学院机械硕士学位点

学院简介



智能制造（航空工程）学院外景

智能制造（航空工程）学院是台州学院最早设立的工科院系之一，前身为机械工程学院，办学伊始为机电工程系。学院现有机械、能源动力2个硕士学位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杰克卓越工程师班）、智能制造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等5个本科专业。学院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智能制造、机械设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和航空无人机等领域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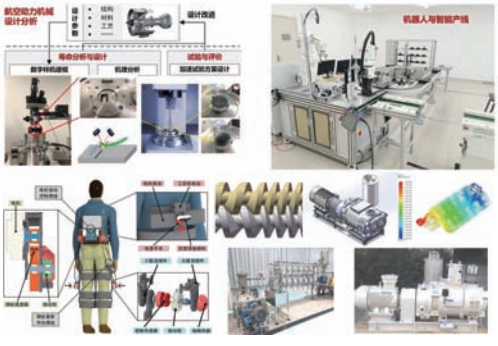
学位点情况

机械硕士学位点是台州学院首批专业硕士学位点，设有机械工程、智能制造技术2个招生专业。

学位点培养方向：1.“数字化设计制造”方向：研究机械零部件及产品的数字化设计、制造、运行管理等理论与技术，包括各类机电产品及零部件、高性能流体机械多场耦合、机器人结构等数字化设计成型制造新技术，产品及零部件疲劳与可靠性等。2.“机电一体化与智能控制”方向：研究机电装备的系统集成、传感与检测、机器人及应用、智能控制等理论与技术，包括高端装备及复杂成套机电系统的智能控制、机器人协作、多源信息融合与监测等。3.“智能产线开发与运用”方向：研究智能生产车间的规划设计与智能产线关键技术，涉及模式识别、物联网、智能检测、生产智能化信息化管理等理论与技术，包括先进制造、精益管理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融合。4.“面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网络协同制造”方向：研究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理论及在工业制造领域的应用，包括网络协同制造、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决策等。



与玉环市人民政府签约
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学位点部分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

台州学院学报

04
Vol.48 No.4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总第258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知网全文收录期刊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韩得满
Editor- in- chief Han Dema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317000
Postcode

网址 https://journal.tzc.edu.cn
The URL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 (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xbb@tzc.edu.cn
E- mail

电话 0576- 85137169
Tel.

目次

科学技术史

欲识庐山真面目，还须身在此山中
——来自杨振宁等著名物理学家的重要科技史料 ……厚宇德 | 01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化的实践 ……段海龙，杨 帆 | 08
从“志”到“学”：洋务运动时期从新兴志书到引进科学的知识转型
……许晓东 | 17
笔与水：中国传统书写工具使用三议 ……李春桃 | 25

和合文化

和合之道的东亚涵泳之范：崔致远“致中和”的三重视域与文化史价值 ……李建军 | 33
试述王弼的和合思想 ……李勇强 | 4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血色将至》：从文学自然主义到影像自然主义 ……王 欣 | 49

期刊基本参数：CN33-1306/Z*1979*b*A4*92*zh*P*￥12.00*700*12*2026-08

现象学视域下《老人与海》的超越之途

——从具身搏斗到本真照面的存在论阐释 ……樊佳奇 | 56

在解构之后如何言说共同体？

——米勒“复数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边界 ……杨 奇 | 63

传 播

双路径视角下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HSM模型的实证分析 ……曾绚琦，汪曙华，吴湘湘 | 70

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宋宗佩，白 亮 | 82

书 评

说汉字字源，解汉字文化

——评邱龙升《字源识字》 ……单志鹏，史晓丹 | 88

本期责任编辑：邵凯云 尚光辉 赵远远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Vol.48 No.4 Aug. 2026

CONTENTS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Appearance of Mount Lu, One Must be Within it

—Important Materi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Famous Physicists Such as Chen-Ning Yang and Others……Hou Yude | 01

Standardization of China's Railway Techn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an Hailong, Yang Fan | 08

From "Zhi" to "Xue":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merging "*Zhi Shu*"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Dur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Xu Xiaodong | 17

Writing Brush and Water: Three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ing Tools …Li Chuntao | 25

The East Asian Exemplar of Immersion in the Harmony Doctrine: On the Three Perspectives and Cultural Historical Value of Cui Zhiyuan's "Attaining Moderation" ……Li Jianjun | 33

An Analysis of Wang Bi's Thought of Harmony ……Li Yongqiang | 41

There Will Be Blood: From Literary Naturalism to Cinematic Naturalism ……Wang Xin | 49

The Path of Transcendence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from Embodied Struggle to Authentic Encounter ……Fan Jiaqi | 56

How Can We Speak of Community After Deconstructi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imits of Hillis Miller's Concept of "Plural Communities"……Yang Qi | 63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Among Chinese Podcast Users from a Dual-Path Perspec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Zeng Xuanqi, Wang Shuhua, Wu Xiangxiang | 70

A Study on Female Image Construction in Sports Media Communication……Song Zongpei, Bai Liang | 82

Trac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erpreting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 Review of Qiu Longsheng's *Zi Yuan Shi Zi* ……Shan Zhipeng, Shi Xiaodan | 88

英文翻译：祝 英

欲识庐山真面目,还须身在此山中

——来自杨振宁等著名物理学家的重要科技史料

厚宇德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包括记述重要历史事件、描写重要历史人物并恰当评价其特点及历史贡献诸项。物理学史类著述的撰写亦遵循类似的内容选择与累积原则。在物理学史料中,有两类史料特别重要而珍贵:一类是那些彼此有过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的著名物理学家,所留下的关于对方的回忆与客观评价;另一类是由那些对其他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风格及贡献做过专业而透彻研究的物理学家,所撰写的恰当的评价性著述。诸如杨振宁、德累斯顿和费曼对费米的评价,费米、杨振宁和费曼对玻尔的评价,以及杨振宁早年和晚年对费曼的不同评价,这些内容对于深入理解20世纪极为重要的科学人物与相关历史,具有常见物理学史著述难以企及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杨振宁;德累斯顿;费曼;费米;玻尔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1

学术稿件处理要尊重同行审稿意见,科研课题审批主要依靠同行评议,诺贝尔奖的评选也要基于同行评议与举荐。如果一位科学家与另外一位科学家有深入的交往,或对其科研工作有透彻的研究,那么这位科学家对后者及其科研工作的客观评价,将为科学史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史料。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涉及杨振宁、德累斯顿和费曼对费米的评价,费米、杨振宁和费曼对玻尔的评价,以及杨振宁早年和晚年对费曼的不同评价。而其他物理学家对杨振宁的评价需择机再做专述。在正文开始之前有必要阐明一个有助于理解本文内容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在后爱因斯坦时代的美国物理界,威望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本文提到的两位核心人物——费米和费曼。费米靠他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折服了整个美国物理学家群体;费曼则通过电台、电视及他本人的通俗著述,使其影响力辐射全社会,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行事低调的费米对美国物理界的深刻影响,在下文杨振宁、德累斯顿、费曼对他的评价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一、杨振宁、德累斯顿和费曼对费米的评价

费米不是杨振宁的博士指导教授,但是他对杨振宁的影响却超越了包括其博导特勒在内的众多物理学家。费米是德累斯顿深入研究过的几位物理学家之一。费曼在年轻且气盛的时期,与费米有过直接而深入的接触。这三个人从不同的视角对费米及其学术思想和风格的回忆、描述和提炼,互相补充且生动地勾画出了科学大师费米的灵动形象。

(一)杨振宁对费米的评价

杨振宁对费米及费米学术观点的描述,基本是从学生回忆和描写老师的视角展开的,重在强调他从费米教授那里获得的巨大教益,从而向中国物理界介绍先进的物理学研究理念。诸如:“我

收稿日期:2025-12-21

作者简介:厚宇德(1963—),黑龙江明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物理学史、古代科技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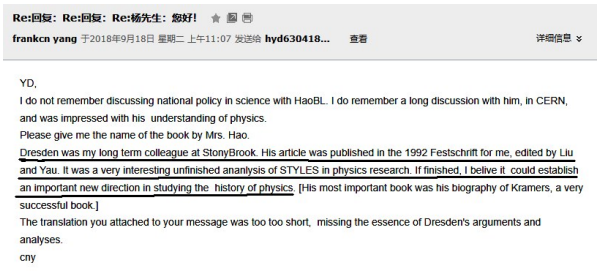
在做学生时，受到费米的影响非常之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物理不是形式化的东西。”[1]531再如：“费米对于‘什么是物理，什么不是物理’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观念。他认为太多形式化的东西不是不可能出物理，只是出物理的可能性常常很小，因为它有闭门造车的危险。而跟实际接触的物理才是能够长期站得住脚的物理。我后来对于物理的价值观念是深深受到了费米的影响的。”[1]532杨振宁也曾尝试用言简意赅的词语去揭示费米物理学的特征：“费米给人的最重要的感觉是什么？他的物理是怎样的物理？我认为费米的物理可以说是‘厚实’。”[1]536杨振宁对费米及其思想的诸多深入认识几乎都来自他对费米课堂教诲的总结：“你去听他的课会有同样的感受。他所讲的总是从实际现象开始，用简单的方法描述出来。你仔细地琢磨就会发现，有时候有非常重要的大的规律在里面，而这个规律却永远不是他开始的地方。”[1]533

费米不仅仅是杨振宁重要的科学引路人，也是杨振宁的人生导师和榜样：“恩芮科·费米是20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崇拜者之一。他之所以受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2]从杨振宁描写费米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位前辈浓浓的尊敬、钦佩和怀念。

（二）德累斯顿笔下费米的学术风格及影响

在《杨振宁：20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一书中，有马克斯·德累斯顿的一篇文章——《试论物理学中的风格和品位》。在文中，他认为把费米和海森堡作对比研究是恰当的：“要选择本世纪（20世纪）上半叶一对较有影响的物理学家来进行比较，费米和海森堡是最合适不过了。”[3]170这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杨振宁对德累斯顿这一视角的物理学史研究，有过高度的认可和好评。在2018年9月18日写给笔者的信函中，他对此表达得非常清晰：“德累斯顿很长时间是我在石溪的同事。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2年我70岁纪念文集中。这本文集是由刘兆玄和丘成桐编辑的。德累斯顿的工作非常有趣，但却是未能完成的对物理学研究风格的分析。如果他的这一工作彻底做好，我想它会为物理学史研究开辟一个重要的新方向。”（见图1）


Re:回复: Re:回复: Re:杨先生: 您好!

frankcn yang 于2018年9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11:07 发送给 hyd630418... 查看 详细信息

YD,
I do not remember discussing national policy in science with HaoBL. I do remember a long discussion with him, in CERN, and was impressed with his 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Please give me the name of the book by Mrs. Hao.
Dresden was my long term colleague at StonyBrook. 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 1992 Festschrift for me, edited by Liu and Yau.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unfinished ananlysis of STYLES in physics research. If finished, I belive it could establish an important new direction i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physics. [His most important book was his biography of Kramers, a very successful book.]
The translation you attached to your message was too too short, missing the essence of Dresden's arguments and analyses.
cny

图1 杨振宁评价德累斯顿的物理学史研究工作的信函

德累斯顿自己并未说这篇文章是未曾做完的工作，不过他说过这样的话：该论文是对“正在进行的研究初步的、几乎是临时性的报告。但是它所包罗的信息应足以显示，在物理学界对个人的品位、风格与所完成研究类型之间公认的模糊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是重要的和值得的”[3]146–147。杨先生这么讲的原因是，对物理学家研究风格做一对一的对比研究时，德累斯顿只研究了费米和海森堡、杨振宁和乌伦贝克这两对；按照杨先生的想法，这个工作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开来。

德累斯顿抓住了费米学术风格的最大特点（这可能是他的文章得到杨振宁盛赞的原因之一），也是费米有别于海森堡和下文所提玻尔等人之处：“费米从来不用哲学。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森堡越来越为他的物理学研究方向寻找哲学上的合理性。费米对自己迅速处理任何物理学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如何特别、实用或不重要）的杰出能力感到自满自足。海森堡看来从未对这类问题特别感兴趣。他宁可把注意力集中到更为基础、深刻的问题上。”[3]171德累斯顿从选题兴趣的角度展示了两人明显的不同：费米对于各类具体的物理学问题兴趣盎然，并一贯不借助哲学就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而海森堡则越来越依靠哲学的理性思考去寻找研究的内容。两人不同的研究趣味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费米看来，“粒子物理要能够取得进展，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经过仔细分析的实验事实获得新的信息，按照费米的意见，现在不是坐等雄伟壮观或大统一的时候，首先是要知道所研究对象的性质”[3]174。与费米截然不同，“海森堡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使用任何已有的实验信息，作为建立基本结构的输入项，以便寻求隐藏得更深从而也是更普遍的那些原理”[3]174。这意味着，在期待和追求的研究成果形式上，费米追求的是透彻认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物理现象，而海森堡则追求建立统一理论或普遍

性原理。总之，不同的科研趣味和价值观使得两人风格愈发迥异：海森堡的风格“变得更为抽象和哲学化”[3]174；“费米变得更为多样化，对抽象的推测越来越没有耐心。海森堡则……很少关心新现象，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创建最终统一理论的努力上去”[3]175。

德累斯顿之所以在文中首先把费米和海森堡做重点对比分析，是因为两人的学术风格具有超越自我的影响力。两人实际上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物理学和欧洲物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个性和风格反映的是欧美物理学的根本区别和对立：“海森堡（还有泡利和许多欧洲物理学家）不能相信，在物理学方面美国不但同欧洲并驾齐驱，甚至可能超过后者。在欧洲，美国的物理学家常常被斥之为没有哲学的和实用主义的。欧洲人认为，美国的物理学忽略了一切真正深邃的问题，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实用的工程技术方面去。”[3]175即使我们暂时不论证“美国物理学有别于欧洲的特点完全是因为费米的影响而塑型的”这一观点，退一步说，认为“费米将这种美国物理学风格推至巅峰”，这大体是中肯的。这一点德累斯顿以他的方式有所揭示：“欧洲和美国物理学家之间还存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紧张关系，体现在两个占领导地位的主要人物费米和海森堡身上。”[3]176德累斯顿从一个特殊视角展示了费米对美国物理界的重要影响，以及费米在美国物理界的地位。

中国物理界对费米在美国物理界的崇高地位可能感受有限，因此有必要引用其他作者的相关结论略作说明。《恩里克·费米和现代物理学革命》一书（见图2）的作者曾说：“超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物理学家，费米的名字和成就最为经久不衰。”（原文：“More than any physicist of our time,Fermi's name and works live on.”[4]107）他给出了几个费米不朽的证据：在美国芝加哥附近，屹立着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简称费米实验室，Fermilab）；在芝加哥大学有恩里克·费米研究所（The Enrico Fermi Institute）；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设立一项国际奖——费米奖（Enrico Fermi Award），奖金为32.5万美元；1955年第100号化学元素命名为Fermium（镄），以此纪念费米；在意大利物理学会的暑期学校也以费米的名字命名[4]107-109。杨振宁在回顾费米的贡献时提到以费米名字命名的有：费米分布、费米球、费米液体、费米子、托马斯-费米方法、费米的β-衰变理论等。要研究20世纪美国物理学史，就不能忽视二战期间这个意大利移民物理学家的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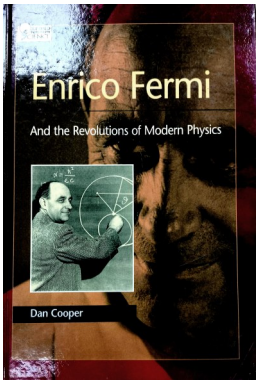


图2　《恩里克·费米和现代物理学革命》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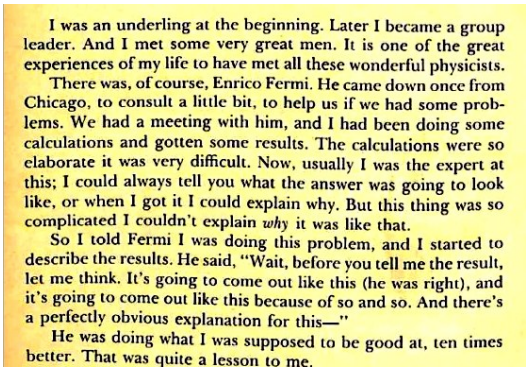
（三）费曼眼里的费米

费曼在著述（见图3）中回忆道，在曼哈顿参与研制原子弹期间，他结识了很多终生难忘的出色物理学家[5]132。他首先回忆到的就是费米：

这些人中当然有恩里克·费米。他有一次从芝加哥过来，了解我们的研究中是否有些什么问题需要他的帮助。我们会见了他。那时我正在做些计算工作，并且已经得到了一些结果。这个计算十分复杂、非常困难。现在说来，一般认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总是能告诉你估计答案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当我得出答案后，我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当时我面临的）这个计算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它是那样的结果。于是我告诉费米我正在研究的问题，并开始要描述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等，在你告诉我结果前，让我考虑一下。结果应该是这样的（他说的正确），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还因为这个。因此，对此有个完美且显而易见的解释……”在我认为自己擅长的地方，他做得比我要好上十倍。对我而言这是很难忘的一课。[5]132（这段文字的英语原文见图4。）



图3　费曼著作封面



I was an underling at the beginning. Later I became a group leader. And I met some very great men. It is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my life to have met all these wonderful physicists.

There was, of course, Enrico Fermi. He came down once from Chicago, to consult a little bit, to help us if we had some problems. We had a meeting with him, and I had been doing some calculations and gotten some results. The calculations were so elaborate it was very difficult. Now, usually I was the expert at this; I could always tell you what the answer was going to look like, or when I got it I could explain why. But this thing was so complicated I couldn't explain *why* it was like that.

So I told Fermi I was doing this problem, and I started to describe the results. He said, "Wait, before you tell me the result, let me think. It's going to come out like this (he was right), and it's going to come out like this because of so and so. And there's a perfectly obvious explanation for this—"

He was doing what I was supposed to be good at, ten times better. That was quite a lesson to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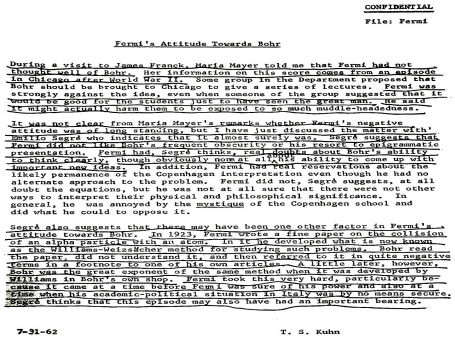
图4 费曼回忆费米的英语原文

通过费米快速、正确地解决一个在费曼看来极为复杂、十分困难的问题，并给出完美解释的事例，费曼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费米作为一位专业能力超强、异常睿智的物理学家形象，他本人也少有地为之折服。费曼通过自己的所见，基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让读者充分领略了杨振宁和德累斯顿所描述的费米在物理学上的效能和威力。我们由此也能感受到费米在物理学方面的造诣之精湛、功力之扎实，很多物理学难题在他面前，可转瞬迎刃而解。

二、费米、杨振宁和费曼对玻尔的评价

(一)费米对玻尔的态度

在托马斯·库恩领衔建立的量子物理学历史档案资料(Archives for the History of Quantum Physics)里有关费米的文件中，有一页题目为《费米对玻尔的态度》。这页文件题目的右上角，醒目地大写着“机密”(CONFIDENTIAL)一词；文件的最后，标有撰写这页文件的年月日以及库恩的落款(见图5)，足见库恩对这页文件内容的重视程度。



CONFIDENTIAL
File: Fermi

Fermi's Attitude Towards Bohr

During a visit to James Franck, Maria Mayer told me that Fermi had not thought well of Bohr. Her information on this score comes from an episode in Chicago after World War II. Some group in the Department proposed that Bohr should be brought to Chicago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Fermi was strongly against the idea, even when someone of the group suggested that it would be good for the students just to have seen the great man. He said it might actually harm them to be exposed to so much muddle-headedness.

It was not clear from Maria Mayer's remarks whether Fermi's negative attitude was of long standing, but I have just discussed the matter with Emilio Segrè who indicates that it almost surely was. Segrè suggests that Fermi did not like Bohr's frequent obscurity or his resort to epigrammatic presentation. Fermi had, Segrè thinks, real doubts about Bohr's ability to think clearly, though obviously none at all of his ability to come up with important new ideas. In addition, Fermi had real reservations about the likely permanence of the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even though he had no alternate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Fermi did not, Segrè suggests, at all doubt the equations, but he was not at all sure that there were not other ways to interpret their phys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In general, he was annoyed by the mystique of the Copenhagen school and did what he could to oppose it.

Segrè also suggests that there may have been one other factor in Fermi's attitude towards Bohr. In 1923, Fermi wrote a fine paper on the collision of an alpha particle with an atom. In it he developed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Williams-Weizsäcker method for studying such problems. Bohr read the paper, did not understand it, and then referred to it in quite negative terms in a footnote to one of his own articles. A little later, however, Bohr was the great exponent of the same method when it was developed by Williams in Bohr's own shop. Fermi took this very hard, particularly because it came at a time before Fermi was sure of his power and also at a time when his academic-political situation in Italy was by no means secure. Segrè thinks that this episode may also have had an important bearing.

7-31-62 T. S. Kuhn

图5 库恩建立的档案资料中一份机密文件的复印本

这一页文件的具体内容可大致翻译如下：

有一次去拜访詹姆斯·弗兰克时，(他的同事)玛丽亚·迈耶告诉我，费米对玻尔评价不高。她所掌握的关于这一话题的信息来自二战后在芝加哥(大学)发生的一件插曲。(物理)系里有人提议请玻尔到芝加哥大学做一系列讲座。费米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即便有人提出哪怕仅仅是让学生们见见这位伟人也是难得的好事时，他仍表示反对。他说，让学生们接触(玻尔)这么多的混乱思想，事实上只能对学生造成伤害。

从玛丽亚·迈耶的话里，无法判断费米是否一贯如此对玻尔持有这种否定态度。但我刚刚和埃米利奥·塞格雷(费米昔日的学生，诺奖得主)讨论了此事，他认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态度由来已久。塞格雷认为，费米不喜欢玻尔经常性的晦涩难懂的表述方式，也不喜欢他那种爱用警句式的说话习惯。塞格雷觉得，费米确实质疑玻尔是否具有清晰思考的能力，尽管他承认玻尔曾提出过重要的新思想。此外，费米对哥本哈根诠释能被认可多久也持怀疑态度，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塞格雷认为，费米对量子力学这些方程本身并不怀疑，但他并不确定这些方程在物理和哲学上的意义是否还有其他解释方式。总的来说，他对哥本哈根学派的神秘主义感到恼火，并尽其所能地予以反对。

塞格雷还指出，费米对玻尔有此态度可能还另有一个缘由。1923年费米写了一篇关于α粒子与原子碰撞的优秀论文，在文中他提出了如今被称为威廉斯-魏茨泽克方法的研究此类问题的手段。玻尔读了这篇论文但没有理解，却在自己的一篇文章的脚注中对其进行了相当负面的评价。然而，不久之后，当威廉斯在玻尔的实验室中发展了这一方法时，玻尔却成了这一方法的大力倡导者。费米对此感到非常痛苦，尤其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费米还未确定自己实力的时候，而且当时他在意大利的学术政治处境也并不稳固。塞格雷认为，这一事件可能(对费米关于玻尔的态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2年7月31日

托马斯·库恩

根据这一由玛丽亚·迈耶首先提出并经过塞格雷证实和解释的记载内容可知，长期以来费米对玻尔的专业评价甚低，尤其反对玻尔搬弄阐述不清的哲学概念的作派。这与前文杨振宁说费米

崇尚解决实际问题的“厚实的物理学”以及德累斯顿概括的费米“从来不用哲学”等说法可以互相支持、彼此印证。

(二)杨振宁对玻尔的评价

1963年2月25日,海森堡在接受库恩访谈时,说了这样一句话:“重点是在玻尔的头脑中就不存在(解决问题的)首要的数学意识。玻尔不是一个擅长数学思维的人,他更关注的是物理上的关联。在我看来,他是法拉第而不是麦克斯韦。”[6]笔者曾与杨振宁先生通过邮件讨论海森堡的这句话。2014年11月10日,杨先生回函(见图6)表达了对玻尔的如下看法:“玻尔当然与麦克斯韦非常非常不同。但是他也非常非常不同于法拉第。他的互补原理是一种混乱的哲学。在私人行为方面,玻尔遭到了他多个助手的怨恨,这其中包括克拉默茨、斯拉特,一定意义上还包括海森堡。在某种意义上玻尔是费米的反面。玻尔与玻恩的关系值得研究。直到二战结束,我怀疑玻尔正是那个贬低玻恩科学贡献的人。但是我没有能证实这个猜测的证据。”


Re:回复 : article

franken yang 于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下午16:08 发送给 hyd630418... 查看 详细信息

【新浪邮箱android客户端】快速流畅的收信体验，移动办公的新选择。

YD,

Bohr certainly was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Maxwell. But he was also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Faraday. His complementary principle is confused philosophy.

Personal behavior-wise, Bohre was hated by several associates: Kramers, Slater, even Heisenberg in some respects. In some sense he was the opposite of Fermi.

The relationship of Bohr and Born is worth studying. I suspect Bohr was the one who downplayed the contribution of Born, until after the war. But I have no evidence for this. cny

图6　杨振宁评价玻尔互补哲学的信函

杨振宁是费米及费米学派精神的重要继承者、发扬光大者。可以看出在对玻尔评价不高、反对玻尔的哲学主张等方面,他都与费米的观点高度一致。一方面,这可能是出于费米对他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他给出如此评价还与他自己对量子力学发展史有深入的研究[7]有关。早年在其同事派斯为玻尔做传记时,杨振宁就表达过对玻尔贡献的强烈质疑。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此前的文章[8]。

(三)费曼笔下的玻尔

费曼在著作里回忆费米之后,也回忆了玻尔。著作里记载了在研究原子弹期间,玻尔与他的一次会面:

早上8点,大家都还没起床,我走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去跟他们(指玻尔父子)会面。

他(指玻尔)说:“我们在思索怎样能够使原子弹更有威力,我们想到如下这些主意。”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是无效的……巴拉巴拉巴拉(等等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样、这样如何呢?”

我说:“这个听起来好像好一点,但这里头包含了愚蠢至极的想法。”

这次会见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针对一些观点由前到后、由后到前翻来覆去地争论。伟大的玻尔一次次点燃他不断熄灭的烟斗。他与人交谈时,伴有一种难以理解、口齿不清的自言自语。他儿子说的话我能听得更明白一些。[5]133

如果我们把费曼对费米和费曼对玻尔的回忆对比一下,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在年轻的费曼看来,费米是一位远比他自己强十倍的物理大师;而玻尔是一个思维混乱、不能清晰表达却声名显赫的大佬(费曼在书中说当时人们称玻尔为“great god”)。玻尔无疑是20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为什么给费米、费曼和杨振宁等留下如此不堪的深刻印象呢?其实对玻尔委婉的差评还有很多,如伽莫夫曾说,在学术会议上,“每个听的人对论证都会清清楚楚地懂得,唯独玻尔不然”[9];再如玻尔有一次在听了维格纳的报告后跟他的好朋友、物理学家弗兰克说,报告数学太多,他一句都听不懂[10]。笔者对此的解释和理解是:在1922年之前,玻尔确实是一位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随着1922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声名鹊起后,他逐渐转变为一位科学活动家甚至社会活动家[11]。这一转变对于世界科学界而言,未必是弊大于利。对玻尔本人的影响是:一方面他名利双收,在科学界一呼百应;另一方面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物理学专业的实验与数学研究,只能做些哲学思考。而这种做法又为一部分物理学家如费米、费曼和杨振宁等所不喜。因此,在一些后辈看来,他严重地名不副实。

三、杨振宁早年和晚年对费曼的不同评价

杨振宁和费曼是同一时代的杰出物理学家,但是两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一位是谦谦君子,另一位则个性张扬。有理由相信杨振宁十分厌恶费曼的这种个性,1995年他曾公开在文中如此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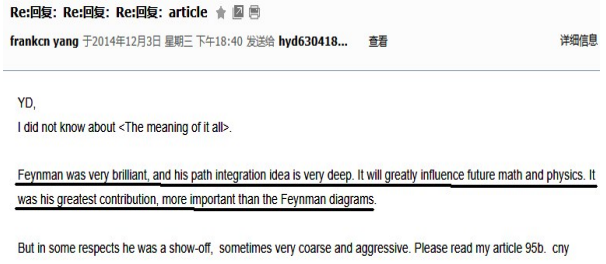
费曼(见图7):“百分之二十是冲动的小丑,百分之二十是专业信念的破坏者,百分之六十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费曼为成为伟大的演员而付出的努力,几乎与他为成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所付出的努力一样多。”[12]

Twenty percent impulsive clown, twenty percent 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 sixty percent brilliant physicist, Feynman strived to be a great performer almost as much as to be a great physicist.

图7 杨振宁早年评价费曼的原文[13]

在另一个场合,杨振宁则把费曼等美国物理学家视为他尊重的费米的反面形象:“我认为(费米)这样的人品在今天的美国是不多见的。美国社会似乎将她的杰出人士推向相反的方向。奥本海默(J.Oppenheimer)、特勒(E.Teller)、费曼(R.Feynman)、托马斯·库恩(T.Kuhn)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取悦观众、标榜自己的方法。”[14]

然而在笔者看来,杨振宁先生对于费曼的认识在晚年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几乎不再受费曼个性的影响,前所未有地高度肯定费曼伟大的科学成就。在2014年给笔者的一封回函(见图8)中杨先生说:“费曼非常杰出,他的路径积分思想极为深刻。它对未来的数学和物理学将产生伟大的影响。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其重要性远远超越费曼图。”


Re:回复: Re:回复: Re:回复: article

frankcn yang 于2014年12月3日 星期三 下午18:40 发送给 hyd630418... 查看 详细信息

YD,

I did not know about <The meaning of it all>.

Feynman was very brilliant, and his path integration idea is very deep. It will greatly influence future math and physics. It wa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eynman diagrams.

But in some respects he was a show-off, sometimes very coarse and aggressive. Please read my article 95b. cny

图8 杨振宁评价费曼及其路径积分的信函

2015年发表的文章中,杨振宁对费曼做出了这样的高度评价:“Feynman是我这一代物理学家中的直觉理论大师。”[15]为什么说杨先生对费曼科学贡献重要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发生于其晚年呢?理由之一是笔者未曾在此前杨振宁对费曼的评价中,发现如此清晰的高度肯定;理由之二是赵午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间接的证据。

赵午教授曾撰文介绍,2016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杨振宁办公室,94岁的杨振宁讲过一次为时一个半小时的物理课。听课者只有一人,即杨先生昔日的弟子、当时已经67岁的赵午教授。讲授内容的题目是Quaternions(四元数)[16]560。讲这次课的缘由是在几周前,杨先生在邮件中谈到费曼的理论物理贡献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费曼的路径积分是一种直觉的猜测……如果它有一天能被严格证明,费曼将成为一位名垂千古的伟大人物。”(原文:“Feynman's path integral is an intuitive guess,… If it is made rigorous some day, Feynman would become an all time great.”[16]560)赵午教授认为“all time great”三个字分量异常,不知道这里面是否包括爱因斯坦和杨振宁本人。当他表示这种疑惑后,杨先生说可以给赵教授讲一次关于四元数的课程,并说在清晰认识四元数之后,就会领悟费曼贡献的重要性。在课上杨先生说:“你看,与哈密顿相似,我喜爱四元数。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美丽……”(原文:“You see that like Hamilton, I love quaternions. It is really very very beautiful…”[16]560)赵午教授说,杨先生热心地、急切地想把他看到的quaternions的美丽和费曼路径积分的深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16]560。

赵午教授提供的间接证据是什么呢?那就是2016年当赵午教授看到杨振宁对费曼及其路径积分的至高评价时,他是惊讶和充满疑惑的。这说明“跟从杨振宁先生学习45年”的赵午教授此前也未曾听到、未曾见到杨先生对费曼工作有过如此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否则他就不会惊讶并有所疑惑。因此,杨先生对于费曼及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在晚年发生了质的改变。

四、结语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话强调的是亲眼所见比听他人转述更为可靠。然而我们眼见着太阳绕着地球每天东升西落,但事实上太阳却根本没有绕地运动;我们眼见每到中旬往往月光如银,事实上月亮并不发光,因此眼见未必全真。但眼见却也有真:孔夫子见到“诸侯并起,东周江河日下”为真;骆宾王看到“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为真;李商隐所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为真。欲识庐山真面目,还须身在此山中。眼见之真实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往往更为可贵,如评价一位著

名物理学家对一个时代的影响,身处其中的物理学家们的回忆,较之后人的想象更真实可信;再如描述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专业能力及特点等,与之有深入接触的物理学家所说,较之后人仅仅基于对其著述的感知而下的结论会更为深刻、更加权威……这就是笔者认为本文中来自杨振宁、费米、费曼等人的史料极为珍贵的重要依据。

追思:自2014年7月收到秦克诚教授转来的一封杨振宁先生邮件起,笔者与杨先生保持着频繁的邮件往来;2015年,又受杨先生之邀去清华作报告,之后多次前往杨先生府上访谈。这一切使笔者深受其益。2025年10月,忽闻杨先生溘然长逝、驾鹤西行。匆匆10年,数次晤谈,杨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谨以此文悼念先生!

参考文献:

[1]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杨振宁.曙光集[M].翁帆,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11-312.
[3]丘成桐,刘兆玄.杨振宁:20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M].甘幼坪,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Cooper D.Erico Fermi and the revolutions of Modern Physics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Feynman P R.Surely you're joking,Mr.Feynman![M]. London: Unwin Paperbacks,1986.
[6]库恩访谈海森堡[EB/OL].[2025-11-13].http://www.aip.org/history/ohilist/4661_1.html.
[7]厚宇德.杨振宁论科学技术史[C]//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编辑委员会.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22:190-191.
[8]厚宇德,郑文锋,刘姣婷.杨振宁先生访问山西大学二、三事[J].物理,2023,52(3):213-215.
[9]伽莫夫.物理学发展史[M].高士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26.
[10]派斯.尼尔斯·玻尔传[M].戈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59.
[11]厚宇德.主角如何变成了配角?:以此纪念玻恩学派创建量子力学100周年[J].台州学院学报,2025,47(4):1-11.
[12]厚宇德,王鑫.杨振宁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他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42(8):109.
[13]Yang C N. Selected papers II:with commentaries[M]. New Jersey: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2013:208.
[14]杨振宁.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33.
[15]杨振宁,翁帆.晨曦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3.
[16]赵午.跟从杨振宁先生学习45年[J].物理,2017,46(8):559-560.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Appearance of Mount Lu, One Must be Within it
—Important Materi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Famous Physicists Such as Chen-Ning Yang and Others

Hou Yude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historical writings include recording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depicting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and appropriately evaluating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he writing of physics history follows similar principles of content selection and accumulation. Among the materials of physics history, there are two types that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precious: one is the recollections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s of each other by some famous physicists who had direct contact and thus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the other is the writings that appropriately evaluate these physicists after some physicists have conducted professional and thorough research on the thoughts, methods, styles, and contributions of other physicists. This article involves the evaluations of Fermi by Chen-Ning Yang, Dresden, and Feynman,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s of Bohr by Fermi, Chen-Ning Yang, and Feynman. Finally, it also includes a comparison of Chen-Ning Yang's evaluations in his early and later years on Feynman. These contents have a value and role that common physics history writings cannot reach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cientific figures and related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Chen-Ning Yang; Max Dresden; Richard Feynman; Enrico Fermi; Niels Bohr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化的实践

段海龙，杨 帆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立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与铁路机务标准设计处开展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在标准制订过程中，既考量技术本身，也对实际情况做了妥协，使战时铁路建设和战后铁路重建有所遵循。受薄弱的工业基础、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对外国技术材料依赖的影响，许多标准仅停留在书面，未能有效实施。总体来看，该时期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为技术积累、体系构建以及战后铁路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既有现实意义又存在历史局限。

关键词：中国铁路史；技术标准化；全面抗战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2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偏离既有轨道进入了新的发展模式。作为物资输送、军队调动的生命线，铁路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铁路技术不统一，联运效率低下、运行成本高。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部首次系统制定了铁路技术标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铁道部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在此基础上，交通部为战时建设和战后重建计，设立了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与铁路机务标准设计处，开展铁路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关于抗战时期铁路技术标准化研究，已有的成果多从战时铁路通史[1-2]的角度出发，对战时铁路技术标准化缺乏具体深入研究。本文基于已有史料，聚焦于当时的铁路状况、铁路技术标准化机构建立和运作，力求呈现全面抗战时期在铁路技术标准化方面开展的工作及其意义和影响。

一、全面抗战前的两次技术标准化尝试

近代铁路技术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传入中国。晚清时期的铁路建设发展缓慢，每条铁路技术标准由主持修建铁路的工程师决定，不同的路线标准不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北洋政府时期。由于轨道、车辆标准各异不能形成通畅的运输网络，严重削减了中国铁路网络的联运功能，阻碍了中国铁路技术的发展。

早在晚清时期，政府、铁路管理部门及工程师就认识到了铁路技术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与尝试。詹天佑（1861—1919）曾为邮传部提出多项建议，在轨距、桥梁、隧道及路线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统一标准的具体措施[3]。汉冶萍公司最早制订了钢轨技术标准[4]，但对于整个铁路技术标准化，未形成实质性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将制订铁路技术标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首次设置铁路技术委员会[5]，专门负责制订铁路技术标准，这是近代中国在铁路技术标准化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此次标准制订过程中，外国工程师尤其是美国工程师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不仅指导工作，还直接参与标准的制订，很多技术参数也多以美国标准为蓝本。

收稿日期：2026-06-18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一流学科科研专项项目“中国近代铁路技术文献整理与研究”（YLXKZX-NSD-066）

作者简介：段海龙（1975— ），男，山西灵丘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史；杨 帆（1999— ），女，云南楚雄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史。

在实操过程中，各国工程师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导致很多数据采取了折中办法。如钢轨使用平炉钢的含磷量，美国规范为0.04%，英国为0.06%，最终我国确定为0.05%[6]。这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铁路线路的延伸、本国工程师团队的成熟，以及应对战争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起基于北洋政府制订的标准进行修正。为此，又专门在铁道部下设置了“铁道技术标准审订委员会”[7]。本次修订工作主要由中国工程师完成，一方面参照国外铁路标准，另一方面根据国内现有路线情况，本着经济优先原则，修订了北洋政府制定的标准，并增加了一些技术参数。但由于很快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本次制订的标准未能有效实施。

1937年前，我国铁路建设分布不均，工程因陋就简，机车车辆陈旧不敷，导致“运输能力极为薄弱，办理大宗军运困难殊多，此在负责军运者，感受痛苦，非言词可能形容”[8]153-154。这样的铁路系统应对平时客货运输已经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支援战事。20世纪40年代，有识之士已认识到铁路技术标准化对抗战和战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交通工业建设，须讲求技术问题，而在技术问题之中，尤以标准最为重要”[9]。不仅将标准化与工业建设密切联系，更是将标准化提升到了国家建设层面，一致认为标准化的广泛实施，是战后建国和强国的必经之路。同时，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及我国工业的发展，标准化思潮在我国逐步形成。早在1941年，罗家伦（1897—1969）就提出“现代战争是工程师与工程师斗法，一切国防工程是一定要标准化的”[10]。谭伯羽（1900—1982）撰文从“生产效率增强”“原料损耗减少”“资本节约”“贩卖利便”“购用利便”等五个方面陈述了标准化的优点。他还归结，工业标准化始创于德国，德国战败后复兴之迅速、苏联三个五年建设计划之完成，莫不归功于工业标准[11]。更有极端的“标准化主义者”将标准化抬高到神坛，如在1944年《改进》第9卷第1期中有文《标准化与国家建设》[12]，认为国家建设中不仅工业要实行标准化，还认为“标准化之范围，无所不包，一切事物皆可标准化，皆应标准化”。整个社会对工业系统甚至社会其他方面的“标准化”重视程度空前。

铁路技术的标准化不仅能提高铁路联运效率，保障军队调动和物资输送，还能提高车辆周转率和线路通过能力，为维持大后方运输、支持长期抗战提供关键技术支撑。鉴于此，国民政府在交通部下设立了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和铁路机务标准设计处两个机构推进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

二、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的成立与工作

（一）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的成立

1942年，国民政府交通部设立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同年4月20日公布组织规程，明确该委员会职责为“统一全国铁路技术标准”“审订各种标准规范”[13]。

1942年12月14日，张嘉璈（1889—1979）辞去交通部部长一职，由曾养甫（1898—1969）接任。曾养甫将“拟定交通技术标准”列为中国交通建设中问题之一，认为“技术问题之中，技术标准尤为重要。国父于民生主义演词中，提及各国推行工业统一一节，亦即推行技术标准之意”[14]。曾养甫担任部长伊始，就改组充实本委员会，他讲到：

> 铁路事业以技术为中心，然各项技术之演进，必先订定标准，庶免参差杂出。战前各路若是久矣，顾虽迭经争取标准化，然皆浅尝辄止。盖沿习既久，积重难返，若欲痛革旧制，重立新型，非有大经费大决心不能生效故也。今经此次大战，吾人对于是项经费之不可省、及是项决心之不可无，认识益真，再前所视为积重难返者，经过此次之破坏，大率已须重建，制定新标准，争取现代化，正在今日，时不可纵。余在来部之始，即将本会机构改组充实，职是故也。[15]

曾养甫上任伊始，将“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改组充实为“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1943年2月10日，交通部公布了《修正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16]。

与1942年4月20日公布的《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组织规程》相比，委员会名称增加了“设计”二字；增设“主任委员”一职（由部长兼任）；机构设置中增设了秘书室，工程、机械（务）、桥梁、讯号四“组”提升为四“处”，各处人员职数有所增加，会议频率由“半年一次”增为“两个月一次”。可见，交通部更加重视标准制订工作，1943

年2月份《交通建设》刊：

铁路技术标准对于铁路建设及战后铁路复兴计划，关系甚巨。现经重新组织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由曾部长兼主任委员，技监韦以黻、萨福均、司长杨承训兼常务委员，下设工务、机务、桥梁、号志四处，由王节尧、程孝刚、茅以昇、汪禧成分任处长。[17]

1943年9月9日，委员会再次发布新修订的组织规程，在原来“统一全国铁路技术标准”的职责上又增加了“筹拟各铁路，复员复兴各项标准设计事宜”；委员会下属各处职能内容也相应增加了“筹拟各铁路复员复兴各项标准设计事项”[18]。

1945年1月，曾养甫卸任交通部部长，俞飞鹏（1884—1966年）接任。俞飞鹏1945年2月1日到部上任，强调“交通事业，在战时实为军事命脉所寄”[19]。显然，铁路技术标准的制定也必须为军事服务。

1945年2月，交通部调整部属机构，要求“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缩小规模，改为“交通技术标准委员会”，下设铁路和公路两组，设委员11人，每组各设工程师数人，须承担交通复员事宜[20]。1945年2月22日，交通部废止了1943年2月10日的《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21]，同时公布了《交通技术标准委员会组织规程》[22]。

此次废止和新立委员会，应是与交通部整体职能相对应。规程中增加了公路标准内容，其他内容没有太大变化。从公布的规程来看，将铁路与公路分为两组，级别大大降低；内容简略，有敷衍之嫌。“交通技术标准委员会”可认为是“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的延续。改组后的交通技术标准委员会中的铁路组，继续进行审订工作，以期配合新路建设计划、奠立技术标准之基础[8]170。

（二）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的工作

据目前已发现文献，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自成立至1943年10月共召开十次工作会议，标准制订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五次会议之后。之前几次会议主要讨论办公用房、人员核定等事项。

5月7日下午，第五次会议之后仅三天，按照第五次会议议定，委员会召开了第六次会议即“标准大纲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钢轨及其配件与规范说明书”“桥梁规范及说明书”的修改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轨距、干支线桥梁载重标准、各种轨距路线的载重、曲线及坡度限度等问题。其中将标准轨距铁路等级分为四等[23]（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在讨论“标准图样”使用的长度单位时，有人提出应由原来的“米制”改为“英制”，便于战后从英美购置设备。最后会议决议：图样主要部分仍使用米制，一些细节部分参照英制。显然这是实际情况与之前制定标准相妥协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当时铁路设施严重依赖外国（主要是英美国家），说明铁路技术标准化对社会工业体系存在客观需求。

5月8日下午3点，第七次会议标准大纲小组会议召开[24]，内容包括钢轨规格、车钩高度、行车速度、号志设备、路基宽度、净空标准等，并建议采用美式低钩标准。至此，“标准大纲”经第六、七两次会议基本确定。

1943年5月27日召开的第八次会议[25]和7月8日召开的第九次会议[26]重点是商议复兴计划和调整标准。第八次会议强调标准制订需与战后复兴、复员及国防计划配合，提出要分阶段估算铁路建设需求，并建议为求“省钱、快速、有效”，将轨重降至70磅/码，标准样式采美国制。同时，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复兴会议筹备委员会”与“铁路复员计划委员会”，并讨论了多项技术及

表1 标准轨距铁路等级分类一览表

线路类型		最大弯度	最大坡度	载重
重要	平地	4°	1%	C20
	山地	5°	1.5%	C25
次要	平地	5°	1.5%	C16
	山地	6°	2%	C20

组织议案。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已完成的美式机车车辆图样，并决议将全国铁路建筑标准划分为三等，明确各项技术参数（见表2）。

会议重申图样单位以米制为主、英制为辅，并讨论了复兴计划、人员赴外考察等议题。

第十次会议历经1943年10月7—8日两天[27]，调整了部分技术参数[28]（见表3）。

决议规定标准轨距车钩高度为890毫米，并讨论了柴油机车应用、电气化铁路等议题。会议明确了以下工作方针：标准制定须周密慎重；减少米轨使用；研究西北地区应用柴油机车；铁路建设以速度为先；客车与货车标准分别制定；统筹材料设厂计划；全面规划铁路发展。会议还就人员设置、图书购置、站台设计、赴美实习等事项做出安排。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委员会成果显著。1945年1月，交通部交通技术标准委员会公布了《中华民国铁路标准及规范总目录》。该目录分标准、示范设计和参考资料三部分，同年底出版发行，作为铁路建设必须依据的统一技术标准[29]。到1945年初，数十种标准规范规则，或就前颁规范规则予以修正、或新近从事审订，均告完毕，呈部公布施行。1945年交通部修订公布的各种货车标准规范种类有《四十吨全钢棚车规范书》《四十吨全钢高边车规范书》《四十吨全钢高边开底车规范书》《四十吨全钢低边车规范书》《四十吨全钢平车规范书》《货运守车规范书》《货车通用标准图》等[1]54-55。其中各种座车、卧车、饭车等客车标准15种，四十吨全钢货车标准7种，一米轨距客车标准2种，机车、车辆通用标准及材料规范2种。机车方面仅有2-8-2及4-6-2两式示范设计，此外还有中小型车房、机车、车辆及机车车辆联合修理厂等设计纲要4种[30]143。

与以往相比，本次标准制定过程及成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对标准化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理性；二是更加注重标准制订与实际相结合，考虑到了既有线路与现有工业体系的实际条件。这表明在铁路技术标准制订方面，有了显著进步。

（三）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制定标准的变化

从整个民国时期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来看，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在参数和内容上均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1917年至1945年间，共成立三次制订修正铁路技术标准的机构，成果先后集中于1922年、1936年、1945年公布。其中，第二次即铁道部时期主要是对1922年制定的标准进行修正和完善。本文主要

表2　铁路三等路线建筑标准

线路类型		最大弯度	最大坡度	载重	备考
甲级		2°	0.7%	C20	临时性建筑用
				C28	永久性建筑用
乙级	平地	4°	1.0%	C20	
	山地	5°	1.5%	C24	
丙级	平地	5°	1.5%	C16	
	山地	6°	2.0%	C20	

表3　调整后的铁路三等路线建筑标准

线路类型		最大弯度	最大坡度
甲级	平地	2°	0.9%
	山地	4°	1.5%
乙级	平地	4°	1.0%
	山地	5°	1.5%
丙级	平地	5°	1.5%
	山地	6°	2.0%

对比1945年与1922年制定的标准。

轨重方面，1922年规定干线轨重每米43千克（折86.3磅/码），次要线轨重每米重30千克（折60.2磅/码），轨长10—12米。金士宣认为，由于我国当时重工业欠发达，钢铁材料不能自给，暂用30或35千克的轻轨作为初期标准，比较符合实际[30]98-99。1945年修正公布的轨重，依照机车轴重分为四种，由各路斟酌路线地理条件及运输需求，选定标准呈部核定（见表4）。

显然，1945年公布的轨重要重于1922年的规定。究其原因，铁路技术本身得到了发展，机车为了增大牵引力，自身重量变大，就要求轨重增大。1945年轨重类型增多，是为了适应不同地理环境，这一点对战时快速建设铁路尤为重要。

桥梁和坡度（包括曲度）是铁路建设标准的重要指标。桥梁标准主要在于其承重能力。中国桥梁负荷计算法，原采用美国古柏氏（Cooper's Loading），即以巩固式（2-8-0式）机车两辆联接行驶为标准，并以千磅为单位，例如E50级即为动轮轴重5万磅。1937年，我国创设中华级活重制，以密加度式（2-8-2式）机车为标准，并以机车动轮轴重吨表示，例如C20吨级即机车动轮轴重为20吨，古柏氏与中华级对比如表5所示。

1922年交通部规定，干线钢桥载重量为古柏氏E50级，次要路为E35级。1945年，铁道部则依据铁路等级规定如表6所示。

可见1945年的桥梁载重量明显高于1922年的规定，其原因与轨重增大相同。

桥梁的建筑方式有工字梁（I Beam）、板梁（Plate Girder）、桁梁（Truss）及半穿式桁梁（Pony Truss）四种。按照铁道部颁发的中华16级及20级标准钢梁所规定的跨度（Span），工字梁为4—12米，板梁为16—32米，上承桁梁为20—42米，下承桁梁为35—63米，半穿式桁梁为20—28米[30]99-100。

铁路线路的坡度和曲度不仅影响铁路修建的难度，还制约日后火车运输能力及机车车辆保养费用。铁路工程坡度一般以百分数记，如平直路线100米距离，上升或下降1米，即为1%。例如，火车以每小时50千米在平直路上行驶，每吨载重只需5千克力；1%上坡则需15千克力；2%上坡则需25千克力。即1%坡度只能载重为平地的1/3，2%坡度以上则只能载重平直路线的1/5[30]100。1945年，交通部修正坡度标准

表4 1945年修订的铁路钢轨轨重标准

钢轨/（千克/米）	实际重量/（千克/米）	机车轴重/吨	
		新建路	保养完善已通车路
30	30.01	12	13
37	37.10	16	20
45	44.62	20	24
55	55.71	24	30

注：轨长一律12米，配件按照部定式样。

表5 古柏氏与中华级对比

古柏氏	E50	E40	E30	E20
中华级	C20	C16	C12	C8

表6 1945年铁道部公布的干线钢桥载重标准

路级	A	B	C
标准负荷	C28	C24	C20
临时桥梁负荷（包括木桥及预备更换之钢桥）	C20	C16	C12或C16

如表7所示。

曲度或弯道，任何部分取20米的弦长，对应的中心角度即为曲度（也有用半径数表示者）。如果弯道在坡度上，需要将弯道阻力计算在坡度之内，减低坡度。普通标准轨距曲度为4度时，行车速度不得超过55千米；最大为6度时，应降至45千米（根据建筑标准及规则第七条规定得出）。1922年，交通部规定最大曲度为5度（半径230米），1945年修订后的曲度标准如表8所示。

1922年规定“干路其最大坡度连同曲线上之坡度折减率在内为1.5%”[31]。显然1945年要比1922年的详细、完善。

此外，站台高低与机车及车钩设计有关，也会影响运输。中国初建铁路，多由欧洲工程师设计，采用高站台。美国为便利大型机车，且美国客货车辆之车钩较低，因此采用低站台。1945年，铁道部将车钩降低，站台分高低两种：

顾客高站台：自轨顶起680公厘①，各路均采用之；

顾客低站台：自轨顶起380公厘，终点站及旅客大站采用之；

货物站台：自轨顶起980公厘。[30]110

1945年制定的铁路技术标准参数与1922年相比，主要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轨重增加，二是坡度（弯度）增大，三是标准更加详细多样。上述变化，基于建筑能力的提升，其目的是增加运输能力；出现多种标准，是为了战时和战后重建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以达到加快建设速度的效果。

三、铁路机务标准设计处与机车技术标准化

与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相比，1938年10月，交通部设立的铁路机务标准设计处（下称设计处）除为战后重建积极推广铁路技术标准外，工作重心更偏向制订机车车辆及厂段标准。早期的设计处因工作地点不稳定、人手缺乏，工作未能取得显著效果。直到1938年冬，才召集到40余人，开始集中工作。

经过三年的紧张工作，该处制定出标准机车2-8-2式、4-6-2式，及调车机车0-8-0式三种图样。两种标准机车规范的制定主要根据当时国内

① 引用文献原文单位。1公厘即1毫米。

表7　1945年交通部修正铁路坡度标准

路级	A		B		C	
地形	平原	山地	平原	山地	平原	山地
最大坡度（包括曲度折减率）	0.7%	1.5%	1.0%	1.5%	1.5%	2.0%

表8　1945年交通部修订的铁路曲度标准

路级	地形	最大曲度	
		角度	半径
A	平原	2°	572.99米（1879.87英尺）
	山岭	4°	286.54米（940.08英尺）
B	平原	4°	286.54米（940.08英尺）
	山岭	5°	229.26米（752.16英尺）
C	平原	5°	229.26米（752.16英尺）
	山岭	6°	191.07米（626.88英尺）

机车情况。抗战前我国铁路所用客运机车以太平洋式(4-6-2)局多、货运机车以巩固式(2-8-0)和密加度式(2-8-2)居多;日军侵入华北添置的机车也以以上两种货运机车为主。因此,1945年交通部颁布了太平洋式客运机车和密加度式货运机车的规范书。其中重要技术指标如表9所示。

以上两种机车与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部制定的标准相比较轻,折合中华级C16。交通部制定的钢桥标准甲乙丙三级对应C28、C24、C20级,以上两种机车标准尚达不到丙级铁路的标准。只是以上规定只是规范性的文稿,不能作为实际的标准[1]52。

设计处的工作常因人员分散,工作时有停滞。1943年,开始设计黔桂铁路高坡道运用的活节机车,由应尚才(1896—1982)专门负责[32]。至1943年初,已完成机车、客车、货车、修理厂、制造厂、机务段及其他7个部分的设计工作[33]。

以上工作主要是在杨毅(1891—1967)的领导下完成的。杨毅曾赴美国学习机械专业,并在美国Baldwin Loco. Works, Penn. R. R. Co.实习,先后任平绥铁路南口机厂工务员、张家口机厂厂长、四方机厂厂长,机务处长等职[34]。1933年即参与铁道部机务标准制定,1937年后继续兼办该项工作,是机务标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应尚才于1937年赴美考察铁路机务标准化,回国后于1938年出任铁路标准委员会技正,主管机务标准设计处。设计处虽经战乱,辗转南京、汉口、贵阳、重庆,但工作并未中断。1938年至1946年间,设计处先后完成了一系列蒸汽机车、客货车辆的标准设计、技术规范及窄轨铁路车辆推荐标准。应尚才既参照当时国际先进铁路技术发展趋势,又结合中国实际,制定了大量的统一标准,被称为"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开拓者之一"。他强调标准贵在实施,建议交通部设立专门技术机构,承担设计、咨询、监造、检验及研究等职能。

1945年,设计处已设计全钢客车多种,编定规范,绘成图样。交通部修订公布有关客车的规范种类有《一等客车规范书》《一等卧车规范书》《一等膳车规范书》《一二等合并客车规范书》《一二等卧车规范书》《二等客车规范书》《二等卧车规范书》《三等客车规范书》《三等客车及厨车规范书》《三等卧车规范书》《客车通用标准图》《行李及邮件车规范书》《行李及守车规范书》《厨车规范书》等[1]53-54。此外,设计处还制定出了机厂标准图,并编制了各种规范及说明,将全国机厂机务段的分布、规模、布置及工作方法、管理组织等做出计划[35]。

客车方面,设计处将之前的四五十种标准审订为12种。另有花车、大小公事车3种;完成标准设计的货车有40吨全钢棚车、高边车、平车、石碴车、漏斗车、落底车。而冷藏车、柜车、凹底平车等,直到1943年初仍未完成[32]。到1946年,设计处已按照全国各路需要,设计出了标准机车、车辆、机务段及机厂等,并绘制了详细图样,以备将来制造建设之用。尤其是标准车辆的设计更为具体,编定规范、绘成图样,以备施行[35]。

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国内工程界就机车标准化路径展开广泛讨论:一派主张效仿美国,推行零部件标准化;另一派则建议借鉴欧洲,制订整车型号标准。更多人主张结合中国实际,采二者

表9 交通部1945年颁布的太平洋式客运机车和密加度式货运机车规范

机车类型	太平洋式(4-6-2)客运机车	密加度式(2-8-2)货运机车
动轮直径/米	1.750	1.500
动轮固定轴距/米	3.700	4.800
机车及煤水车总轮距/米	19.340	19.340
满载重量/吨	90.00	92.58
煤水车载煤量/吨	8	8
煤水车载水量/吨	28	28
机车牵引力(百分八五蒸汽)/千克	13.660	15.940

之长，既定型标准机车，也推进关键部件通用化，并分阶段推进标准化工作[36]。

此外，交通部还于1941年公布了国有铁路机车车辆材料规范书，对建筑钢、锅炉钢、焰管钢、碳钢、合金钢的轮轴、弹簧、铸件等，都做了规范。但国内工业薄弱，大多不能自给，很多材料只能购自国外，技术标准难以自主，执行情况难以控制。不仅如此，交通部在1921年1月就开始采用国际度量衡，所有规范书和标准图样都以此为单位，但铁路材料主要来源国英、美又不完全按国际单位生产产品。这样在购买时只能采用相近的尺度而不能做严格要求[1]86-87。

因此，当时无论机车标准的制定还是材料标准的制定，都受国外生产厂家严重的制约，不能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归根到底，工业生产自主化是标准制订的坚实基础和重要前提，否则只能是“一厢情愿”，制定的标准始终得不到实施。

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的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是在国家生存危机和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展开的一次重要努力。通过梳理战时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和铁路机务标准设计处对铁路技术标准化作出的努力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技术标准化进程并非停滞，而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了独特的发展轨迹。

战时铁路技术标准化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导向，一切标准制定皆以服务抗战、保障军事运输为最高原则；二是对战时条件的妥协，在工业基础薄弱、材料匮乏的条件下，标准制定不得不考虑现实因素，出现“米制为主、英制为辅”等折中方案；三是前瞻性，相关工作并未局限于战时，而是考虑到了战后复员与路网复兴的问题。然而，受制于战时动荡的环境、薄弱的重工业基础以及对外国技术与材料的深度依赖，战时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技术积累、理论储备与人才培养层面。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整体上体现了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社会需要技术进步，技术需要社会支持；技术的标准化既是技术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社会生产的需要。然而，社会发展在为技术进步提供条件的同时，也会对技术进步构成约束。技术必须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协同发展，这种互动既包含相互促进，也存在相互制约，甚至往往需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全面抗战时期的铁路技术标准化工作，并没有因战停止，但也未能沿着既有路线向前发展。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技术活动首要服务于军事需求，标准化工作被迫偏离其常规发展轨道，需要向支持抗战妥协。因此，这一时期的标准化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适应性特征：一方面在艰难中维持有限推进；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兼顾战时实际，体现出特殊历史条件下技术发展的顽强与局限。

参考文献：

[1]凌鸿勋.中国铁路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2]凌鸿勋.中华铁路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29-40.
[3]詹天佑.为求中国铁路修建标准之统一呈清政府文及说贴[M]//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詹天佑纪念馆.詹天佑文集.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9-12.
[4]方一兵，雷丽芳.中国近代钢轨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演化(1911—1936年)[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36(1)：53-71，129.
[5]王斌.北洋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工作述评[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6，8(6)：661-672.
[6]萨福均.三十年来中国之铁路工程[C]//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南京：中国工程师学会，1946：1-17.
[7]杜晓梅，段海龙.南京国民政府铁道技术标准审订委员会述评[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38(2)：98-104.
[8]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设[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9]张煦.交通工业建设之途径[J].交通建设，1943，1(10)：35-39.
[10]罗家伦.罗家伦演说[N].大公报(香港版)，1941-10-30(5).
[11]谭伯羽.工业与工业标准化[J].新中华，1944，复刊2(8)：5-7.
[12]龚积芝.标准化与国家建设[J].改进，1944，9(1)：2-3，9.
[13]中华民国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组织规程[J].交通公报，1942，5(5)：1827.
[14]曾养甫.中国交通建设问题[N].大公报(桂林版)，1944-01-01(6).
[15]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J].交通建设，1943，1(7)：81-82.
[16]中华民国交通部.修正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J].交通公报，1943，6(3)：2276.
[17]交通部出版物委员会.铁路技术标准会讯[J].交通建设，1943，1(2)：59.
[18]中华民国交通部.修正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J].交通公报，1943，6(11)：2743-2744.
[19]交通部出版物委员会.新任部次长到部就职[J].交通建设，

1945,3(2):106.
[20]中华民国交通部.军政部军法司裁撤交通部续调整机构[N].大公报(重庆版),1945-02-17(3).
[21]中华民国交通部.交通部令(人一渝字第二七六六号)[J].交通公报,1945,8(4):19.
[22]交通技术标准委员会.交通技术标准委员会组织规程[J].交通公报,1945,8(4):19.
[23]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标准大纲小组会议纪录[J].交通建设,1943,1(9):91-93.
[24]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标准大纲小组会议纪录[J].交通建设,1943,1(9):93-94.
[25]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会议[J].交通建设,1943,1(9):95-97.
[26]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记录[J].交通建设,1943,1(10):91-93.
[27]交通部出版物委员会.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举行十次会议[J].交通建设,1943,1(11):119.
[28]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第十届会议记录[J].交通建设,1944,2(2):71-77.
[29]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中国铁路大事记:1876—1995[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153.
[30]金士宣.铁路运输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1]中华民国交通部.中华民国国有铁路建筑标准及规则[R].北京:交通部,1922.
[32]杨毅.最近铁路机务方面工作之进展[J].交通建设,1943,1(7):5-8.
[33]应尚才.推行铁路机务技术标准化之有效方法[J].交通建设,1943,1(6):14-17.
[34]资源委员会.中国工程人名录(第一回)[M].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312.
[35]杨毅.三十年来中国之铁路机械工程[C]//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南京:中国工程师学会,1946:1-22.
[36]胡道彦.从机车之型别沿革论我国铁路机车标准化及标准机车之设计[J].世界交通月刊,1948,1(10):4-8.

Standardization of China's Railway Techn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an Hailong, Yang F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Railway Technical Standards Design Committee and the Railway Mechanical Standards Design Office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ailway technology. Their standard formulation involved both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ompromises on practical realities, providing guidelines for wartime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postwar railway reconstruction. Due to constraints such as a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turbul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relia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most of these standards remained on paper and were not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Nevertheless, the railway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efforts during this perio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undertakings in the post-war era, possessing bot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Keywords: China′s railway history; standardization of technology; full-scal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从“志”到“学”：洋务运动时期从新兴志书到引进科学的知识转型

许晓东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传统志书在西学东渐浪潮中经历了范式革新，从地域性知识汇编转变为系统性科学传播载体。《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新兴志书突破传统志书的经验性局限，推动中国从“师夷长技”向“格致之学”的认知跨越。新兴志书通过整合西方科学知识、革新编纂体例、构建实证方法论，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媒介，更促成了中国近代学科体系的萌芽。

关键词：洋务运动时期；新兴志书；格致学；科学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3

一、志书考略：从定义分类到史料功能

（一）志书的定义与分类

“志”的定义可从字形本义出发，追溯其语义演变的完整脉络。“志”由“心”与“之”会意而成，核心本义为心之所向，指代内心的意念、志向与目标。“志”的内在精神指向构成了其所有引申义的哲学起点，奠定了其从主观意念向客观存在转化的语义基础。“志”最直接引申为记下、记录、记载的动作。小篆体中“誌”作为分化字，以“言”为形旁，表明记录需依托言语，凸显了“志”作为文本产物的属性（见图1）。综合来看，凡蕴含志、识、记意蕴，具备记事特征的文本，皆可纳入“志”的史料范畴，这一界定从功能层面厘清了“志”的外延，完成了从字义到文本形态的初步定义。



图1 各种书法书体下的“志”

“志”是对一方风土、一门技艺、一类典章等特定领域，进行全面、系统、分门别类梳理的专门性著述，知识的组织性与结构感是其核心特质。其以客观记述为基本原则，汇集大量原始资料、沿革脉络与具体数据，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历史凭证，具有极强的历史性与资料性。尤其是官修志书，编纂遵循既定体例与规范，代表了当时官方或主流学界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权威认定与系统总结。“志”在记录事实的同时，承载着特定群体的文化记忆、地方认同与历史智慧，实现了从个人心志到集体文化记忆的升华，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综上，“志”从心之所向的本源出发，最终演变为以系统记录为核心、以存史致用为目的的权威性文献体裁，其定义涵盖了意

收稿日期：2026-06-24

基金项目：中共福建省委党校2026年度重点项目“‘正确政绩观’概念溯源与话语创新”（2026X02）

作者简介：许晓东(1990—)，男，福建泉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

图、行为、成果与体裁的完整逻辑链条。

从文体演进视角看，“志”的记识传统可上溯至先秦典籍的纪实书写。以记识对象的属性与编纂体例为核心分类维度，兼顾文体本质与历史演进逻辑，结合文献存世情况与学术共识，志体可作如下界定与分类。

1. 专题性知识志体，即以特定领域为核心系统记识的志。此类志体以特定知识领域为记识对象，核心特征是专业性、系统性与纪实性，旨在梳理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器物形态、自然现象等。专题性的志编纂体例遵循分类与考订的原则，其命名多采用“领域+志/记/识”结合之范式，部分文献因时代语境差异称“记”或“识”，但核心属性与“志”一致。从典籍实例来看，正史中的《汉书·天文志》《汉书·律历志》是此类志体的成熟形态，专门记载天文历法领域的知识与实践。传世私修文献中，如杨孚《异物志》符合专题志体特征，专记边疆及域外奇异物产与风俗，是早期专题志的典型代表。延及现代，植物志、动物志、矿石志等论著，延续了此类志体专题聚焦与系统梳理的核心特质，本质是传统专题志体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传承与转化，二者形成文体上的学术延续性。

2. 区域性综合志体，即以特定地域为范围综合记述的志。区域性志体以具体地域为记识边界，核心特征是综合性、地方性与资料性，旨在全景式记述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技术进步等多元内容，编纂体例强调地域为纲，是传统方志的核心形态。部分早期文献称图经，后逐步统一为志，其命名范式多为“地域名称+志”。此类志书的源头，普遍认为是源于先秦时期的《禹贡》，其以山川地域为框架，记载各州地理、物产、贡赋，确立了地域分类的体例基础，被认为是周官外史掌控下的“四方之志”[1]。周代“四方之志”是早期地域性文献的雏形，为后世方志（如《长安志》《洛阳伽蓝记》等）提供了以地域为核心的纪实传统，明清时期州县志的普及则使该体例趋于完备。

3. 域外性地理志体，特别是近代“开眼看世界”背景下跨地域的志。域外性志体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形成的特殊地理志类型，核心特征是记识范围突破本土疆域，以域外国家、地区为载录对象，兼具地理纪实性、西学传播性与经世致用性，编纂体例在延续传统志体分类记载特质的基础上，融入西方地理知识框架，是传统志体在近代的重要革新与拓展。从典籍实例与学术脉络来看，此类志体兴起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思潮，围绕域外地理、国情、制度的系统介绍展开。如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撰的《瀛寰志略》等。

（二）志书在古代科技史研究中的史料功能

1. 志书以时代连续性与知识系统性，构建了古代科技认知演进的完整史料脉络。从先秦至明清，志书凭借其鲜明的时代性，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发展水平与认知边界进行层累式记录，打破了零散文献的碎片化局限，完整呈现了科技知识从积淀、迭代到创新的动态过程，为重构古代科技认知演进史提供了核心文本支撑。如地方志是严谨科学的资料性文献[2]，民族志是对特定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记录的事实文本[3-4]。无论是综合性地志的分类编纂，还是专题物志的深度考述，都标志着古人对科技知识的处理已从被动记录走向主动的系统化分类与学理性梳理，使科技认知的演进轨迹得以清晰可循。

2. 志书以地域针对性与实践实证性，弥补了正史科技史料的叙事短板。正史多聚焦中央层面的重大科技成就与典章制度，对地域化、民间性的科技实践记载薄弱，而志书以特定地域为叙事单元，对自然资源、物候特征与物产工艺详实载录，为解析不同地域生态环境与科技发展的互动关系、揭示科技实践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时空场景。志书的史料价值根植于其源于实践的真实性，其所记内容皆为当时当地人对具体科技活动的忠实记述，这种经验性记录规避了文献转抄的失真风险，构成了古代科技史可靠、生动的原始素材库，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3. 志书以内容包容性与编纂规范性，实现了古代科技知识的系统化传承与多维呈现。在内容维度，志书涵盖农业、手工业、生态、生物等诸多科技领域，尤其明清时期呈现出显著的多学科知识交融趋势，几乎囊括传统社会所有科技实践门类，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聚合体，完整映射了古代科技的整体面貌与交叉特征。在传承维度，志书，尤其是官修方志，遵循固定的编纂体例，通过分门别类的编排，将海量琐碎的科技信息转化为结构化的文献载体，既避免了零散科技知识的遗

失，又构建了可检索、可溯源的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科技知识库。

二、从传统志书到新兴志书

晚清志书的转型是一场全方位的知识革命。从知识内核、编纂范式到作者身份，晚清志书突破了传统志书的封闭形态，成为传播近代科学思想、推动思想启蒙、服务救亡图存的新型知识载体。

（一）从客体上看，实现从地域风物到全球科学体系的跨越

传统志书的知识内核始终关注地域风物，以特定地域的空间范围为叙事边界，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以州县为单元的记述传统。无论是《禹贡》奠定的地域物产记述范式，还是后世地方志中舆地志、物产志的固定体例，其核心均是对本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经验性记录。知识范围局限于中原及周边附属区域，缺乏系统性与真实性。知识体系则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支撑，将科技知识视为附着于地域与伦理的实用技巧，如农业技术记载多散落于食货志，手工业技艺仅见于地方风物记。

晚清新兴志书的诞生，首先完成了知识内核的根本性置换，将叙事重心从本土地域风物转向全球地理格局与近代科学体系。林则徐《四洲志》作为近代新兴志书的发轫之作，首次以西方地理知识为基础，系统介绍了世界四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方位、疆域沿革、政治制度与物产风情，彻底突破了华夏中心的叙事范式。《四洲志》以经纬度为坐标，构建了全球化的地理认知框架。看其知识来源，不再是传统文献的考据与地方见闻，而是西方近代地理著作的译介与整理。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5]魏源《海国图志》则进一步拓展了新兴志书的知识边界，将全球地理知识与近代科学体系深度融合，完成了知识内核的全面更新，更系统引介了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工程等科学知识。

西方传教士译著为晚清志书内容更新提供了直接的知识资源。慕维廉《地理全志》以近代地质学、气象学知识为核心，系统介绍了地球结构、地质演化与气候规律，其对信风、季风的科学阐释，区别于传统志书的经验性记载。《地理全志》记载：“内则指地内之形质，或至广磐石，或至细泥沙……外则指地面之形势，如水土支派长延，或州岛，或山谷，或高原。”[6]合信《博物新编》介绍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物理、化学等知识，以通俗的语言阐释近代科学原理，将近代化学知识引入志书体系。对西方科学的系统性介绍，是《博物新编》的最大特点[7]。华蘅芳与玛高温《地学浅释》则系统译介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阐述了地层演化、岩石成因等核心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天地开辟的宇宙生成论。

（二）从方法上看，实现从经验辑录到科学分析与实证的跨越

传统志书的编纂范式以经验辑录为核心，形成了实录与分类的固定方法。在编纂过程中，作者多对地域内的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客观记述，不追求原理分析与逻辑论证，仅注重事实的罗列与分类。如传统地方志中的物产志，多以“某物产，生于某地，用途如何”的句式记述，既无对物产成因的科学分析，也无对其特性的系统探究。舆地志则以方位、里程为核心，缺乏经纬度等精准的地理定位工具，其分类方式也多基于伦理与实用需求。其编纂范式决定了传统志书的知识呈现方式是零散的、经验性的。

以近代科学方法为核心，新兴志书构建了全新的编纂逻辑，重塑了知识生产与呈现的方式。其一，传统志书对地理方位的记述多依赖东西南北的模糊方位与“若干里”的估算里程，而新兴志书则普遍采用经纬度作为地理定位的核心工具，如《四洲志》《瀛寰志略》均以经纬度标注各国疆域边界与重要城市的位置。《地理全志》更将数理推算引入气候与地质分析，通过对纬度、海拔与气候关系的量化分析，解释不同地域的气候差异。其二，新兴志书的编纂范式取代了传统志书的事实罗列。如《海国图志》记述了火轮船的外观与用途，更深入阐释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详细介绍了汽缸、活塞、飞轮等核心部件的结构与运作机制。其三，新兴志书提升了知识的可靠性与严谨性。传统志书的文献来源多局限于中国古代典籍，缺乏跨文化文献的比对与验证，而新兴志书广泛参考西方著作、传教士译著与域外见闻，通过多文献比对实现实证考订。《瀛寰志略》参考了《四洲志》等译著，还广泛搜集西方传教士、商人的口述资料与地图文献，通过比对不同来源的信息，纠正了传统文献与早期译著中的错误，如

对地球形状、各大洲面积的考订，均以多文献比对为基础，体现了近代实证史学的编纂理念。《地学浅释》对地层演化的记载，摒弃了传统“灾变论”的神秘主义解释。《博物新编》对天文现象的记述，以日心说为理论基础，通过对行星运行轨道的分析，解释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取代了传统“天人感应”的附会式解释。总而论之，传统志书以记述事实为核心目标，而新兴志书以探究规律为核心诉求，从“是什么”的事实记述转向“为什么”的原理分析。

（三）从主体上看，实现从地方史官到士族阶层的跨越

传统志书的编纂主体多为地方官员与专业史官，其身份定位决定了志书的著述目的集中于资治、存史、教化三大维度。传统志书的编纂多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召集当地士绅、学者参与。如明清时期的州县志多由知府、知县牵头，依托地方学官与乡贤完成，编纂者的身份与地方行政权力、传统文化权威紧密绑定。传统志书的编纂工作始终围绕地方治理需求展开：“资治”即通过记载地方沿革、典章制度、民生状况，为地方行政决策提供参考；“存史”即留存地域历史记忆，传承地方文脉；“教化”则通过记载忠孝节义、乡贤事迹，强化儒家伦理秩序。究其社会功能，只能局限于地方治理与伦理教化，缺乏对国家命运与民族未来的宏观思考。

动荡则变，新兴志书的作者不再是传统的地方史官与士绅，而是以魏源、徐继畬、林则徐为代表的国家命运思考者与公共启蒙者，其身份定位从地方治理参与者转变为民族危机应对者。因而，著述目的也从资治存史转向救亡图存。志书的社会政治功能与思想史意义得到极大提升。《四洲志》的目的是应对鸦片战争后的国防危机，通过系统了解西方各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状况，为清王朝制定国防策略提供参考。《海国图志》进一步明晰了新兴志书的著述目的与思想功能，其编纂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引介西方科技知识与政治制度，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徐继畬编纂《瀛寰志略》时，摒弃了狭隘的华夷之辨观念，以客观、理性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旨在引导国人以平等的视角认识世界。

另外，西方传教士作为新兴志书的重要编纂主体之一，其身份与著述目的虽与魏源、徐继畬有所差异，但同样推动了志书功能的转型。慕维廉、合信等传教士的身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者，其编纂《地理全志》《博物新编》等著作的初衷虽包含宗教传播的诉求，但客观上承担了思想启蒙的功能。

三、从新兴志书到引进科学

（一）从新兴志书到格致学的跨越

“格致”学说始于秦汉时期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中的“八条目”，即“致知在格物”[8]。晚清知识界的一场无声革命，藏蕴于从新兴志书到格致学著作的演进轨迹之中。《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新兴志书揭开了传统天下观的认知帷幕；而《格致须知》《格物探原》《格致汇编》等格致学著作则以分科治学的体系化追求，为中国知识界注入了近代科学的理性基因。

1.从综合性到专门化的载体重塑。知识体系是对特定专业知识总和的概括[9]。知识的传承与革新，始终依赖于载体形态的适配性演进。晚清新兴志书与格致学著作的迭代，本质上是知识载体完成了从启蒙总汇到学科入口的功能重塑、从知识汇编到原理阐释的内容深化，这为近代科学知识的本土化传播扫清了形式障碍。

从功能转型看，晚清新兴志书突破了地域与内容的双重局限，以通览万国为己任，构建起一幅涵盖地理、政制、历史与科技的综合性世界图景。《海国图志》以科技译介、本土诠释、国家战略三重话语建构了跨文化科技话语体系，是晚清科技思想史料的重要载体。《海国图志》，于器艺篇中系统汇编西方船舰、枪炮、天文仪器等技术成果。《瀛寰志略》以国别为纲，兼及西方科学技术的零星介绍，同样旨在为封闭的中国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外部世界参照。以广度优先的知识铺陈，新兴志书完成了对传统认知壁垒的冲击，回答了“世界是什么样”的时代之问。格致学的出现则意味着知识功能的深层转向。《格致须知》系列分算学、化学、物理、天文等20余册，每册聚焦一门学科的基础原理与核心知识。《格致启蒙》以更通俗的体例，面向初学者阐释科学常识，构建起阶梯式的知识传授体系。与新兴志书的综合性总汇不同，格致学著作的功能是入门引导，即不再追求知识的广度覆盖，而是致力于某一学科的深度开掘，聚焦于回答这门学问讲什么、如何学的具体

问题。新兴志书完成了知识的引介与定位，通过整体性图景的呈现，让国人意识到传统知识体系之外的广阔天地，解决“有何物、在何方”的问题。格致学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知识的传授与解析，通过分科化的体系建构，引导读者深入探究具体学科的内在机理，回应“是何理、如何用”的问题。

从内容演进看，新兴志书的知识呈现方式，以描述、分类、汇编为核心特征，本质上是对西方既有知识成果的选择性移植。《博物新编》虽介绍了氧气、氢气等化学新知，以及蒸汽机、望远镜等技术发明，但通篇仍延续博物志的记述传统，侧重于事物的性状、用途的描述。新兴志书的编纂者们首要目标是知其然，而非知其所以然，知识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开眼界之启蒙意义上。格致学则将原理阐释置于核心地位。《格物探原》以物质构成为核心命题，深入探讨基础概念，试图揭示物质世界的根本规律。《数理格致》系统介绍西方数学的公理、定理与推导方法，构建起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格致学不再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描述，而是致力于挖掘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与普遍规律，将知识的重心从事物本身转移到事物机理与原因。

从话语与体例看，新兴志书仍未脱离传统志书与类书的编纂逻辑，多以分类叙述为核心，如《海国图志》分筹海篇、各国沿革图、夷情备采、器艺等部分。《瀛寰志略》按国别分卷，每卷下设地理、历史、政制等子目。其体例缺乏逻辑递进的知识结构，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传授。不过，新兴志书在引介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创造并规范了一批关键科学术语，如电气、重学、化学、天学等，打破了传统格物概念的模糊性。其中，墨海书馆的科学译书活动有一定话语权，其尝试以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来阐释西方科学知识[10]。《化学鉴原》的元素翻译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其民族化翻译策略也对后世化学术语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11]。格致学彻底抛弃了传统志书体例，确立了近代教科书的基本范式。《格致须知》每册开篇先下定义，明确学科核心概念，随后分章节阐述原理、列举例证。《格致汇编》则开创了问答互动、实验图解的传播形式，通过读者提问与编者解答的模式回应知识困惑。格致学以定义确立概念边界，以定理构建逻辑体系，以实验验证理论有效性，使科学知识能够脱离传统文史框架。新兴志书将西方科学知识纳入传统志书的话语框架中，使其成为经世之学的补充；格致学著作则通过术语规范化、体例逻辑化，构建起独立于传统文史知识的科学话语体系。

2. 从实用理性到科学理性的认知升华。如果说知识载体的重塑是“形”的转变，那么认知理性的升华则是“神”的革新。新兴志书所秉持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与格致学所彰显的求真求理科学理性，构成了晚清知识界认知范式的根本差异。

以目的论视之，晚清国力衰微、外患频仍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新兴志书的编纂必然以经世致用为根本鹄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将《海国图志》的核心价值定位于寻求强国之术，其中的科技知识被视为制夷之工具。徐继畬编纂《瀛寰志略》最终落脚点仍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科学知识是服务于国家生存的富强之术，其合法性来源于是否有用，而非是否真实。只要知晓技术如何用，便无需追问原理为何物。然而，格致学立足于将格物求理确立为知识追求的核心目的。《格物探原》致力于回答世界由何构成之根本问题。科学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有用，更在于真实。如此论之，新兴志书将实用性作为评判知识的唯一标准，格致学著作则引入了真实性、逻辑性、实证性等独立评判维度，科学知识开始获得因其自身正确性而存在的价值。

以方法论察之，新兴志书的知识生产方式，主要建立在信息来源的外来性之上。编纂者多依赖西方传教士的口述、外国书刊的零散记载，对这些知识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缺乏有效的验证手段。翻译不是中立的转码工具，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语言转换活动。这种对外来翻译文献的依赖，使得知识的生产从一开始就受制于翻译行为的内在特征[12]。《海国图志》中的科技知识多源自艾儒略《职方外纪》、玛吉士《地理备考》等西方典籍的编译。由于自身缺乏验证能力，只能将西方之言说视为真理。知识的可靠性依赖于信息来源的权威性。格致学的转变则实现了方法论的自觉转型，将实验与验证确立为知识生产的核心原则。《格致汇编》大量刊载实验报告与仪器制作图解，详细介绍实验器材、操作步骤、观察结果与结论推导过程。《格致须知》特别注重对科学方法的阐释，引导读者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将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可重复、可验证的科学方法之上。概言之，新兴

志书的知识权威来自西方他者，格致学知识权威来自科学方法，是一种内在的、主动的权威。

（二）从格致学到科学的跨越

晚清时期科学知识变革史，是一部传统认知框架与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碰撞与重构的历史。格致与科学的概念迭代根植于中国知识界对自然知识如何获得、知识的合法性标准为何等根本问题的重新思考。格致一词从儒家经典中的认识论命题，演变为Natural Philosophy的汉语载体，再到被Science取代的历程，勾勒出中国从传统思辨性认知模式向近代实证性科学体系跨越的清晰轨迹。

1. 格致作为Natural Philosophy的汉语诠释。格致之溯源，其本初意涵深植于儒家思想的认知传统。朱熹将其阐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强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探究来贯通天理，实现道德与认知的统一。格致命题在传统中国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目标紧密绑定。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方自然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传统格致之概念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用以对译西方的Natural Philosophy。需注意的是，在该概念引入初期，学界多将其译为格致，而非今日通行的自然哲学。

从格致的近代转义实践看，19世纪中叶以降，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封闭的知识格局，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传教士译著、洋务运动实业需求等多重路径传入中国。此时，中国本土词汇中缺乏能够精准对应Natural Philosophy的概念，格致因其探究事物之理的核心意涵，成为译者们的首选译词。19世纪70年代以降，一系列以格致为名的自然科学译著相继问世，构建起格致与西方自然哲学的稳定关联。《格致启蒙》中第二卷专论格物学，涵盖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等近代物理学核心内容，如其序言明确认为格物学就是究物质之理，明自然之法，是西学之基础，将格物学等同于西方物理学。《格物测算》以数学方法阐释物理现象，将格物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突破了中国传统格致的定性思辨局限。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13]。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为格致译著的重要阵地，徐寿、华蘅芳等学者翻译的《格致汇编》《格物入门》等著作，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知识，将格致界定为专究自然之理的学问。申言之，其一，译著内容以自然科学领域为主，与Natural Philosophy探究自然现象的范畴如出一辙；其二，译者多采用格致与学科后缀之命名方式，既保留传统概念的认知基因，又试图区分不同自然知识领域；其三，译著在阐释格致时，逐渐剥离其传统伦理内涵，强化探究自然规律之属性。格致已从传统儒家的伦理命题，演变为专门指向自然知识的学术概念，成为Natural Philosophy在近代中国的核心诠释。

从格致与Natural Philosophy的异同点看，Natural Philosophy作为古代至近代的自然知识体系，其核心特征是对自然现象的思辨性探究。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Natural Philosophy始终以发现自然的普遍规律为目标，涵盖观察、思辨、数学演绎等多种方式。牛顿的经典著作虽以自然哲学为名，却包含了近代物理学的核心定律与实验方法，体现了Natural Philosophy向近代科学过渡的特征。中国格致学逐步用Natural Philosophy指称格致学。两者均强调通过理性思维把握事物本质。格致与Natural Philosophy的概念内涵相符，成为近代中国对接西方自然知识的思想桥梁。然而，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两者并非完全等同，而如此差异也为后来格致被科学取代埋下伏笔。其一，认知目标的差异。传统格致最终指向道德修养与天理贯通，穷理是为了修身；Natural Philosophy核心目标是构建独立的自然知识体系，追求对自然的客观解释。其二，认知方法的差异。中国传统格致以思辨、类推、直觉为主要方法，缺乏系统的实验验证与定量分析；Natural Philosophy从伽利略开始便逐渐引入实验方法与数学工具，形成观察、假设、实验、验证的认知链条。在《代微积拾级》中，首次使用微分、积分等术语，构建起微积分符号系统，为数学方法论革新提供理论工具[14]。其三，知识形态的差异。传统格致缺乏明确的分科体系；Natural Philosophy从17世纪开始便逐渐分化，力学、光学、天文学等学科逐渐独立，为后来Natural Science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 从Natural Philosophy到Science的近代知识形态转型。19世纪是西方知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Natural Philosophy逐渐解体，Science（即科学）作为独立的知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实现从思辨性自然知识向实证性自然科学的转变，伴随着认知目标、方法、体系的全面重构。中国的“格致”也经历了从概念转化到被科学

取代的过程。

从Natural Philosophy的解体与Science的诞生看，Natural Philosophy的转型经历了数百年的渐进式变革。中世纪时期，scientia（即拉丁语中的知识）被纳入经院哲学体系，自然知识作为Natural Philosophy的核心内容，服务于神学教义的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被奉为权威，思辨成为主要认知方式。此时，Natural Philosophy尚未形成独立的知识形态。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开启了Natural Philosophy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伽利略确立了实验方法在自然知识探究中的核心地位，提出用数学语言描述自然的原则，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传统。进一步，牛顿将力学规律与数学演绎完美结合，构建起经典力学体系，虽保留了自然哲学的名称，实则确立了近代科学的核心范式，即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工具、以可验证性为标准。19世纪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加速了Natural Philosophy的解体与Science的独立。传统Natural Philosophy的整体化框架已无法容纳日益分化的自然知识，学科分科成为必然趋势。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成立宣言中明确将Science界定为以实证为基础的自然知识体系，与传统Natural Philosophy的思辨性特征划清界限。

从近代中国格致向科学的概念与观念转变看，Science的诞生与东传，对中国传统格致概念构成了严峻挑战。19世纪末，随着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大规模传入，格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其传统认知框架难以容纳实证性、分科性的科学知识。认知与伦理一体化的目标与科学的客观化追求相冲突，模糊的学科边界无法适应近代科学的分科体系。源自日本的科学一词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逐渐取代格致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概念。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将Science译为日语科学（かがく），取分科之学之意，把握了近代科学的分科性特征。后来，大批中国留日学生与学者将这一译词引入中国，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使用科学一词，严复在《天演论》的按语中提及科学与格致的关系，指出格致的精要者亦归于科学。严复译介穆勒逻辑，强调文化革新离不开思维方式的转换[15]。科学译词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关键在于其抓住了Science的核心特征，弥补了格致的概念缺陷。格致向科学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制度变革、教育改革与思想论战。19世纪末，格致与科学并行使用，概念边界模糊。历史话语的传播，离不开历史翻译[16]。洋务派仍以格致作为自然科学的统称，如京师同文馆设立格致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继续出版格致类译著。但维新派已开始倡导科学。此时的知识界对两者的差异认识尚不清晰，多将科学视为格致的进阶形态。20世纪初，科学逐渐取代格致成为主流概念，制度层面的变革推动观念转型。京师大学堂制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格致科下设立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具体课目，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分科体系正式引入中国教育制度。格致的统摄性地位开始动摇。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学成为新式教育的核心内容，格致逐渐退出教育体系。科学完全取代格致，成为自然知识的唯一合法称谓。

四、余论

从格致到科学的跨越，是中国科学知识体系转型的核心枢纽。它实现了自然知识的中国化诠释，更完成了中国自然认知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洋务运动时期，格致作为Natural Philosophy的早期汉语译词，搭建了中国传统认知与西方自然知识的沟通桥梁，而其探究事物之理的核心意涵与西方自然哲学的理性精神相合，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科学的引入与取代，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主动接受了近代实证科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论，建立起以实证性、分科性、可验证性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体系。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陈独秀、胡适等学者猛烈批判传统格致的思辨性与模糊性，倡导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世界。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科学不仅成为自然知识的代名词，更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的知识生产与社会变革。

回望这一历史进程，可以看到，格致与科学的概念迭代是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主动选择、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传统格致的理性探究精神为科学的引入提供了文化土壤，科学的实证方法与分科体系则弥补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性，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独特路径。

参考文献：

[1]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2-5.

[2]罗滔.逻辑思维在志书编纂出版中的运用[J].出版广角,2022(14):70-73,85.

[3]李银兵,于中鑫.社会与个人:民族志书写的结构性探析[J].学术界,2021(12):86-95.

[4]李银兵,赵琳琳.真善之间: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探析[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9(4):1-11.

[5]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67.

[6]慕维廉.地理全志[M].上海:墨海书馆,1853:3.

[7]许晓东.古籍志书《博物新编》中的科技思想整理与当代价值[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0(2):66-72.

[8]许晓东.洋务时期从格致学到科学的演进逻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41(7):129-134.

[9]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24(5):90-104.

[10]舒艾,熊伟.墨海书馆科学译书的权力关系探究:以《谈天》为例[J].上海翻译,2023(6):78-83.

[11]张玥.《化学鉴原》元素翻译民族化:文化自信与化学术语体系的融合构建[J].海外英语,2024(21):51-53.

[12]傅敬民.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3-104.

[13]许均.翻译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50.

[14]闫春雨,李维伟.《代微积拾级》的翻译出版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37(6):20-24.

[15]宁莉娜.论严复译介穆勒逻辑思想的文化关怀[J].哲学研究,2014(5):121-126,129.

[16]屈文生.历史翻译与中国历史话语的构建与传播[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4):16-26.

From "Zhi" to "Xue":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merging "*Zhi Shu*"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Dur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Xu Xiaod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Chinese traditional *zhi shu* underwent a paradigm shift amid the influx of Western learning, evolving from regional knowledge compilations into systematic carriers of scientific dissemination. The emerging *zhi shu* such as *Gazetteer of the Four Continents, Illustrated Gazetteer of the Maritime Countries,* and *A Short Account of the Globe* transcended the empirical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zhi shu* and facilitated China′s cognitive transition from "learning superior techniques from foreigners" to the "study of natural scien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compilation framework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ical methodologies, these emerging *zhi shu* became crucial media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disciplinary systems in China.

Keywords: era of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emerging *zhi shu*; Gezhi Xue; science

笔与水:中国传统书写工具使用三议

李春桃

(首都师范大学 艺术与美育研究院, 北京 海淀 100089)

摘要:毛笔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书写媒介,其与水的互动关系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书写的物质逻辑与文化品格。从战国时期带插槽和笔套的毛笔雏形,到魏晋隋唐鸡距笔的发明使用,历代工匠不断改进笔头结构,其本质是笔锋含水弹性与墨量释放的不断优化。在日常的使用中,古人通过洗笔对毛笔进行养护。洗笔实践受毛笔古今制作工艺、书画艺术语境和内涵、古今用笔习惯等差异的多重影响,文人群体在"养护"与"即兴"间的辩证选择,折射出传统书写文化的深层矛盾。清代流行的水笔采用麻-毫复合结构与铜笔帽密封设计,实现了"存墨免洗"的功能,既提高书写效率,也体现对材料特性的巧妙利用。毛笔不仅是艺术创作与日常书写的载体,更凝聚着古人处理水、墨、笔关系的智慧,这种"以水养笔"的实践智慧为理解中国书写文化提供了新维度。

关键词:毛笔;水笔;洗笔;物质媒介;技术演进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4

晋成公绥《弃故笔赋》中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志,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1]毛笔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明,既是书写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其独特的构造使文人得以通过墨迹记录历史、创造艺术。西晋傅玄的《笔赋》中有言:"简修毫之奇兔,撰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2]59以此描述文人在艺术创作和日常使用中对毛笔的珍惜和养护。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毛笔,在书画艺术和日常书写中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3]。毛笔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符号,不仅是书写与绘画的核心工具,更是承载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从新石器时代仰韶彩陶上的神秘纹路,到商周甲骨文的契刻痕迹,再到战国竹简上的飘逸墨迹,毛笔的演变轨迹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尽管历代书画理论对笔法、墨法的探讨汗牛充栋,但作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毛笔,其与水的互动关系却长期被忽视。水不仅是墨的载体,更是毛笔性能的激活剂——从创作时对笔锋含水量的精准调控,到使用后对笔毫的养护清洗,再到特殊形制水笔的发明,水始终贯穿于毛笔的生命历程。笔者从物质媒介视角出发,通过梳理毛笔工艺的演进脉络,探讨洗笔习惯的历史成因,考证水笔的技术突破,揭示笔与水的互动如何塑造了中国传统书写文化的独特品格,为理解古代文人的创作逻辑与工具伦理提供新的维度。明人李栩曾说:"笔墨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概也!"[4]可见,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毛笔的起源与技术发展

崔豹《古今注》中牛亨曾说:"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5]毛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彩陶纹饰中,已能观察到类似毛笔笔触的痕迹[6]。这一发现为

收稿日期:2025-02-20

作者简介:李春桃(1999—),女,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哲学与艺术史论。

毛笔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线索。此外，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聿”字，形象化表现了执笔书写的动作，《说文解字》中解释道：“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7]这表明，在先秦时期，毛笔已经在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称谓的差异。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出土的毛笔实物为研究毛笔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证据。现存的毛笔实物，可以按年代排序，揭示出毛笔的早期发展脉络。

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了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目前学界尚无定论）的毛笔实物，杆为竹质，通长23.4cm、笔杆直径0.9cm、笔锋长2.5cm。笔毫用绳捆缚在笔杆上，笔头仍套在竹管内[8]。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则出土了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的完整毛笔，其笔头由兔箭毛制成，竹质笔杆上有髹漆的笔套，笔头结构清晰可辨，为毛笔工艺标准的成熟提供了直接证据，这支毛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普遍认为是现存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一支毛笔[9]。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了公元前316年的苇秆毛笔，全长22.3cm、笔毫长3.5cm；笔筒长24.5cm、直径2.5cm。笔头有麻线缠缚的痕迹，且碳化笔头残留物通过蛋白质组学分析检测出黄鼬毛的特征肽链，这表明战国中期人们已开始探索不同毛料的使用。苇质笔杆细长，末端削尖；笔毫有尖锋，上端用丝线捆扎，插入笔杆下端的銎眼内。毛笔置于笔筒内。笔筒竹质，由两节竹筒套合而成：一端有竹节，另一端填以木塞，中间子母口套合[10]。

通过对这些实物的分析，可以构建出毛笔制作技术的演进序列。从商周时期开始，甲骨文中出现的朱书痕迹表明当时已经使用束毛工具，但没有固定装置。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发现了带有颜料残留的骨管状器，可能是原始的笔具，与殷商时期甲骨上的朱书、墨书痕迹相互印证[11]。进入战国早期，毛笔的笔杆与笔头采用夹裹法，即把笔毛夹在剖开的竹片中并以绳捆扎，这种工艺精度得到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细密线条和竹简的尖细文字笔画的印证。到了战国中期，毛笔制作工艺进行了革新，采用了插槽法，左家公山毛笔的笔腔容积达到12mm^3，可容纳300至400根毛料，并通过丝线缠缚来控制笔锋的弹性。战国至秦代的毛笔则出现了笔杆中空、笔头可更换的设计，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毛笔配备了竹制笔套[12]。笔头的演进大概可以总结为：“由最初将笔毛直接捆扎在笔杆上，发展到将笔杆一端劈开，用劈开的部分自然夹住笔毛，再到将笔毛用丝线缠缚，形成独立制作而成的笔头，再插入为其专门制作的笔杆腔内。”[13]12

到了汉代，毛笔形制和工艺进一步改良，出现了“簪笔”。《汉书·张安世传》记载“持橐簪笔”，将笔杆末端削尖，便于插进发髻中。在马王堆汉墓（约公元前168年）出土的毛笔中，笔杆为竹质并髹漆，长达24.8cm，笔头藏于笔腔内，长约0.6cm。唐代书法艺术达到高峰的同时，毛笔的制作技术也有突破，采用紫毫（兔颈毛）与羊毫的配比。“鸡距笔”的特殊形制广泛流行，此笔笔头短促如鸡距。日本正仓院藏唐笔的笔头长2.3cm，出锋1.1cm，与先前的长毫笔有较大的不同，标志着中国制笔史上从“秦汉长锋”到“唐楷专用笔”的技术转折，其“有心”结构为后世兼毫笔发展奠定基础[14]。

这些早期毛笔的实物，不仅展示了毛笔技术的逐步成熟，还体现了其在书写效率、艺术表现以及文化传播等方面的显著价值。左家公山毛笔的笔锋重量约为0.03g，蘸墨量较竹签笔有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更细的笔锋可以写出更细的笔画，使得竹简上的文字密度从春秋时期的每简8字增至战国时期的每简35字。这一改进极大提高了书写效率[15]。包山楚简中的波磔笔法，展示了毛笔在艺术表现上的突破，例如“乙”字末笔长达0.6cm，墨色从浓至淡渐变，这一效果需要毛笔具备一定的弹性形变（≥15°的变形幅度）[16]。

毛笔的工艺演进不仅提升了书写效能，更塑造了文人与书写工具之间的物质关系。从战国插槽法的标准化到唐代鸡距笔的形制革新，毛笔始终以“含墨—释墨”的动态平衡为核心发展逻辑。这种平衡既依赖于笔头毛料的吸水性与弹性，也与书写者对墨色浓淡的调控能力密切相关。然而，当文人在案头挥毫时，笔尖的水墨交融仅是创作链的一端，另一端则是书写结束后对毛笔的养护——洗笔。这一环节看似简单，实则折射出毛笔与水的深层互动：洗笔既是对墨色的终结，也是对笔锋生命的延续，更暗含着古代文人对工具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二、洗与不洗：中国文人洗笔习惯探究

洗笔是中国书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相应的关注。如今的文化土壤，似乎已经没有毛笔的日常使用的立足之地，当今的人们也大多于笔墨二事颇为疏远，“茫然莫识其梗概”者众多。至于洗笔这样的细微小事，自然更难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向前，洗笔本身丰富的审美意蕴和人文趣味也随着古时的文人一起停留在历史之中。

传世史料中最早谈及洗笔的是唐代李阳冰。其《笔法诀》云：“夫笔大小硬软长短或纸绢心散卓等，即各从人所好。欲作，法匠须良哲，物料精详。入墨之时，则毫副诸勿斜曲，每因用了则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传他手。至于时或命书，兴来不过百字，更有执捉之势，用笔紧慢即出于当人，至理确定矣。”[17]这段话在北宋朱长文的《墨池编•卷二十》中有转载，主要讲的是毛笔的制作、使用和清洗收藏等问题，尤其强调每次用笔之后都要洗濯、收藏好，尽显爱惜毛笔之意。在当今时代，洗笔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流程，但在历代书论画论之中，对洗笔的描述并不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洗笔是用笔之后随手的动作，其本身的理论性并不丰富，历朝历代延续着相同而简单的洗笔程式，似乎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古人是否全都具有洗笔的习惯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古代文人每次用笔之后都会洗笔吗？洗笔是必要的吗？是否存在不需要洗笔的情况或者特殊的不需要洗的笔？古今洗笔采用同样的程式和方法吗？洗笔对于古人和今人具有相同的审美内涵吗？这些问题是许多今日习书画者共同的疑惑，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研究和解答。

在书画创作中，洗笔环节看似简单。如今人们习惯用流水冲洗毛笔，而古代书斋中流水不易获取，更多的还是在固定的器皿中进行洗濯。洗笔时，先将毛笔在笔洗中略微浸泡几分钟，把笔肚中的墨色尽数发散出来，但不能浸泡时间过长。洗笔过程中笔尖朝下，可以用手指轻轻拨弄毛笔，也可以让毛笔在水中轻轻摆动。只待将毛笔洗到提出水面用手指挤压毛笔渗出的水没有墨色，并且用纸或织物将毛笔内残留的水也吸尽，就可完成洗笔的工作。

在今天，由于物质媒介的限制、毛笔工艺的工业化、写字习惯的改变、书法语境的迁移，在写字后不洗笔显然是不可行的。那么，古人究竟是否洗笔呢？在今日的习书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假思索便可回答的问题。从文物遗产来看，全国各地有多处“洗笔池”，更不必提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物笔洗。从文献资料来看，宋代释契嵩有诗名为《洗笔》。可见，洗笔在古代应当是常见的做法。此外，王羲之“临池学书，一池尽黑”的典故，想必也是因为频繁的洗笔和洗砚台而形成的。从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角度来看，这些文物遗产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似乎都为古人用笔后必定洗笔提供了有力证据。

但是洗笔的问题并不能一概而论，由一些文献的记载和实物的遗存而得出“古人在进行书画创作之后一律洗笔”的结论也稍嫌武断。在如今不以毛笔为主要生产生活工具的现代人眼中，毛笔的历史定位和功能意义已经很难得到完全的还原。而毛笔本身，也有着五花八门的种类，不同种类毛笔的洗笔情况也不同。历史上存在一种为了不用洗笔而制作出来的专门性的毛笔——水笔，其在秦朝便已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毛笔古今制作工艺的不同、书画艺术语境和内涵的改变、古今用笔习惯的差异、毛笔功能用途的差异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1. 古今制作工艺的不同。古代的文房四宝，特别是笔和墨，在今天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以笔为例，古时的毛笔使用天然动物纤维制作，而今日的毛笔则在动物纤维中添加尼龙等化学纤维，以降低成本、改善弹性、延长寿命。至于墨水，变化得更为彻底。古时用墨锭、墨条加水研磨成墨汁，如今则普遍使用方便快捷的墨水，随时可以展开创作。两者的成分和使用感已大相径庭。古时研磨的墨汁“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佳”，而现代墨汁则由于工艺统一配比，墨色显得凝滞。此外，墨的光彩源于胶质，古时多用天然动物胶，如鹿角胶、牛骨胶等，这些胶质对毛笔伤害较小。现代墨水则多采用工业胶，附着于毛笔上，干燥后极易损伤毛笔。使用古法墨锭，即便忘记洗笔，只需稍微濡湿笔尖便可化开；而使用重胶墨汁，若不及时清洗，毛笔必须

长时间浸泡才能恢复。由此可见，从笔墨制作工艺的角度来看，“洗笔”这一动作的语境在古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2. 书画艺术语境和内涵的改变。除了毛笔制作工艺的古今差异，古代的书画艺术与今之书画艺术也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以书法为例，古时的书法是文化的载体，如今则主要作为一门专门的抽象艺术存在，其原有的实用功能已被其他媒介所取代。古人使用毛笔的习惯与现代学习书法艺术者已彻底不同。在绘画中亦然，古时的文人画又称为“墨戏”，许多情况下是文人在写字之余，以剩余墨水进行“聊以自娱”的娱乐活动，如今则成为一种小众且学习门槛较高的专门性艺术。

3. 古今用笔习惯的差异。毛笔在书法实践中扮演着消耗品的角色，根据材料不同，一支毛笔的寿命在两千字到五万字之间。较为勤奋的书法家每日练字可达万字。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中有这样的记载：“江浙平章子山公，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得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18]松雪翁即赵孟頫，传闻其一日能写万字。毛笔对其而言自然是快速消耗品，洗笔与否则无足轻重。当然，这也与他的社会阶层、财富水平和个人用笔习惯相关。苏轼曾言：“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19]任何一个书法家的成长都建立在“退笔成冢”“池水尽黑”的刻苦练习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再珍惜毛笔，也无法阻挡其损耗的速度，频繁洗笔或许会成为额外的负担。

因为写字量大费笔而不洗笔的情况还是少数，历史上有条件每日换新笔而不用收纳贮藏旧笔的书法家并不多。古人不洗笔还有着其他方面的考量。若涉及收纳贮藏，则必须面临毛笔干湿的问题，文物储藏中有格言：“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毛笔使用和储藏也是如此。洗笔并晾干收藏固然最佳，但是古人以毛笔为随时使用的工具，且急用笔时再重新研墨蘸笔既琐碎又浪费时间，加上频繁洗笔并不方便，故而古人中有不洗笔的做法。为了保持毛笔湿润便于随时随地书写，古人用笔后将笔头插进竹管或者苇管中暂时保存，待到用时拔出即可，与新蘸墨无异。但是也并非总是不洗，长时间不写时，将笔涮干净后，要自然风干，不再戴笔帽，因为残湿墨极为伤笔。

4. 毛笔功能用途的差异。民国书法家马衡在《我教你写字》中分析了洗笔之法，在强调洗笔的重要性之外，还描述了一种不洗笔的情况：“墨由烟与胶制成。笔毫濡墨，湿时挥洒自如，干时凝为坚硬。以坚硬之笔，触坚硬之物，则锋折。欲保持锋之不折，必须于用过后洗净其墨，阴干而藏之，非惟不折，且不蠹蚀。又新笔皆用胶黏，最易生蠹，亦宜洗净俘藏。洗笔忌用温水或热水，因笔毫遇热水，每易拳曲，不可不知。终日常用的笔，不便常洗，最好用铜笔帽套起来，亦保持不干的一法。”[20]因此，毛笔总是保持湿润的状态，比起不洗笔而让其自然风干，湿润对毛笔的伤害反而小些，再加上这种状态所使用的毛笔，每日承担的字数一定是较多的，所以对保存的寿命倒也没有那么在乎。

绘画和书法的洗笔情况并不相同。书法在审美性质之外，更多地承担实用性质，以起到保存信息、沟通交流、继承文化等作用。而绘画则以审美性为主体，尤其在文人画占据主流地位之后，无论是写意还是工笔，对墨色的要求都非常严苛，干湿浓淡都要经过仔细考量和经营，宿墨凝结而成的“墨星”会损害画面的协调统一。五代画家荆浩在《画说》中说：“朝洗笔，暮出颜。勤渲砚，习描戳。”[21]他强调洗笔的重要性，前一天残留在笔间的墨不可用，每天作画的第一件事就是洗笔，毛笔干净，才能达到对墨色的精准控制。反观书法，作为日常工作学习和沟通交流的媒介，单纯的艺术创作与实用性的书写实难区分，写字的频率也远远高于审美性的绘画，出于实用目的的书写，即使是宿墨也并非不可用，保存良好、长时间不洗的水笔也色泽鲜艳，所以对于书法而言，洗笔的要求不如绘画一般严格。

因此，是否洗笔会因古今制作工艺的不同、书画艺术语境和内涵的改变、古今用笔习惯的差异、毛笔用途及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答案，并不能一概而论。洗笔习惯的多样性暴露了毛笔作为“活体工具”的脆弱性——频繁洗笔虽能延长笔锋寿命，却与文人即兴创作的需求相矛盾。在这种矛盾中，水笔的流行成为一个显著的趋势。它不仅是对洗笔流程的物理简化，更是对毛笔与水的关系的重新定义：通过特殊的毛料配比与笔套设

计，水笔将“含墨—释墨”的循环从“书写—洗笔—再书写”压缩为“持续书写”，使水不再仅是清洗媒介，而成为维持笔锋活性的恒定要素。这种技术突破不仅改变了文人的书写方式，更将笔与水的互动从“消耗性”转向“共生性”，为传统书写工具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三、水笔考证

在古代有一种特殊设计的不需要洗的毛笔——水笔，可能已经不再为今日之习书者所熟知，但是它却曾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今的人们可能较难想象毛笔使用之后不需洗濯，而可以用笔帽套住随身携带、随时取用的场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毛笔早已被更为便捷的钢笔、中性笔取代，不再流行于文人的案头，也不再是文化传承和艺术创造的主要载体。古代水笔以小楷笔为主，笔头的心以短狼毫掺以麻纤维制作，外被短兔毫。麻纤维内部孔隙多，形成毛细管系统以便于吸水储墨，其亲水性确保墨水浸润扩散，适中长宽比使笔头柔软有弹性。短兔毫表面鳞片结构助墨水附着，细密结构可以有效防止墨水过快蒸发，角蛋白构成具有柔韧性和弹性，可控制墨水流出与线条变化。两者协同提升水笔性能。水笔使用时笔头全开，用后套上铜笔帽，帽内少留一些水分，以保套内湿润，养护笔锋。

“水笔”这一名词在今天依然广泛使用，但是不再指一种特殊形制功能的毛笔，而是泛指所有能够储存墨水、方便使用的笔。古代的“水笔”的概念也较为模糊不清，在远古时期并无“水笔”的概念，但最早的毛笔大多配以笔套，涵水使用，这可以视为今日“水笔”的前身。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水笔”种类，200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文房用品辞典》中将“水笔”定义为：“水笔：毛笔笔式之一。其笔头一般以短狼毫掺以白麻丝为心，外层则以兔毫为被。因麻丝能多含水分，故此笔用后宜套于铜笔帽中，使笔头上经常保持一定水分，故称水笔。”[22]我们可以得出水笔的基本特征：一则在于其特殊的笔头用料以多吸水分；一则在于其配以笔帽以保持水分。

考古发现，早期的毛笔都是配笔套使用的。《文房四谱》卷二《笔谱下•五之辞赋》转载了晋成公绥所作《弃故笔赋》，其中有句云：“建犀角之玄管，属象齿于纤锋。”苏易简句下小注：“答也。”同书卷一《笔谱上•二之造》苏氏说：“宣城之笔，虽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2]61王学雷先生在《古笔》中考证“答”之所指正是“笔帽”[13]98。战国秦汉的毛笔，大都是整支放在竹木套筒中。至西晋时期，才普遍使用单独笔套，西晋文学家成公绥说的“属象齿于纤锋”就是指单独的象牙笔帽。宋代以后，毛笔基本都配以笔套使用。一般来说，水笔都是带笔套涵水使用的，是否带笔套的毛笔都是水笔呢？这还要结合毛笔的使用场景以及笔尖的材料综合分析。

（一）水笔的历史演变与考古证据

1954年发掘于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时期的毛笔，长期被视为考古发现的最古老、最完整的一支毛笔。这支笔出土时毛笔收纳于竹制笔套之中，毛笔笔头为上好的兔箭毛，选料已十分精致，笔杆系竹制，裹以麻丝，髹以漆汁，笔锋尖挺（见图1）。可见最早的毛笔的形制和材料与如今的水笔已经十分相似。该毛笔出土时置于竹筐内，笔头完全收纳于竹制笔套中。伴随出土的铜削、竹片及小竹筒三件器物，考古人员推测其为战国时期书写工具组合：铜削用于刮削竹片表面，竹片作为书写载体，小竹筒则可能用于储存墨料。此毛笔的发现为探讨汉字书写载体演变、先秦文书制度及毛笔工艺标准化进程提供了关键物证，也让人思索是否早期的毛笔都是涵水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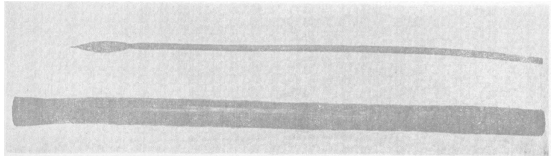


图1　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的毛笔和竹笔筒[9]

战汉时期，毛笔笔套形制丰富多样，主要包含短套、长套以及双联套三种类型，制作材质多为竹子与木胎漆器。短套的外观与现代常用的毛笔套、钢笔套极为相似。长套在当时是最为常见的主流形制，从战国一直流行至汉代，其分布范围广泛，在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出土。人们使用长套时，会先将毛笔缓缓插入并推送至笔套底端，直至整支毛笔的笔毛完全纳入笔套，且笔尖朝上放置，这样的方式能有效避免笔尖受损，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双联套同样存在长短之分，其使用方式与单管的长套、短套别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长套、短套，还是双联套，它们都具

备一个显著的结构特征：一端呈封闭状态，而另一端则为开口设计[23]。

水笔与普通毛笔在外观上最大的差异在于笔套的存在，储水入套可保持笔的湿润度，方便随时书写，又由于竹制笔套水分容易挥发，后改用金属制作，“铜笔套”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具。有了笔套之后，文人就可以随身携带笔墨，而不必重复文房中的繁琐流程——润笔、研墨、调墨……拔开笔套之后可以随时写字，而储水量丰富的水笔可以连续写很多字[24]。中国水笔通过麻-毫复合结构实现双模储墨机制：苘麻纤维通过毛细管系统储存基础墨量，动物毫毛负责精准释墨。这种设计使连续书写达上百字而无需蘸墨，远远优于当时欧洲流行的羽毛笔。

水笔的演变轨迹始终与社会需求紧密交织。战国至唐代，水笔的雏形设计主要服务于文人对便携性的追求，但真正推动其技术革新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唐代。在唐代科举制度下，考生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量小楷书写，频繁洗笔不仅耗时，还可能因墨色不均影响卷面工整度。据《唐摭言》记载，进士科“试杂文两首，诗赋各一篇”[25]，考生需保持笔锋锐利、墨色稳定。水笔通过优化毛料配比与涵水结构，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其“涵水不洗”的特性，既避免了洗笔耗时，又确保了墨色均匀，成为唐代文人应对科举考试的实用之选。这一时期，水笔的普及与楷书艺术的繁荣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科举制度将书法纳入人才选拔标准，推动了水笔工艺的精细化；而水笔的技术进步，又进一步提升了小楷书写的效率与美观度。

（二）清代水笔的形制与应用

至清代，军机处的设立使文书处理进入“密折时代”。据《清代军机处档》记载，军机处每日需处理几十甚至上百件奏折，要求字迹清晰、便于快速誊录，皇帝如将紧急事当时交下，军机大臣随撰随进，动笔千言，自起草至誊清只需一二时[26]。传统毛笔因需频繁洗笔、易晕染的缺陷，难以适应高强度的政务需求。水笔凭借其密封性强、出墨均匀的优势，成为军机处书吏的首选工具。为满足军机处对文书缮写的高效要求，水笔匠人在笔套设计、毛料弹性及储墨量上进行了针对性改进：采用多层毛料复合工艺增强笔锋韧性，增加笔杆容量以延长书写时间，甚至出现了“紫毫水笔”等专为精密书写定制的品类。这些技术升级不仅提升了水笔的实用性，更反映了清代官僚体系对文书处理效率的极致追求。

在明清时期，水笔中较为著名的名目有：乌龙水、奏本、绿颖、京庄等，笔头多短而锐，宜于书写小楷，旧时多用于缮写公文及记账之用。清梁同书《笔史》云：“刘必通、孙枝发，今世京师散卓水笔，此二家最擅名。”[27]清代文人李葆恂的《旧学庵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描述了这位极具个性的笔工刘必通，他坚持一天只做一支笔，而技艺绝佳，所制之笔名动京师。笔工在书画艺术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技近乎道，虽为工艺，也与书道同理[28]。由此绝技制作出来的水笔经久耐用，梁同书曾用刘必通所做的三支笔抄了一部文选，可见不是虚言：

京师虎坊桥南有笔肆一间，榜“刘必通”三字，梁闻山先生（巘）笔也。必通浙江湖州诸生，嗜酒好色。北来赴京兆试，与某伎呢，不肯归。三试不第，尽丧其资。其老仆曾为笔工，乃制笔以为活，久之，必通亦善艺，所制出诸笔工上，其水笔尤为绝技。又说刘一天只肯制笔一枝，自称“吾所制，若能书者，日书三万字可用三月。”[29]

《米庵藏笔谱》是日本书法家市河米庵的一部毛笔品评著作。市河米庵将收集到的218支中国毛笔原貌以彩色细致勾勒描绘，还在毛笔图录左侧附上其对毛笔的品评。其中所画清代笔，有多个“京毫水笔”字样，可知在当时水笔应该是一种常见的形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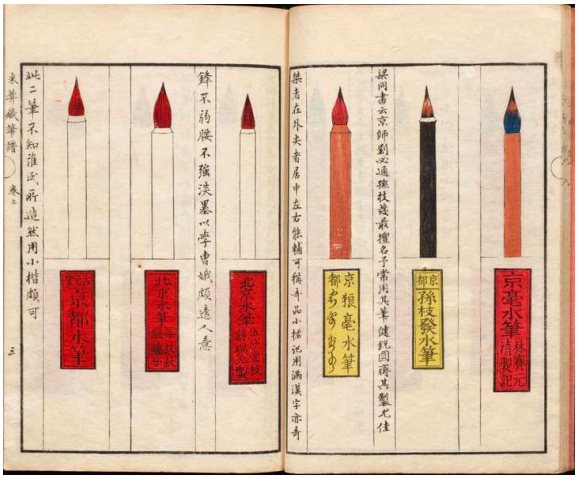


图2 《米庵藏笔谱》中的京毫水笔[30]

清代时期，水笔盛行于世，彼时北方水笔与南方轻笔在市场上各占份额，不分伯仲。清代连朗所著《绘事琐言》以及民国黄濬所撰《花随人圣庵摭忆》，均对水笔的制作工艺、实际应用等问题展开

了详尽论述。如连朗的《绘事琐言》中说：

北方水笔，南人不能造；南方轻笔，北人不能造。北方毫，多性硬，必以毛带毫制成水笔，一开到根尖而有力，且地方风燥，轻笔易秃也。南方毫，多性软，必胶黏过半，制成轻笔，但用其尖，乃能瘦硬。且地卑气润，水笔太软，故有名为水笔，而实则轻笔也。[31]

这里连朗所说的水笔和轻笔似乎更加强调的是毛笔开笔的程度和使用时含水量的多少。北方水笔所用毫性硬，有时还会夹杂苘麻，开笔时墨汁可以直达根部，书写有力，吸墨性强。盖因北方气候干燥，使用轻笔容易秃毛；而南方水笔所用毫性软，需要用胶粘起大半，做成“轻笔”，这种笔只用笔尖，即使蘸墨，笔腹后半段也是干的，书写起来有种瘦硬之感。

至于连朗所说的清代北方水笔的制作工艺，我们可以从如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水笔中寻觅身影，扬州水笔以其麻胎作衬、带水入套、涵水不漏的特点而独树一帜。明高濂的《遵生八笺》载：“扬州之中管鼠心画笔，用以落墨白描佳绝，水笔亦妙。”扬州水笔复杂而独特的制作工艺使得水笔并不需要洗笔，而可以长时间保持湿润[32]。当时的水笔不仅在中国市场占据半壁江山，也远销国外，在琉球等地大受欢迎。琉球史料《历代宝案》中就记载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徐葆光使团带到琉球的商品中，有京水笔30支[33]。

水笔的发明发展打破古代文人书斋创作局限，方便他们随时随地创作。相传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极为刻苦，为随时记录灵感，将碎墨放铜笔帽中泡开，与毛笔、宣纸等裹好随身携带。无论在家还是出门，遇到好山水、妙言语或美景，他都能随时掀开包袱记录或作画，回家再琢磨。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呕心沥血创作”的母题，从李贺到曹雪芹，便携水笔作为关键物质媒介，让文人能抓住书案外转瞬即逝的神思。水笔的发明发展，使文人不用频繁洗笔而能随时创作，体现其创造激情与对时间精力的珍惜。

四、结语

毛笔与水的共生关系，深刻形塑了中国传统书写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从原始彩绘到成熟书写体系，历代工匠通过水法调控与工艺革新，不断突破工具性能的边界，使毛笔超越实用范畴，成为承载艺术灵性的文化符号。洗笔实践的多样性，既折射出文人群体在工具养护与即兴创作间的辩证选择，也揭示了书写文化中“技”与“道”的永恒张力。水笔“涵水不洗”的智慧，更以独特的材料耦合重构了人、工具与自然的互动范式，彰显中华文明“道器相生”的深层逻辑。今天，当电子屏幕逐渐取代纸笔，回望毛笔与水的互动历史，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传统工艺的精妙，更能启发我们思考：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保持人与工具之间的温度与灵性。这些思考，或许正是古老智慧对现代生活的馈赠。

参考文献：

[1]严可均.全晋文：卷五九[M]//孙启治，陈建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1796.

[2]苏易简.文房四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

[3]厚宇德，马青青.文化与工具形态相互影响之例证[J].台州学院学报，2016，38(2)：38-42.

[4]张小庄，陈期凡.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148.

[5]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刘彦湖，莫武，蔡梦霞，等，编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7.

[6]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0.

[7]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7.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66.

[9]吴铭生.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4(12)：3-19.

[10]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6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1958—1961[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32.

[12]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6.

[13]王学雷.古笔[M].北京：中华书局，2022.

[14]朱友舟.鸡距笔考[J].书法，2013(7)：98-101.

[15]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133.

[16]朱乐朋，杨磊，王芳.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书法 简牍帛书[M].北京：开明出版社，2021：30.

[17]朱长文.墨池编汇校[M].陈志平，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78.

[18]陶宗仪.陶宗仪集[M].徐永明，杨光辉，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277.

[19]苏轼.苏东坡全集:中[M].邓立勋,编校.合肥:黄山书社,1997:471.
[20]马衡.我教你写字[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32.
[21]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上卷[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13.
[22]上海书画出版社.文房用品辞典[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11.
[23]刘照建.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双联玉管功用考析[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56-62.
[24]石庆鹏,管世俊.毛笔与书画[M].扬州:广陵书社,2015:6.
[25]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M].2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246.
[26]李国荣.清宫档案揭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52.
[27]周用金.书法术语[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219.
[28]朱友舟.中国古代毛笔研究[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3:187.
[29黄裳.书海沧桑[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244-245.
[30]米庵.米庵藏筆譜:上卷[M].影印本.[出版地不详]:尾陽大學堂,1834:3.
[31]迮朗.绘事琐言;绘事雕虫;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录[M].贾素慧,校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116.
[32]高濂.遵生八笺:卷三 文白对照[M].谦德书院,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21:1088.
[33]蔡铎,等.历代宝案(十五)[G]//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1辑 第15册.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369.

Writing Brush and Water: Three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ing Tools

Li Chuntao
(Institute of Ar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writing mediu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writing brush's interaction with water has profoundly shaped both the material log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embryonic forms of writing brushes with slots and sheath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jiju brushes (chicken-claw-tip brushes) during the Wei,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rtisans across generations continuously refined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brush tips. This evolution essentially reflects an ongoing optimization of the elasticity of water retention in the bristles and the controlled release of ink. In their daily use, ancient scholars tended their brushes by rinsing them after use. Brush-cleaning practices we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historical shifts in brush-making techniques, the artistic context and connot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evolving usage habits. The dialectical choices made by literati between "maintenance" and "spontaneity" reveal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within traditional writing culture. The shuibi (water brushes), popularized in the Qing Dynasty, employed a hemp-hair composite structure and a sealed copper cap design to achieve "ink preservation without cleaning".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enhanced writing efficiency but also exemplified ingenious utilization of material properties. The writing brush transcends its role as a mere tool for artistic creation or daily writing — it embodies ancient wisdom in harmonizing water, ink, and brush dynamics.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nurturing the brush with water" offers a new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writing traditions.

Keywords: writing brush; shuibi (water brush); brush cleaning; material medium;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和合之道的东亚涵泳之范：崔致远“致中和”的三重视域与文化史价值

李建军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崔致远是统一新罗时期的大文豪，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影响。在思想观念上，以儒为本，又“以儒譬释”，指出儒、释“二教一揆”，又主张“心融鼎教”，会通儒、释、道三教，呈现出融汇众说的“中和之境”。在文学书写上，诗有“幽艳晚香之韵”的晚唐诗共性，亦有“平易近雅”“明水之质”与“黼黻之美”兼具的特质；文章上有晚唐文主骈俪、尚绮丽共性，又有“华而不浮”“绝不以雕镂为工”的特质；诗文均做到了情与理、文与质的精妙平衡，呈现出自出机杼的“中和之美”。在文化交流上，作为融会唐罗的文明使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成功地将大唐文化恰切地移植到新罗土壤，并加以本土化诠释和创新，用诗笔发出文明互鉴的“中和之响”。崔致远“致中和”的三重视域，堪称东亚文人涵泳和合之道的生动范例；和合之道作为东亚的“共同记忆”，是可以用来推动当今东亚文明对话与互鉴的“精神基质”。

关键词：崔致远；和合之道；中和之境；中和之美；中和之响；文明互鉴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5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和合之道，渊源于中国，流播于东亚，已成为东亚儒学文化圈共享的核心理念之一。孔子言“礼之用，和为贵”，《国语》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庸》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经典表述经由汉字文化圈的传播，成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知识精英共同的思想资源。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各国在接受过程中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基于自身的历史语境进行了重新诠释，形成了“一本而万殊”的生动格局。

崔致远（857—？）是统一新罗时期的大学者、文学家，在朝鲜文学发展史及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朝鲜思想学术界誉为“东国儒宗”[1]，“四海第一人物”[2]830，“生乎东国而其文章事业至于驱驾中原、暎曜后世者，千古一人”[3]，同时亦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被誉为“唐代军幕文学的重要作者”“来唐外国人中文学成就最杰出的一位”[4]。尤可称道的是，崔氏在思想旨趣、文学书写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均娴熟运用和合之道，臻于中和之境。

关于崔致远的生平履历，《三国史记》卷四六[5]527-529有较详细记载，可见其早年来华求学、及第入仕（12岁到29岁），壮年归国效力、壮志难酬（29岁到42岁），晚年归隐山林、游历江海（42岁到去世）的传奇人生。关于崔致远的著述，中国学者李时人、詹绪左参考朝鲜学者成大庆所编《崔文昌侯全集》，博采众书再辑佚，编校而成《崔致远全集》，于201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集荟萃了目前所见的崔致远的全部著述，收入《桂苑笔耕集》《孤云先生文集》《孤云先生续集》三种，另外附加两个辑佚：《新罗殊异传》的佚文和其他佚文佚诗。该集总计收入崔致远存世诗文485篇（首），其中诗歌119首（内10首为残篇）、文章366篇（内1

收稿日期：2026-05-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14世纪东亚汉文学与儒学交汇理路研究”（22BZW073）

作者简介：李建军（1974— ），男，四川大竹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儒学典籍、10—14世纪东亚汉文学。

篇有目无文,3篇仅存残句),是目前崔致远诗文搜罗最全之集。本文所论,即据此书。

一、思想旨趣的“中和之境”:心融鼎教的内在理路

崔致远的时代,儒释道三教互动共生,各展异彩。崔致远虽以儒为本,但兼容释道,“中和”是其处理三教关系的方法论,即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三者之“中”道,汇归于一个和谐共存的“和”境。

(一)乱世儒者的心路历程

崔致远作为大唐宾贡进士,熟稔儒学经典,崇奉儒家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前半生可谓醇正的儒者,其《桂苑笔耕集》中有大量诗文可以为证。崔致远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经某位客将(出身外蕃的军官)引荐,成功进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崔致远写了《与客将书》致谢,书中所云“来自异乡,勤于儒道”,又云“以诗篇为养性之资,以书卷为立身之本”[6]461,既是崔致远“勤于儒道”的自我表白,也是其以儒立身的真实写照。同年,崔致远作《初投献太尉启》《再献启》《献诗启》《七言记德诗三十首献司徒相公》等诗文献予淮南节度使高骈,其中《再献启》有云“且某也兔丝虽络,蛛网自营,万计寻思,不如学也;百年勤苦,犹恐失之。所以未竞宦途,但遵儒道”[6]394,于此可见崔致远“但遵儒道”的人生信条。《献诗启》有云“如某者,迹自外方,艺唯下品。虽儒宫慕善,每当窥颜、冉之墙;而笔阵争雄,未得摩曹、刘之垒。但以幸游乐国,获睹仁风,久贮恳诚,冀伸歌咏”[6]398,其中“儒宫慕善”“获睹仁风”云云,体现出崔致远对“仁”“善”等儒家信条的崇奉。

唐僖宗广明二年(881),崔致远署充淮南幕府馆驿巡官,获得官宅安身,作《谢借宅状》献高骈,其中有云:“尝读《鲁论语》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以望东开之阁,永誓依仁;坐北面之窗,惟期肄业。非敢隐居而不嫁,只将直道而自媒。”[6]409其“永誓依仁”的表白,可见其“士为知己者用”的儒者情怀。

《与金部郎中别纸二首》其一有云:“不审近日尊体寝膳何似?既明且哲,则《诗》美贤人;视履考祥,则《易》称君子。既乐持盈之道,固安养素之机。”[6]458可见其对儒家经典的熟稔和对儒家信条的尊尚。其二有云:“某仰审格言,侧窥性行。人能弘道,贤臣以致尧、舜为先;世实须才,俊士以效巢、由是耻……然则致尧、舜之大猷,永匡宸扆;效巢、由之小节,不介尊襟。某远卖鲛绡,惭非重价;仰趋马帐,忝预生徒。”[6]458-459更是直接表达入世建功(“致尧、舜之大猷”)而非逃世隐逸(耻“巢、由之小节”)的儒家宗旨。

《奏请从事官状》有云“伏以臣子之所以立身者,以孝以忠,慎终如始。若遂荣亲之望,必勤事主之诚”[6]79,也是标准的儒家忠孝信条。《谢令从军状》有云“伏以某尘中走吏,海外腐儒”[6]412,《贺除吏部侍郎》有云“今远人称尼父生徒,光辉无比”[6]452,其中“海外腐儒”“尼父生徒”均为崔致远自称,可见其对自身儒者的角色认同。

唐僖宗中和五年、新罗宪康王十一年(885),崔致远回到新罗。他开始时满腔热血,欲以在大唐之所学,助新罗之振兴,有醇儒的报国之志。他先后担任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事、泰山郡太守、富城郡太守、阿餐、防虏大监兼天岭郡太守等官职,尽忠职守,显示出儒者积极用世、经世济民之苦心孤诣。

回国当年,崔致远撰《大嵩福寺碑铭并序》。开笔从儒家“政以仁为本,礼以孝为先”说起,接着逐层推演,然后指出“是知敦睦九亲,实惟绍隆三宝”[6]626,将儒家的“敦睦九亲”与释家的“绍隆三宝”融通,初步透露出崔致远“以儒譬释”的讯息。

新罗真圣王八年(894),崔致远有感于国势日蹙,曾向君王上《时务策》企图补偏救弊、力挽狂澜。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云:“真圣王八年春二月,崔致远进时务一十余条,王嘉纳之,拜致远为阿餐。”[5]160可惜的是,该时务策已佚,具体内容无由得见,但崔致远赤诚为国的儒者情怀灼然可见。

新罗末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崔致远有心匡时,却无力回天,于是在新罗孝恭王二年(898)前后,归隐山林。崔致远这种有心经世却无奈归隐的历程,《三国史记》本传有清晰阐发:“致远自西事大唐,东归故国,皆遭乱世。屯邅蹇连,动辄得咎,自伤不通,无复仕进意。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啸味风月。若庆州南山,刚州冰山,陕州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合浦县别墅,此皆游焉之所。最后带家隐伽耶山海印寺,与母兄浮图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偃仰,以终老

焉。”[5]528由此可见崔致远作为乱世的儒者，“自伤不通，无复仕进意”“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的心路历程。

（二）“以儒譬释”与“二教一揆”

崔致远作为一位9世纪后期的儒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在东亚世界盛行的佛教的较深影响。其著述中涉及佛教的诗文，不胜枚举，就文章而论，至少有下述作品：在大唐学习工作时期，撰有《奏请僧弘鼎充内僧正状》《谢许弘鼎充僧正状》《求化修大云寺书》《谢借示法云寺天王记状》《题海门兰若柳》等；回到新罗入仕期间，撰有《海东华严初祖忌晨愿文》《故终南山俨和尚报恩社会愿文》《华严社会愿文》《华严经社愿文》，《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大唐新罗国故凤岩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并序》《有唐新罗国初月山大嵩福寺碑铭并序》（上述四篇简称“四山塔碑铭”“四山碑铭”），《海印寺妙吉祥塔记》，等等；退隐之后，撰有《新罗伽耶山海印寺结界场记》《新罗伽耶山海印寺善安住院壁记》《释顺应传》《释利贞传》《浮石尊者传》《法藏和尚传》《新罗寿昌郡护国城八角灯楼记》等。

崔致远不仅有大量的涉佛诗文，而且有渊深的佛学造诣。试以《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为例管窥之。该文将法藏和尚所著《华严三昧观》的“直心中十义”，即“一族姓广大心、二游学甚深心、三削染方便心、四讲演坚固心、五传译无坚心、六著述折伏心、七修身善巧心、八济俗不二心、九垂训无二心、十示灭圆明心”[6]729-746，逐个与法藏和尚的生平行事巧妙结合，将传主之践履与其所论之进学阶段一一绾合，凸显传主知行合一之高德。该文既可见崔致远驾驭文章之高才，亦可见其钻研佛学之洞见。

崔致远对佛教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佛教的理论体系比儒教更为精深。其《真鉴和尚碑铭并序》云：“沈约有云：‘孔发其端，释穷其致。’真可谓识其大者，始可与言至道矣。”[6]610崔致远赞同沈约“孔发其端，释穷其致”之论，认为儒教与佛教有“端”（开始）与“致”（极致）之别。其《智证和尚碑铭并序》有云：

麟圣依仁乃据德，鹿仙知白能守黑。二教从（徒）称天下式，螺髻真人难确力。十万里外镜西域，一千年后烛东国。鸡林地在鳌山侧，儒仙自古多奇特。可怜曦仲不旷职，更迎佛日辨空色。[6]658

这段铭文乃是崔致远权衡三教的经典言论。崔致远既肯定儒教之优长（“麟圣依仁乃据德”中“麟圣”指孔子，“依仁乃据德”指儒教有依仁据德之胜），亦肯定道教之优长（“鹿仙知白能守黑”中“鹿仙”指老子，“知白能守黑”指道教有安弱守雌之质），但更为肯定佛教的精深，认为儒、道二教与螺髻真人（即释迦摩尼）的佛教相比，乃是“从（徒）称天下式”。这段铭文中“可怜曦仲不旷职，更迎佛日辨空色”，更是表达了佛教在儒教、道教受容于新罗之后，终于风行于鸡林的欣悦。于此可见崔致远对三教的权衡。

值得注意的是，崔致远对佛教的认同应该有一个嬗变过程。在大唐研学、任职期间，崔致远以儒自命，著述中虽有涉佛诗文，但未必真正服膺佛教。回到新罗任职期间，受到佞佛的时代风气影响，崔致远奉敕结撰了不少佛教寺庙、高僧的碑铭，自己也有不少涉佛诗文，崔致远此期对佛教有更深的体悟。晚年“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乃至“最后带家隐伽耶山海印寺”，这个时期，佛教在崔致远生命中应该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崔致远回到新罗后与佛教的接触虽日益亲密，但其对佛教的认知却始终不离儒学，很多情况下都是“以儒譬释”，而且扬佛之际并不抑儒，往往是主张佛、儒的二教一揆。

所谓“以儒譬释”，即以儒教之道比拟、诠释佛教之理。《智证和尚碑铭并序》明确提出“以儒譬释，自迩陟远”[6]653，认为儒道近而释道远，要参悟释道，则需借助儒道，即借用儒教之理比拟和体悟佛教之理。《善安住院壁记》云：“则大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幽人贞吉，其履道乎？幽人何谓？梵子或亦近是。援儒譬释，视古犹今。”[6]567指出释家之“梵子”接近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儒家之“幽人”，明确提出“援儒譬释，视古犹今”，以儒家之理来诠释释家之理。《真鉴和尚碑铭并序》云：

至若佛语心法，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说无可说。虽云得月，指或坐忘，终类系风，影难行捕。然陟遐自迩，取譬何伤？且尼父谓门弟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则彼净名之默对文殊，善逝之密传伽叶，不劳鼓舌，能叶印心。言天不言，舍此奚适？[6]610

崔致远认为“佛语心法，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说无可说”，要理解之，可以“陟遐自迩，取譬何伤”，即可“取譬”于近处（“迩”）的儒家之理，来帮

助理解远处(“遐”)的释家之理。然后用孔子启导弟子的“予欲无言,天何言哉”,比拟“净名之默对文殊,善逝之密传伽叶”,都是“不劳鼓舌,能叶印心”。

再看崔致远的“二教(儒、释)一揆”相关论述。《真鉴和尚碑铭并序》云:

夫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是以东人之子,为释为儒,必也西浮大洋,重译从学。命寄刳木,心悬宝洲,虚往实归,先难后获。亦犹采玉者,不惮昆丘之峻,探珠者,不辞骊壑之深,遂得慧炬则光融五乘,嘉肴则味饫六藉,竟使千门入善,能令一国兴仁。而学者或谓身毒与阙里之说教也,分流异体,圆凿方枘,互相矛盾,守滞一隅。尝试论之,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礼》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故庐峰慧远著论,谓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所归一揆。体极不能兼者,物不能兼受故也。[6]609-610

崔致远针对部分学者“身毒(印度之佛教)与阙里(曲阜之儒教)之说教也,分流异体,圆凿方枘,互相矛盾”之论,接连引用《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礼记》“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慧远“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所归一揆”,说明佛教与儒教并非“互相矛盾”,而是“殊途同归”(“发致虽殊,所归一揆”)。

《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中,崔致远借献康王之口说道:“三畏比三归,五常均五戒。能践王道,是符佛心。”[6]585将儒教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五常”(仁义礼智信),比拟为佛教的“三归”(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并明确提出“能践王道,是符佛心”,将儒教的“践王道”,诠释为佛教的“符佛心”。于此可见崔致远会通儒、佛的努力。

《智证和尚碑铭并序》云:“五常分位,配动方者曰仁;三教立名,现净域者曰佛。仁心则佛,佛目能仁,则也。导郁夷柔顺性源,达迦卫慈悲教诲,实犹石投水,雨骤沙然。”[6]646崔志远将儒教的核心术语“仁”,与佛教的核心术语“佛”(觉悟),进行关联,认为“仁心则佛,佛目能仁”,儒教与佛教有内在相通之处。

(三)“包含三教”与“接化群生”

崔致远不仅“以儒譬释”,强调儒、释“二教一揆”,更注重儒、释、道的“三教会通”。崔致远在大唐时作《谢许弘鼎充僧正状》,有云:“伏以弘鼎久勤转念,辄具荐论。觖资十地之因,遽荷九天之宠。元戎获请,喜三教之并行;法侣欢呼,惊一佛之或出。”[6]83其中“喜三教之并行”云云,已道出崔致远其时虽以儒立身但兼容三教的态度。

崔致远回到新罗后,受到时代风气之影响,更是尊奉三教会通。《智证和尚碑铭并序》有云:“景文大王心融鼎教,面渴(谒)轮工。遥深尔思,觊俾我则。”[6]653褒扬新罗景文大王(861—875在位)融汇三教(三教呈鼎足之势,故以“鼎教”指称三教)之功。《鸾郎碑序》有云:“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6]701-702认为新罗的花郎道“包含三教,接化群生”,既有“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的儒家之旨(“鲁司寇之旨”),也有“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道家之旨(“周柱史之宗”),还有“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释家之旨(“竺乾太子之化”),于此可见崔致远的三教会通视野。

概言之,就思想倾向而言,崔致远归国前可谓醇正的儒者,归国后则是主张佛、儒“二教一揆”,乃至“心融鼎教”,将佛、儒、道“三教会通”的通人。朝韩学界不少学者对此亦多有体认。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云:“崔致远的晚年过的是半仙半儒生活。他的思想意境亦随之而然,因此曾遭到儒教徒的责难。”又云:“三国统一时半岛已是佛儒并存的社会……崔致远自幼便受此种社会氛围之熏陶,成年后又驰骋于儒、佛、仙三教并行的晚唐风尘之中,这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在晚年时隐居伽耶山,过着半仙半佛的生活,表现出其隐遁、乐天、达观浮世的隐逸诗人之风节。”[7]上述引文中,或云“半仙半儒”,或云“半佛半儒”,或云“半仙半佛”,都道出了晚年崔致远会通三教的人生态度。

李家源《韩国汉文学史》云:“新罗至末期,均以佛教为生活之原理、以儒学为政治制度准则,以此半佛半儒之思想为基础,创造了灿烂之文化。”[8]明确点出新罗末期是以“半佛半儒之思想为基础”。崔致远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主张佛、儒“二教一揆”,乃至佛、儒、道“三教会通”,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罗之后的高丽王朝亦是儒佛并重,故而高丽时代的士大夫对崔致远的既崇儒又尚佛,并无异议。但到了李朝,整个社会扬儒

抑佛，儒学成为绝对的主流话语，崔致远的既崇儒又尚佛成了不可饶恕之过。而且，当时的儒教信徒，连带对崔致远的文学成就亦不以为然，如成俔在其《慵斋丛话》中云：“我国文章，始发挥于崔致远。致远入唐登第，文名大振，至今配享文庙。今以所著观之，虽能诗句而意不精，虽工四六而语不整。”[9]

近现代以来，又有朝韩学者为崔致远的涉佛辩护。崔国述《〈孤云先生文集〉编辑序》认为崔致远恭承君命而作佛文，“犹眷眷以儒自明而内怀忧惧，兼陈讽谏之语”[10]；庐相稷《〈孤云先生文集〉重刊序》赞同崔国述之论，进一步指出崔致远“为佛作铭，而斥佛之意，闇然而章焉”[2]831-832。崔、庐两位先生为崔致远作佛文辩护，或曰陈“讽谏之语”，或曰有“斥佛之意”，其实细读崔致远的涉佛文章，可以发现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崔致远在新罗末期尚佛甚至佞佛的时代风习影响下，“恭承君命”“为佛作铭”，一片赤心，未必真有“讽谏之语”“斥佛之意”。我们不必以今律古，苛求古人。

概而论之，归国后的崔致远涉佛是实、信佛是真，但仍葆有儒者本色，可谓“半儒半佛”；换个角度讲，亦可谓主张佛、儒“二教一揆”，乃至佛、儒、道“三教会通”的通人。

二、文学书写的“中和之美”：情理、文质的精妙平衡

崔致远在思想观念上，心融鼎教，呈现“中和之境”；在文学书写上，则做到了情与理、文与质的精妙平衡，呈现“中和之美”。

（一）文学观：“大雅之基”与“中和之响”

就思想倾向而言，崔致远归国前是醇儒，归国后是“半儒半佛”；就文学观而言，则是儒教文艺论贯穿始终，成为其诗文写作的主线，当然，佛教思想、道家学说也影响到崔致远的文学创作，比如诗歌意境的追求等，但不影响儒教文艺论的主导地位。

崔致远在大唐时，作《谢高秘书示长歌书》，批评“但如青莲居士，惟夸散诞之词；白石山人，只骋荒唐之作。但以风月琴樽为胜概，不以君臣礼乐为宏规”，惋惜“《大雅》《小雅》之沦弊”，表达出诗文应“以君臣礼乐为宏规”的儒家文学功用观。崔致远又褒扬高秘书之长歌“弄才子之笔端，写忠臣之襟抱”“一言自此兴危邦，六义于斯归正道”，折射出鲜明的儒家政教文学观[6]466-467。

崔致远在大唐时，又有《谢周繁秀才以〈小山集〉见示》，褒扬周繁秀才的《小山集》“振纪纲于六义”“既崇大雅之基，实播中和之响”，也是基于儒家的政教文学观、中和文艺观[6]470。

崔致远回国后，作《无染和尚碑铭并序》，其中有云：“为师者何人，为役者何人，岂心学者高，口学者劳耶？故古之君子慎所学。抑心学者立德，口学者立言，则彼德也或凭言而可称，是言也或倚德而不朽。可称则心能远示乎来者，不朽则口亦无惭乎昔人。”[6]577探讨心学（立德）与口学（立言）的辩证关系，认为两者相辅相成，“德也或凭言而可称”“言也或倚德而不朽”。崔致远的这种见解无疑非常通达，实际上也是承传了儒家的相关论述，如《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1]，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2]

（二）诗歌：“明水之质”与“酒醴之美”

崔致远的诗歌，现存于《桂苑笔耕集》《东文选》等典籍，存全篇者119首，其中五言古诗2首、五言绝句10首、五言律诗7首、七言绝句69首、七言律诗31首，另有七言诗残句9联，共计128首（含七言诗残句）。这些诗作，题材涵盖咏史、怀古、送别、纪游、干谒、酬赠、咏物、写景、讽时等广泛内容，体裁包括五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多种类型，时间则涉及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前期，空间则跨越大唐和新罗，可谓包罗万象。崔致远的诗歌，有“明水之质”与“酒醴之美”，做到了文与质的精妙平衡。

崔致远的诗歌，受到晚唐诗坛罗隐、顾云等的影响，确有晚唐诗的特质。李朝文人许筠《惺叟诗话》指出：“崔孤云学士之诗，在唐末亦郑谷、韩偓之流，率佻浅不厚。”[13]高丽文人李奎报《白云小说》亦指出：“其诗不甚高，岂其入中国，在于晚唐后故欤？”[14]崔致远受到晚唐风习的熏染，大部分诗歌都较少用典，即使非常注重用典的七律体式也较少用典，这使得其诗整体上略欠厚重，部分诗歌还有浅俗之风。许筠所云崔诗“佻浅不厚”，略微有些过头，但大致不差；李奎报云崔“诗不甚高”，乃是着眼于晚唐诗之于盛唐诗、中唐诗之比较。其实，晚唐诗虽有“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15]之

憾，但亦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16]。

李朝文人洪奭周云：“至其诗，平易近雅，尤非晚唐人所可及。是盖以明水疏布之质，而兼有乎酒醴黼黻之美者，岂不弥可珍哉。”[17]825认为崔诗“尤非晚唐人所可及”，未必为实；但所云“平易近雅”“盖以明水疏布之质，而兼有乎酒醴黼黻之美者”，确实道出了崔诗的特质，可以采信。

（三）文章：“情理相融”与“骈俪灵动”

崔致远的文章，据《崔致远全集》，现存全篇者，有表27篇，状27篇，奏状20篇，堂状10篇，别纸92篇，檄书4篇，书18篇，委曲20篇，举牒50篇，内行墨敕、牒词5篇，斋词15篇，祭文5篇，记6篇，疏2篇，启8篇，书状23篇，赋1篇，碑文4篇，赞9篇，序1篇，愿文7篇，传1篇，总计355篇，涉及文体类型23种。崔致远的文章，文体之丰、佳作之夥、成就之高，在朝鲜汉文学史上是非常突出的。崔致远的文章，既有缜密之理，又有丰沛之情；既有骈俪之美，又有灵动之活，做到了理与情、常与变的精妙平衡。

崔致远善于议论，所撰“四山碑铭”梳理新罗佛教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阐发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共生关系，评价高僧们的修行事迹和佛学造诣，莫不恰中肯綮，显示出崔致远的渊博学识、深邃眼光，当然也显示其超凡的议论才能，堪称议论佳作。崔致远亦善于抒情，如《寒食祭阵亡将士文》《祭楚州阵亡将士文》等堪称抒情佳作。崔致远还善于融汇情理，既以儒家思想、佛学哲理或政治逻辑为坚实骨架，确保文章立意高远、结构严谨，又灌注丰沛的情感，为骨架注入生命，使文章生动、丰满、感人。

崔致远的文章，就思想内容而言，做到了“情理相融”；就文体样式而论，则是骈体为主，又能避免传统骈文之弊，做到了“骈俪灵动”。崔致远的文章，以四六言为主，讲究骈俪，但在句式方面又有创新，在常见的四六言之外，又间杂以五言、七言、八言等，使得句式整饬中有变化、错落中有规整，意态横生，文气盎然。崔致远的文章，善于恰切地、适度地化用典故，既丰富了文章意蕴，又不显得晦涩。

崔致远的文章，因其崇尚骈俪而饱受争议。李朝文人洪奭周《校印〈桂苑笔耕集〉序》云：“世或谓公文皆骈俪四六，殊不类古作者。公之入中国，在唐懿、僖之际，中国之文，方专事骈俪，风会所趋，固有不得而免者。然观公所为辞，往往多华而不浮，如《檄黄巢》一篇，气劲意直，绝不以雕镂为工。”[17]825既指出了崔致远“文皆骈俪四六”的缘由，又指出其文“往往多华而不浮”“绝不以雕镂为工”的特质，洪氏可谓崔氏的异代知音。

三、文化交流的“中和之响”：融会唐罗的文明使者

崔致远12岁入唐，在唐生活18年，深受大唐文化滋养，884年以“淮南入新罗兼送国信等使”身份荣耀归国。回到新罗之后，崔致远还曾“奉使如唐”。据方晓伟《崔致远思想和作品研究》考证，崔致远于893（唐昭宗景福二年、新罗真圣王七年）年初，曾奉真圣王之命，以贺正使身份入唐，后“以比岁饥荒，因之盗贼交午，道梗不果行”；但于本年底、次年初，奉使再次入唐，并终遂人愿[18]。崔致远18年的大唐求学入仕履历，归国后又“奉使如唐”的经历，使其对大唐文化有高度认同，但作为新罗文人，其根本的文化归属与报效对象又是母国。他对大唐文化与新罗文化皆有深刻洞察与认同，并成功地将大唐的先进文化恰切地移植到新罗土壤，加以本土化诠释和创新，促进了朝鲜民族文化的发展。

崔致远的英伟之处不仅在于深得大唐文学、文化之精髓，更在于将其移植于新罗，并加以本土化诠释和创新。前文所引《鸾郎碑序》，可见崔致远恰切地将儒（“鲁司寇之旨”）、释（“竺乾太子之化”）、道（“周柱史之宗”）之思想旨要，运用于阐释新罗花郎道，在大唐文化与新罗文化之间成功地架设起津梁。

崔致远对新罗的民族文化，念兹在兹，充满自豪，《三国史记·乐志》记载：

哀庄王八年（807）奏乐，始奏思内琴。舞尺四人，青衣；琴尺一人，赤衣；歌尺五人，彩衣；绣扇并金缕带。次奏碓琴舞，舞尺赤衣，琴尺青衣，如此而已，则不可言其详也。罗时乐工皆谓之尺。崔致远诗有《乡乐杂咏》五首，今录于此。《金丸》：“回身掉臂弄金丸，月转星浮满眼看。纵有宜僚那胜此，定知鲸海息波澜。”《月颠》：“肩高项缩发崔嵬，攘臂群儒斗酒杯。听得歌声人尽笑，夜头旗帜晓头催。”《大面》：“黄金面色是其人，手抱珠鞭役鬼神。疾步徐趍呈雅舞，宛如丹凤舞尧春。”《束毒》：“蓬头蓝

面异人间，押队来庭学舞鸾。打鼓冬冬风瑟瑟，南奔北跃也无端。”《狻猊》：“远涉流沙万里来，毛衣破尽着尘埃。摇头掉尾驯仁德，雄气宁同百兽才。”[5]411

《三国史记》所载哀庄王时期的乐舞规制（如“思内琴”“碓琴舞”中舞者衣色、道具的严格区分）虽已“不可言其详”，但崔致远通过五首七绝（被后世命名为《乡乐杂咏》），将转瞬即逝的舞台表演转化为永恒的文字意象。无论是《金丸》中“回身掉臂弄金丸”的灵动技巧，还是《大面》中“手抱珠鞭役鬼神”的神秘仪态，均以文学语言补史书之阙，使新罗乐舞的服饰、动作、音乐得以具象化留存。这种对乡土艺术的系统书写，折射出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在唐乐风靡东亚的背景下，坚定地为新罗艺术建立独立的美学档案。

细读《乡乐杂咏》，可见崔致远在唐罗文化间自如地穿梭：一方面以中原典故增重本土艺术，如《金丸》援引楚国宜僚的弄丸传说，将新罗杂技与中原传统并置；另一方面又强调新罗艺术的独特性，如《月颠》中“肩高项缩”的诙谐造型、《束毒》中“蓬头蓝面”的原始狂放，与唐代乐舞的雍容华贵形成鲜明对比。更值得注意的是《狻猊》一诗，以“远涉流沙万里来”暗喻狮子舞的西来渊源，却落脚于“驯仁德”的东方伦理升华，暗示新罗具备融合外来文化并赋予崭新内涵的能力。这种书写策略既借大唐文化语境提升新罗的乡乐地位，又坚决捍卫其不可替代的民族特质。

《乡乐杂咏》严格遵循唐诗格律，却充盈着新罗民俗意象，充溢着民族文化自信。于此可见崔致远在当时强势的大唐文化面前并未妄自菲薄，也未陷入封闭的本土主义，而是以诗歌为舟楫，载着新罗独特的艺术基因驶入汉文化圈的主流视野。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实践，正是崔致远作为融会唐罗的文明使者，用诗笔发出的“中和之响”。

四、文化史价值：和合之道作为东亚的“共同记忆”

综上所述，从思想上讲，崔致远可谓主张佛、儒“二教一揆”，乃至佛、儒、道“三教会通”的通人，但终身葆有儒者本色。崔致远的思想贡献尤其是儒学主张，受到后世的赞誉，其被韩国思想界推为“东国儒宗”[1]814，“四海第一人物”[2]830。

就文学而论，崔致远更是影响深远。从诗歌上讲，崔致远诗有“幽艳晚香之韵”的晚唐诗之共性，亦有“平易近雅”“盖以明水疏布之质，而兼有乎酒醴黼黻之美”之特质。从文章上讲，崔致远文有晚唐文主骈俪、尚绮丽之共性，又有“往往多华而不浮”“绝不以雕镂为工”的特质。

崔致远以其卓尔不凡的思想贡献、诗文成就，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李岩《朝鲜文学通史》云：“他一生生活于两个国度，成为罗唐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为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新罗朝廷的很多外交文书都出自他手。所以，他既是朝鲜古代汉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崔致远的著述和他的名字，将永远载于中朝两国文化的史册。他是中世纪来唐学习的亚洲各国的文化名人中，最杰出、最有成就的文人。”[19]李先生之论非常中肯，当然还可进一步展开。崔致远在思想观念上，心融鼎教，呈现“中和之境”；在文学书写上，则做到了情与理、文与质的精妙平衡，呈现“中和之美”；在文化交流上，作为融会唐罗的文明使者，在当时强势的大唐文化面前并未妄自菲薄，也未陷入封闭的本土主义，而是成功地将大唐文化恰切地移植到新罗土壤，并加以本土化诠释和创新，用诗笔发出文明互鉴的“中和之响”。

崔致远在思想上的“中和之境”、文学上的“中和之美”、文化交流上的“中和之响”，堪称东亚文人涵泳和合之道的生动例证。

和合之道在东亚的传播，依赖一套复杂的跨文化流动机制：使节往来、僧侣求法、典籍流通、笔谈唱和，构成了和合精神得以共享的管道。崔致远本人便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代表。他12岁渡海入唐，在唐求学、仕宦十余年，归国后成为新罗的汉文学宗师与思想领袖。其诗文集记录了唐罗之间文学、礼制、政治思想的深度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崔致远展现了一种“致中和”的文化态度：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封闭自大，而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他在《真鉴和尚碑铭并序》中云“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称扬真鉴禅师“远传妙道，广耀吾乡”[6]609-610。“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是普世主义的文化视野——真理是普遍的，不受国界限制，这体现了他对中华文明乃至印度佛教文明普遍价值的认同。然而，碑文的最终落脚点是“远传妙道，广耀吾乡”——将远道而来的真理传回新罗，让故乡因

此而荣耀。这种“学于中华，荣于故国”的叙事结构，正是崔致远文化立场的精妙表达：尊崇大唐文化并非自我贬抑，而是为了取法先进、光大新罗。

这种态度，正是和合之道在跨文化实践中的生动体现——绾合异邦之所长与本国之所需，涵育文化新样态，做到“和实生物”。日本平安时代的空海、最澄，朝鲜半岛高丽时代的李奎报、朝鲜时代的李滉，越南后黎朝的黎贵惇，无不体现出类似的和合精神：他们深入研习中国经典，又以本土视角加以取舍、转化，最终创造出既属于东亚又独具特色的文化新物。

可以说，东亚诸国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共享的精神语法，而和合之道正是这套语法的核心句法。从比较哲学的视角看，东亚各国的思想传统尽管各有侧重，但都强调“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执两用中”的中道智慧、“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照。这些理念在朝鲜被发展为“主气”与“主理”的论辩，在日本被转化为“和魂汉才”的文化理想，在越南被落实为“忠孝”伦理的本土实践。变奏之间，不变的是对“和合”这一最高价值的共同追求。

崔致远的个案极具象征意义：他在思想上“融鼎教而本儒”，在文学上“融情理而焕彩”，在文化交流上“融唐罗而出新”——三个维度贯穿着同一种和合精神，既“致中和”又“和实生物”。这正是东亚文明史的一个缩影：一位新罗人，在中国完成文化积累，回到母国进行本土化实践，其影响又辐射至东亚。崔致远的个案提供了一种启示：和合之道是东亚诸文明在互动中共同创造的“重叠共识”，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享文明记忆”，是可以用来推动当今东亚文明对话与互鉴的“精神基质”。

参考文献：

[1]崔国述.学士堂常享祝文[M]//李时人，詹绪左.崔致远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814.
[2]卢相稷.《孤云先生文集》重刊序[M]//李时人，詹绪左.崔致远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佚名.西岳志[M]//李时人，詹绪左.崔致远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813.
[4]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2-203.
[5]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6]李时人，詹绪左.崔致远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7]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M].张璉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35-36.
[8]李家源.韩国汉文学史[M].赵季，刘畅，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81.
[9]成俔.慵斋丛话[M]//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53.
[10]崔国述.《孤云先生文集》编辑序[M]//李时人，詹绪左.崔致远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829.
[11]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3.
[1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24.
[13]许筠.惺叟诗话[M]//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473.
[14]李奎报.白云小说[M]//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7.
[15]俞文豹.吹剑录全编[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32.
[16]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6-67.
[17]洪奭周.校印《桂苑笔耕集》序[M]//李时人，詹绪左.崔致远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8]方晓伟.崔致远思想和作品研究[M].扬州：广陵书社，2007：276.
[19]李岩，徐健顺.朝鲜文学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73-175.

The East Asian Exemplar of Immersion in the Harmony Doctrine: On the Three Perspectives and Cultural Historical Value of Cui Zhiyuan's "Attaining Moderation"

Li Jia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As a great litterateur in the era of Unified Silla, Cui Zhiyuan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cultural exchanges. Ideologically, he took Confucianism as hi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interpreted Buddhism with Confucian theories, and argued tha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shared the same essence. He also advocated the spiritual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下转第81页)

试述王弼的和合思想

李勇强

（中国人民大学 孔子研究院，北京 100872）

摘要：从《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存世文献中，可拣择几大重要命题来探究王弼的和合思想。这些命题包括："物以和为常"，王弼以此论天地万物的自然和合；"阴阳相应，往必合志"，从《周易》爻例之相应、无应关系，以见王弼阴阳和合之思想；"凡不合，然后乃变生"，见王弼的变革思想；"极睽而合，极异而通"，异类对立至于极端，势必彼此和通，此见王弼于矛盾对立中发现和合的思想，呼应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关键词：王弼；和合思想；《周易》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6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魏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人。《三国志》王弼无传，仅于《钟会传》载："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1]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何劭《王弼传》云："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2]王弼与夏侯玄、何晏并称正始名士。王弼论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论语释疑》等。

王弼《周易注》出，南朝列于官学，与郑玄《周易注》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载："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3]作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爻辰说注《易》，其《周易注》是对汉代象数学的发展。而王弼则重在阐发义理，是对象数学的反动。随着孔颖达依唐太宗之命作《周易正义》，主采王弼之说，郑玄《周易注》影响遂渐次式微。故皮锡瑞说："王弼《易注》，尽扫象数。"[4]本文试从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存世著作，拣择如下重要命题，一窥其和合思想。

一、"物以和为常"

这一命题见王弼《老子注》。《老子》第五十五章："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王弼注云："无争欲之心，故终日出声而不嗄也。物以和为常，故知和则得常也。不皦不昧，不温不凉，此常也。无形不可得而见，曰明也。"[5]终日嚎哭而嗓子并不变哑，婴儿表现出的这一状态，老子视为"和"之极致。而"含德之厚"的人，正如婴儿般能达成这一圆满的和谐。王弼的诠释中，"终日号而不嗄"的原因在于无争斗之心的刺激，无贪欲之念的驱使，这种未被后天欲望激发的先天纯净之心，一如《易》传所谓"寂然不动"的状态，可看成一种本心的和谐。王弼进而提出"物以和为常"的命题，这里的"常"，王弼解释为超越诸如明与暗、温与凉之类极端对立的适中状态，以和为常，意味着天地所生万物具有与天地合一的自然和谐。在王弼看来，"以和为常"的主体，不仅仅止步于"物"，还包括"人"，"知和则得常"的主体，正是人。这也显示了王弼注《易》的重心从"参天象"向"释人事"的转向。

第一，王弼对"物以和为常"这一命题的阐发，在《周易注》中重心在于对"和"与"不和"的考察。和的反面，为不和。讼卦䷅《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

收稿日期：2026-06-05

作者简介：李勇强(1968—)，男，湖南邵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儒释道关系、周易、和合学。

利涉大川',入于渊也。"王弼注云:"凡不和而讼,无施而可,涉难特甚焉。"[6]249争讼起于不和,为不和之讼,为险难之特甚者。显然,在"物以和为常"的一般规律下,"不和而讼"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非常状态。

王弼在注《易》时,多从比邻的两爻来考察"和"与"不和"的关系。王弼提出一卦时义与六爻关系的基本法则:"故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辩逆顺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外内。"[7]604其中,"辩逆顺者,存乎承乘",说的就是两爻相比的情形。二爻相邻,为比,两爻相比,称为承乘。上爻对下爻而言为乘,下爻对上爻而言为承。阳爻乘阴爻、阴爻承阳爻为顺,阴爻承阳爻、阳爻承阴爻为逆。

小畜卦䷈爻辞:"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王弼注云:

夫言血者,阳犯阴也。四乘于三,近不相得,三务于进,而己隔之,将惧侵克者也。上亦恶三,而能制焉,志与上合,共同斯诚,三虽逼己,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惧除,保无咎也。[8]267

六四为阴爻,九三为阳爻,六四阴乘阳,二爻相近而不相得。九三有阳刚躁进之势,对六四有侵犯之意,而九三与上六无应,六四与上六阴阳合志,虽有九三相逼而终究不受侵犯,故而无咎。六四对九三以阴乘阳,九三对六四以阳犯阴,彼此自然形成不和之势,以至有见"血"之事。好在六四虽与九三不和,而与上六则阴阳相和,故"血去惕出",有惊无险。

王弼注睽卦䷥六三爻辞"见舆曳,其牛掣":

凡物近而不相得,则凶。处睽之时,履非其位,以阴居阳,以柔乘刚,志在于上,而不和于四,二应于五,则近而不相比,故"见舆曳"。"舆曳"者,履非其位,失所载也。"其牛掣"者,滞隔所在,不获进也。[9]406

两爻相比,彼此不和,则凶。睽䷥六三以阴爻居阳位,以阴柔乘九二阳刚,与上九相应,故志在于上,而与相近的九四不和;又九二与六五相应,对六三也无亲比之意。于是,六三与九二、九四皆相近而不相比,故有牛车不进之象。

又如:履卦䷉六三爻辞:"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王弼注云:

居履之时,以阳处阳,犹曰不谦,而况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见咥者也。志在刚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顽之甚也。[10]

履卦䷉六三以阴居阳,不当位。又下乘九二,以柔乘刚。故有眇目、跛足、见咥之患。且六三志在亲合九五大君,欲以刚健陵武他人,实在冥顽之极。此为以阴乘阳终致不和的又一例。

既济卦䷾,卦之和者,六爻皆阴阳当位,初四、二五、三上皆阴阳相应。《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王弼注云:

既济者,以皆济为义者也。小者不遗,乃为皆济,故举小者以明既济也。刚柔正而位当,则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贞也。柔得中,则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则小者未亨;小者未亨,虽刚得正,则为未既济也。故既济之要,在柔得中也。[11]

既济卦䷾初三五为阳,二四上为阴,阴阳当位,刚柔得正,故利贞。小者亨,王弼解读其原因在"柔得中",六二为阴,为柔,当位居中,故"柔得中"。又六二与九五阴阳相应,故亨。王弼将"既济之要"归于"柔得中",一则显示了王弼对《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回应,一则显示了王弼对当位得中的卦位与时义的强调。卦爻关系的和谐在既济卦中的呈现,无疑是天地阴阳的最佳状态,也是"物以和为常"在六十四卦中的极致表现。

以上,可见王弼从爻位说、时义说及两爻的承乘、相应等关系,多维度阐释"物以和为常"这一命题的成立。

第二,王弼将"物以和为常"发挥至天道、人事的双重意涵,即这一轨则在人事上与天道的和合。在家道伦理上,如家人卦䷤九五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王弼注云:"假,至也。履正而应,处尊体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则勿恤而吉。"[12]403和家人卦相关的儒家五伦中的三伦:父子、兄弟、夫妇,王弼从正家道的维度加以提倡,进而以"正家而天下定"的命题上升到家国同构的高度。此中,"六亲和睦"正是"物以和为常"在家庭关系上的体现。家人卦䷤上九爻辞:"有孚,威如,终吉。"王弼注云:"处《家人》之终,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在寡恩;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家道可终,唯信与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于

身，则知施于人也。”[12]403王弼主张家道恩爱、威严并举，以“唯信与威”设定家长的治家原则，并引《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要求家长以身作则。而宽与猛、恩与威、爱与严的适度与和合，同样将“物以和为常”的天道植入“家以和为常”的人道之中。

第三，在政治哲学上，王弼同样将“物以和为常”转化为国家治理中的儒法和合。对于王弼所处的时代，傅玄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13]，《文心雕龙•论说篇》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14]。曹操崇尚名治政治，而王弼《周易注》则试图更张其辙。

夬卦䷪《象传》：“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弼注云：“夬者，明法而决断之象也。忌，止也。法明断严，不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15]434夬卦䷪以阳决阴，有明法决断之象。王弼一方面承认法令要明，断法要严，不可轻慢，但同时强调“居德以明禁”，令行禁止中发挥德性的力量以收心悦诚服之力。正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所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王弼主张执法刚正严明又不失和悦，称此为“美之道”，说明王弼希望曹魏集团从刑名之治的模式转向儒家刑德并举的道路上来。

二、“阴阳相应，往必合志”

这一命题出自王弼《周易注》：“阴阳相应，往必合志，不忧咎也。”[16]466一阴一阳，两爻相应，相应则同志，同志则无忧。革卦䷰中，六二与九五相应，如追随九五发动的革故鼎新之举，自然上下合志，吉而无咎。

这里的“阴阳相应”，为两爻关系和谐的一种表现。前文叙及，王弼说：“故观变动者，存乎应。”[7]604应，即指两爻相应。一般而言，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一阴一阳则相应，两阴两阳则无应。王弼说：“夫应者，同志之象也。”[7]604阴阳相应，则志同相和。阴阳无应，则志异趣乖。惠栋说：“《三统历》曰：‘阴阳虽交，不得中不生，故《易》尚中和。二五为中，相应为和。’《说文》曰：‘咊，相麃也。’咊即和也，麃即應也。”[17]二、五两爻分居上下两卦之中，如阴阳相应，则和。如既济卦䷾六爻当位，二五相应，堪为中和的完美表现。可见，二爻相应，则彼此相和。

凡阴阳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故凡阴阳二爻，率相比而无应，则近而不相得；有应，则虽远而相得。然时有险易，卦有小大。同救以相亲，同辟以相疏。故或有违斯例者也，然存时以考之，义可得也。[18]

阴阳相求，意味着阴阳相应成为可能。相应非取决于二爻距离之远近，最近者二爻相比，从前文所叙可见，如阴乘阳则虽近而不相得。而阴阳相应之爻，虽有两爻阻隔，也能远而相得。当然，王弼从“时义”的维度给出提醒：在时义的具体情境下做出灵活把握。

睽卦䷥九四爻辞：“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王弼注云：

无应独处，五自应二，三与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应特立。处睽之时，俱在独立，同处体下，同志者也。而己失位，比于三五，皆与己乖，处无所安，故求其畴类而自讬焉，故曰“遇元夫”也。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也。虽在乖隔，志故得行，故虽危无咎。[9]406

考察睽卦䷥中九四爻所处的境地：与其相比的两个阴爻，六三与上九相应，六五与九二相应，九四显然处于孤立地位。而九四与初九又不相应，如此一来，势必落入孤立无援的窘境。不过，初九和九四虽不相应，但同处孤独不安之中，有了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可能。这就应了“阴阳相应，往必合志”的命题：志气之合，同样重要，九四“遇元夫”，“元夫”正是初九，两个阳爻虽有“乖隔”之困，但最终能“同志相得”、彼此信任而无咎。

萃卦䷬六三爻辞：“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王弼注云：

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应，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应而独立，处极而忧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与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阴相合，犹不若一阴一阳之应，故有“小吝”也。[19]

萃卦䷬六三上承九四，以柔承刚，亲比相聚，但六三以阴居阳，九四以阳居阴，皆不当位，所以这种相聚有不正之嫌，难免将起患害，故“嗟如，无攸利”。六三与其亲比九四，不如与孤立无援的上六同气相求，故往而无咎。不过，王弼指出，六三与上六虽然二阴相合，但比不上一阴一阳的上下相

应,故“小吝”。

可见,在“阴阳相应,往必合志”的命题背景下,阴阳相应、阴阳合志,最为圆满;同性不应,虽可“同志相得”,但相比阴阳相应,仍存缺憾,虽往而无咎,终有小吝。

近不必比,远不必乖。同声相应,高下不必均也;同气相求,体质不必齐也。召云者龙,命吕者律。故二女相违,而刚柔合体。隆墀永叹,远壑必盈。投戈散地,则六亲不能相保。同舟而济,则吴越何患乎异心。故苟识其情,不忧乖远;苟明其趣,不烦强武。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迩而远至,命宫而商应;修下而高者降,与彼而取此者服矣![20]597

王弼给出了阴阳感应的基本原则。近爻不必亲比,如阴乘阳则两爻相乖。远爻不必乖离,如屯卦䷂六二与初九爻虽相近而守贞不从,与九五虽远则“十年乃字”而终能相应。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爻位之高下、形质之齐否不成问题,重要的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王弼所谓“合志”。有识之龙能感无识之云,同为阴类故二女相违,刚柔异类故阴阳合体,此见异类相应的感应规则。在高墀中长叹得远壑的响应,九五尊高与六二卑下可遥相唱和。置兵戈于逃散之地,虽至亲不能相保相守。同处一舟而共济彼岸,籍有吴越之别而其心皆同。

联系到上文王弼所云“物以和为常”的命题,“阴阳相应,往必合志”,可谓对“物以和为常”实现路径的进一步诠释。

《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21]534《系辞上》:“生生之谓易。”[21]491天地有生生之德,生生之德,即为大易。《系辞下》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1]557生生之易,表现为阴阳和合化生万物,一如男女构精生儿育女。阴阳相应,在两爻关系上表现为一阴一阳的上下感应,而体现天地生生之德,则为阴阳二气的阴阳感应,以及由此而来的化生万物。

坤卦䷁爻辞:“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王弼注云:“西南,致养之地,与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东北,反西南者也,故曰‘丧朋’。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22]这里,王弼提出了异类相感的原则,即阴感于阳,方获安贞吉。“异体合好,顺而相保,物莫能间,故利御寇也。”[23]异体和合,利于御寇,同样说明异类感应的力量。

咸卦䷞《彖传》:“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王弼注云:

二气相与,乃化生也。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24]374

王弼之意,阴阳二气相感相应,和合化生天地万物。感应发生于异质的类型之间,同类则不相感应。咸,感也,下艮,少男,上兑,少女,少男以下悦上,以男悦女,男女相感,和合化生。王弼提醒:“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至于害,故必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24]375如果不以贞正而阴阳相感,则将带来患害。显然,王弼从天地相感向男女相感的人事范畴延展时,在自然感应的基础上添加了人伦道德的价值诉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阴阳相感的层面,王弼延续了阴阳学说中阳尊阴卑的传统,提出阳唱阴和、以阴顺阳、以阴求阳、以阴固阳等说,而阳唱阴和、以阴顺阳、以阴求阳、以阴固阳等,正是阴阳相感过程中的常态,正是这种看似不平衡的动态和合,完成了阴阳相感、天地生生的进程。

阳唱阴和:

讼卦䷅初六爻辞:“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王弼注云:“处讼之始,讼不可终,故‘不永所事’,然后乃吉。凡阳唱而阴和,阴非先唱者也。四召而应,见犯乃讼。处讼之始,不为讼先,虽不能不讼,而了讼必辩明矣。”[6]375王弼认为,九四为阳,为讼事的发起者,即阳唱;初六为阴,与九四相应,为讼事的响应者,即阴和,故初六处于讼之始,却“不为讼先”“非先唱者”。显然,王弼以阳唱阴和为基本原则。正基于此,在诠释蒙卦䷃时,王弼提出“六三先唱,则犯于为女”[25]618。

以阴顺阳:

旅卦䷷《彖传》:“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王弼注云:

夫物失其主则散,柔乘于刚则乖,既乖且散,物皆羁旅,何由得小亨而贞吉乎?夫阳为物长,而阴皆顺阳,唯六五乘刚而复得中乎外,以承于上。阴各顺阳,不为乖逆,止而丽明,动不履妄,虽不及刚得尊位,恢弘大通,是以小亨。令附旅者不失其

正，得其所安也。[26]

旅卦䷷六五以柔居外卦之中，上承上九，以阴顺阳，虽不如九五以刚得至尊之位，亦得以小亨。此外，加上初六上应九四、六二上承九三，从而全卦“阴各顺阳”，体现了阳长阴卑、以阴顺阳的阴阳感应原则，故有小亨、贞吉之象。

以阴求阳：

屯卦䷂爻辞：“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王弼注云：“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27]

内卦为震，初九当动，但处于屯之初，轻举妄动意味着大难来临，所以盘桓不进。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屯难之世”意味着“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故初九居正当位以安民，谦卑弘正以得民，“建侯”以积蓄力量，从而为走出困境创造条件。

䷂屯。此一卦，皆阴爻求阳也。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故阴爻皆先求阳，不召自往；马虽班如，而犹不废；不得其主，无所冯也。初体阳爻，处首居下，应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25]618

在《周易略例》中，王弼再次举屯卦为例，在以阴求阳、以弱依强、民思其主的局势下，初九谦卑处下、贞正守静的策略，无疑取得了大得民心的实效。

䷃蒙：此一卦，阴爻亦先求阳。夫阴昧而阳明，阴困童蒙，阳能发之。凡不识者求问识者，识者不求所告；暗者求明，明者不咨于暗。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25]618

王弼举蒙卦䷃为例，该卦依然体现了以阴求阳、以暗求明、童蒙求我的特点，发蒙者自然可以凭借“以阴求阳”的有利地位，实施开发民智的启蒙行动。

以阴固阳：

小畜卦䷈《彖》曰：“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王弼注云：“阴苟不足以固阳，则虽复至盛，密云自我西郊，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8]266该卦六爻一阴五阳，仅六四一阴爻不足以固五阳，虽已形成密云，但终未能阴阳感应激荡成雨。以阴固阳之说，显示了在阴阳相感之际，阳主阴辅、以阴辅阳为必要条件。

夬卦䷪九三爻辞：“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王弼注云：

頄，面权也，谓上六也。最处体上，故曰权也。剥之六三，以应阳为善。夫刚长则君子道兴，阴盛则小人道长。然则，处阴长而助阳则善，处刚长而助柔则凶矣。夬为刚长，而三独应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凶也。君子处之，必能弃夫情累，决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与众阳为群，而独行殊志，应于小人，则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无所咎也。[15]435

剥卦䷖六三与上九相应，以阴应阳，以阴助阳，以柔助刚，故善。而夬卦䷪九三与上六相应，以阳应阴，以阳助阴，以刚助柔，但“阴盛则小人道长”，故凶。可见，王弼以为，以阴固阳则吉，以阳固阴则凶。

在天地之中，自然世界的阴阳感应，有风雨雷电等，王弼注鼎卦䷱九三爻辞“方雨亏悔，终吉”时说：“雨者，阴阳交和，不偏亢者也。虽体阳爻，而统属阴卦。若不全任刚亢，务在和通，方雨则悔亏，终则吉也。”[28]雨，这一自然现象是阴阳交接、和合相感的结果，不能偏于阳亢。九三虽以阳居阳，但整个鼎卦下巽上离，内长女外中女，统属阴卦，故并非全任阳刚阳亢。雨出于阴阳“和通”，故方雨则亏悔，终为吉祥。

从天象转而人事，人间万象中，阴阳感应莫过于少男少女的两情相悦（咸卦䷞）、长男少女的婚恋和合（归妹卦䷵）。归妹卦䷵《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王弼注云：“阴阳既合，长少又交，天地之大义，人伦之终始。”[29]长男少女，交融和合，上彻阴阳大义，下贯人伦终始。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王弼注云：

妇人谓嫁曰归。《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降身应二，感以相与，用中行愿，不失其礼。帝乙归妹，诚合斯义。履顺居中，行愿以祉，尽夫阴阳交配之宜，故“元吉”也。[30]

泰卦䷊，地在天上，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阴阳交通。而六五以阴居阳，居中处顺，屈尊与九二相应，彼此相感相与，可谓降身而合礼，而帝乙归妹，正合此义。阴阳交配，得中合宜，故而元吉。

而恒卦䷟《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注云：“长阳长阴，合而相与，可久之道也。得其所久，故不易也。”[31]恒卦的阴阳感应，和合相与，同样贯通天象与人事，在天道与人伦上均

体现了阴阳和合的恒久之道。

三、“凡不合，然后乃变生”

王弼注革卦䷰《彖传》“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凡不合然后乃变生，变之所生，生于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为革也。息者，生变之谓也。火欲上而泽欲下，水火相战，而后生变者也。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16]465

革，变也。王弼提出“凡不合，然后乃变生”的命题，认为变生于不合。而革卦䷰，正好有不合之象：下离上兑，下火上泽，火炎上，泽润下，有水火相战之象，故“水火相息”，息，即生变之意。中女与少女同居，各有水火之性，不相和合，故“志不相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从天象看，水火不容；从人事看，同性相斥。如此，便生变故。此与前文所叙王弼“同类而不相感应”[24]374的命题相表里。

变革有吉有凶，处置得当之变，即可元亨利贞，一如革卦䷰《彖》所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卦辞：“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王弼注云：

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革而当，其悔乃亡也。[16]465

民众往往为习惯的奴隶，故对变革一时难以适应。变革之道，渐变为宜，在无法即刻取得民众支持的情况下，需要假以时日，从而“巳日乃孚”，得到民众信服，赢得元亨利贞、悔吝消失的好结果。如果长时间不能获得民众信赖，就要考虑这种变革是否得当合宜。悔吝来自变化，正当合宜的变革，则会悔吝消亡。

小畜卦䷈上九爻辞：“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王弼注云：

处《小畜》之极，能畜者也。阳不获亨，故既雨也；刚不能侵，故既处也。体巽处上，刚不敢犯，尚德者也；为阴之长，能畜刚健，德积载者也。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虽贞近危，故曰“妇贞厉”也。阴之盈盛莫盛于此，故曰“月几望”也。满而又进，必失其道，阴疑于阳，必见战伐，虽复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8]267

王弼这里说的“阴疑于阳，必见战伐”，出自坤卦䷁《文言》：“阴疑于阳，必战。”《小畜》上卦为巽，为长女，居乾之上，有“妇制其夫，臣制其君”的阴盛之象。而乾刚健上进，故有阴阳相疑进而阴阳交战的凶险。阴阳不合向阴阳不和的战伐演变，变，也就如影随形。

四、“极睽而合，极异而通”

王弼说：“凡不合，然后乃变生。”而《系辞上》又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便成为天象、人事从否塞走向通达的条件之一。何以能通？王弼提出：“极睽而合，极异而通。”[25]619《序卦》云：“睽者，乖也。”乖离至于极致，将转向和合。异类对立至于极端，势必彼此和通。

睽卦䷥上九爻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王弼注云：

处《睽》之极，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己居炎极，三居泽盛，睽之极也。以文明之极，而观至秽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负涂，秽莫过焉。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恢诡谲怪，道将为一。未至于洽，先见殊怪，故见豕负涂，甚可秽也。见鬼盈车，吁可怪也。先张之弧，将攻害也。后说之弧，睽怪通也。四剌其应，故为寇也。睽志将通，匪寇婚媾，往不失时，睽疑亡也。贵于遇雨，和阴阳也。阴阳既和，群疑亡也。[9]407

睽卦䷥上离下兑，离为火，上九居炎极，兑为泽，六三处泽盛。离为文明，上九居文明之极，观豕负涂至秽之象，可谓乖睽之至。但“至睽将合，至殊将通”，上九和六三终将和合相应。王弼以为，这合于《庄子·齐物论》“恢诡谲怪，道通为一”之说。离火炎上，兑泽润下，其志相背，但上九和六三阴阳相和，雨为阴阳和合的表征，故“遇雨则吉”。

睽卦䷥《彖》云：“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人与万物虽形、性相异，但志同道合则彼此相和。

以上显示了两种可能性：志趣相异，阴阳相应，则和合相通；阴阳相异，志同道合，亦和合相通。

如何相通？王弼提出了和通之法。噬嗑卦䷔卦辞：“噬嗑。亨，利用狱。”王弼注云：“噬，啮也。嗑，合也。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

也。有间与过，啮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32]噬嗑卦䷔九四，如颐中所含之物，象征了导致人与万物不相亲和的障碍，即王弼所谓“有间”。“有过”带来万物不齐、其性各异，也成为否塞不通的原因所在。不亲不齐，何以相通？王弼的解决方案是“啮而合之”，诸如刑狱之事，就是通过外在力量达成人与万物彼此和通的一种举措。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20]597

爻者，效也。物刚效刚，物柔效柔，遇物而变。变之所生，生于情伪。情伪所适，巧诈多端，情欲伪动，数莫能求。天地万物，往往性同行乖，情貌相违。其体虽合，志则离散。身虽潜屈，其志则伸。体性相从，情乖愿反。形动好静，阴柔爱刚。万物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和同质性，同样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但往往正因为异质性的乖睽，带来了彼此吸引的张力，这就带来了和通的可能。《系辞传》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句话正好为王弼的“极睽而合，极异而通”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王弼《老子指略》云：

然致同涂异，至合趣乖，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观其齐同，则谓之法；睹其定真，则谓之名；察其纯爱，则谓之儒；鉴其俭吝，则谓之墨；见其不系，则谓之杂。随其所鉴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故使有纷纭愦错之论，殊趣辩析之争，盖由斯矣。[33]

从人事的维度，思想世界的价值一致，往往来自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思想世界的包容相通，往往来自志趣乖异者们的和合共存。而当人们以法家、名家、儒家、杂家给出规定性的内涵，并执着于各自的一己之见，从而争端迭出，聚讼不已，党同伐异的纷纭之争，也就随之而来。王弼对思想界乱象的批判，同样基于“极睽而合，极异而通”的思考。

结　语

王弼在《周易注》《老子注》中，透露出深刻的和合思想，从以上讨论的几大相关命题中不难看出：

“物以和为常”的命题，从爻位说、时义说及两爻的承乘、相应关系等《易》例入手，关注天地万物的自然和合，并从“参天象”延展到“释人事”，将“物以和为常”从天道转向人事：在家道伦理上，王弼认为“六亲和睦”正是“物以和为常”在家庭关系上的体现，提出“正家而天下定”的命题并将其上升到家国同构的高度；在政治哲学上，王弼同样将“物以和为常”拓展为国家治理中的儒法和合。

“阴阳相应，往必合志”的命题，从《周易》爻例之相应、无应关系入手，提出阴阳相应、阴阳合志的和合思想。从阴阳相感出发，王弼提出阳唱阴和、以阴顺阳、以阴求阳、以阴固阳等说，从阴阳之间的动态和合，展现了阴阳相感、天地生生的进程，进而延伸到人伦上的男女和合之道。王弼上参天象，下明人事，在天人合一的维度，通过阴阳相感、合志相应的和合感应运动，展示了“物以和为常”这一命题的达成路径。

“凡不合，然后乃变生”的命题，从和合的反面阴阳不合、阴阳相疑乃至阴阳交战，从变革的原因、条件以至于成功的可能等维度，在和合的视野中见出王弼的变革思想。

“极睽而合，极异而通”的命题，王弼从异类对立中发现了对立的极端势必走向彼此和通的天道与人事奥秘，这一命题见出王弼于矛盾对立中发现和合的思想，呼应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参考文献：

[1]陈寿.魏书·钟会传[M]//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795.

[2]何劭.王弼传[M]//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795.

[3]经籍志一[M]//魏徵.隋书：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913.

[4]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51.

[5]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146.

[6]王弼.周易注·上经·讼[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8]王弼.周易注·上经·小畜[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王弼.周易注·下经·睽[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王弼.周易注·上经·履[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273.

[11]王弼.周易注·下经·既济[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

京:中华书局,1980:526.
[12]王弼.周易注·下经·家人[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傅玄传[M]//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1317.
[14]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6.
[15]王弼.周易注·下经·夬[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王弼.周易注·下经·革[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惠栋.周易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7:659.
[18]王弼.周易略例·略例下[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615.
[19]王弼.周易注·下经·萃[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446.
[20]王弼.周易略例·明爻通变[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疏·系辞[M].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21.
[22]王弼.周易注·上经·坤[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226.
[23]王弼.周易注·下经·渐[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485.
[24]王弼.周易注·下经·咸[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25]王弼.周易略例·卦略[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王弼.周易注·下经·旅[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496.
[27]王弼.周易注·上经·屯[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235.
[28]王弼.周易注·下经·鼎[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471.
[29]王弼.周易注·下经·归妹[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487.
[30]王弼.周易注·上经·泰[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278.
[31]王弼.周易注·下经·恒[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379.
[32]王弼.周易注·上经·噬嗑[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322.
[33]王弼.老子指略[M]//王弼,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197.

An Analysis of Wang Bi's Thought of Harmony

Li Yongqiang
(Confucius Research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extant works including *Annotations on the Zhouyi*,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Zhouyi*, *Commentaries on the Laozi* and *Synopsis of the Laozi*, several key propositions can be selected to explore Wang Bi′s thought of harmony. These proposi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ll things abide by harmony as their constant nature", through which Wang Bi elaborates the spontaneous harmony of all thing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Second, "Yin and Yang respond to one another, and their interactions converge in purpose". By referring to the correlative and non-correlative relations between lines in the hexagram system of the *Zhouyi*, this proposition embodies Wang Bi′s conception of harmony between Yin and Yang. Third, "All transformations arise where disharmony prevails", which reflects Wang Bi′s viewpoint on reform and change. Fourth, "Extreme divergence turns to concord; utmost difference leads to intercommunication". Whe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things reaches its climax, they inevitably reconcile and interconnect with each other. This manifests Wang Bi′s insight into harmony amid conflicting opposites, echoing Confucius′ maxim of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Keywords: Wang Bi; thought of harmony; *Zhouyi*

《血色将至》:从文学自然主义到影像自然主义

王 欣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美国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2007年执导的影片《血色将至》改编自厄普顿·辛克莱1927年小说《石油!》,被看成是"21世纪第一部伟大的美国电影"。电影《血色将至》的改编,既承袭了原著的自然主义文学元素,又从实验小说论、环境决定论、客观真实说、激情说等维度,延伸发展了左拉倡导的自然主义理论与爱森斯坦提出的电影美学范式。

关键词:《血色将至》;《石油!》;电影改编;自然主义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7

自然主义作为19世纪后期兴起于法国的重要文学思潮,摈除了浪漫主义以来"一切异乎常情的虚构"[1],以实证研究、"真实感"、环境与遗传决定论等特征为核心艺术准则,主张"唯有实验方法能使小说脱离它所爬行的谎言和谬误的泥潭"[2],客观记录和研究社会对个人、个人对社会的相互作用。自然主义大师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的一系列文学美学观点吸引了很多文学家和社会改革者,其影响力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1927年,被称为"最后一位纯粹的自然主义者"[3]199的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将目光投向带有自然主义文学特点的早期工业题材,以"一部精彩的纪实小说"[4]31《石油!》(*Oil!*)①见证了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进程中的洛杉矶石油潮。2007年,美国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将这部小说改编为影片《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②。这部几乎涉及所有美国主题,即鲜血、石油、宗教的电影,被看成"是21世纪第一部伟大的美国电影"[5]192。虽然安德森导演并未专门提及这部作品的自然主义文学来源,但是从改编对原著小说自然主义成分的延续、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对这部电影创作的影响以及爱森斯坦有关自然主义的电影理论等几个维度来看,电影《血色将至》不但可被看成是自然主义文学在21世纪重要的跨媒介重构版本,也是爱森斯坦在评价自然主义文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电影理论的当代影像实践案例。

一、"一点点的润色"

作为厄普顿·辛克莱最喜爱的三部小说作品之一,《石油!》以20世纪之初发生的一起有关石油开采的政府渎职事件——蒂波特山油田丑闻(Teapot Dome Scandal)为背景,讲述了当时正超越煤炭成为重要能源的石油所引发的财富故事,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矛盾,即"加州阶级斗争"[6]的故事,故事结构庞大而复杂。小说前半部分重点讲述石油商人杰·阿诺德·罗斯(J. Arnold Ross)的发迹和他儿子兔宝(Bunny)的成长故事,并且始终以兔宝为中心来讲述他的人生经历与所见所闻。父亲罗斯抓住机遇,在天使城(Angel City)附近开发了他最重要的油田,从不名一文发展成为颇具

① 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石油!》(*Oil!*,1927),曾用译名为《煤油》,本文采用原文直译书名。

②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电影《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2007),常见译名还包括《血色黑金》《黑金企业》《未雨绸缪》《黑金风云》等。

收稿日期:2026-06-01

作者简介:王 欣(1973—),男,浙江温岭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经典影视改编。

经济实力的石油富豪。在罗斯逐渐发达的历程中，因出让土地而与这对父子结识的沃特金斯一家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一条副线。这条副线在兔宝长大成人后逐渐与主线合而为一，包括兔宝与沃特金斯家两个儿子保罗和伊莱(Eli)的交往，还有女儿鲁思的故事。这部小说中有关石油经济发展的故事，尤其是小说前100页对石油开采、矿工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激发了导演安德森的创作灵感。影片延续了安德森电影中常见的一些核心母题：命运与偶然机遇的作用、血缘家庭的分崩离析、物质商品与人的精神疏离之间的关联、维系非血缘家庭的共同经济利益[5]22等。兼任编剧的安德森导演在编排故事时有意识地将加州石油大亨故事、年轻传教士故事，甚至将玛格丽特·莱斯利·戴维斯(Margaret Leslie Davis)为石油大亨爱德华·多哈尼(Edward Doheny)撰写的传记《财富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Fortune*)纳入其中，探讨资本主义和腐败驱动下石油和宗教、家庭和贪婪的动态交集[7]。

电影《血色将至》的主要情节虽然删减了原著后半部分有关工人运动的内容，但保留了辛克莱描写时代发展变迁的重要主题，也包含了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现象的控诉，还有与宗教相关的一部分内容。这部2007年的影片仿佛是在展示21世纪石油在大众文化中的经久不衰，相同的特征允许他只需要一点点的润色即可[8]89。小说中所描写的20世纪早期美国西部，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发现一口油井，之后就会有无穷无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来，“连风里也是石油的气息”[9]25。厄普顿·辛克莱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在小说中描写了这一时期石油文化的发展状态，描写了传统的手工业逐渐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带有美国企业神话中最具辨识度和最具韧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旧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在新时代到来时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厄普顿·辛克莱积极参与“揭露黑幕运动”(the Muckraking Movement)并在小说里表现了对于这个国家和时代一系列现象的反感，但石油文化的阴暗面也正是其魅力和传奇密不可分的部分[8]89。电影《血色将至》以其独有的戏仿叙事风格，勾勒出后现代美国的历史源头[5]22，因此影片拍摄从一开始就对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改编方法。除了故事情节，小说主人公杰·阿诺德·罗斯被改换成更具“石油文化终结的象征”[8]89特色的丹尼尔·普莱恩维尤(Daniel Plainview)，他是这部史诗作品的核心人物。他不是那个年代的循规蹈矩者，一个本质上只想维持生计的家伙，不同于厄普顿·辛克莱在小说中想要刻画的“真正的英雄”[4]31形象。他在银幕上演绎着生意场和个人奋斗起起落落的可能性：影片以丹尼尔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挖掘银矿开场，随后遭遇意外摔断腿后，艰难从坑道中逃生，精心设计的强烈的明暗光线对比和清脆的敲击声形成自然的封闭空间感，凸显出人物的孤独本性。除此之外，影片还强调了丹尼尔在成为石油巨头的整个过程中，人性不断变化的过程：土地交易的欺诈、同行竞争的残酷、逐利资本的冷酷，与冒牌兄弟、养子、伊莱等人的冲突不断冲击其道德底线，最终陷入永远的孤独之中。很明显，安德森与主演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都认真审视过这个人物，并且为这个原本只是停留在兔宝眼中的暴发户父亲形象重塑了人物特性。在原著小说中罗斯更趋向于一个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的角色，而安德森在刻画丹尼尔·普莱恩维尤时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特征。电影《血色将至》通过一个人的史诗全面展示出人的精神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怎样被拖进了资本主义的轨道，所要强调的是人们在更大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面前的无能为力[8]89。影片中的丹尼尔，一切行动的唯一驱动力，只是“赚到足够多的钱，好彻底远离所有人”；在影片后半部分丹尼尔以“我喝你的奶昔”明确地表达“捕获既得原则”的道德逻辑，这也是石油巨头的行商理念[8]89。尽管普莱恩维尤对世间万物满怀厌世式的鄙夷，安德森却始终对这个卑劣的角色抱有共情。“我很难不觉得普莱恩维尤身上带有几分英雄色彩，”安德森曾说，“他野心滔天，我能理解他求生的执念，尤其是在当年西部那样的环境下。”安德森剧本创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未丢掉对笔下人物的体恤之心——他始终懂得站在人物的视角看待世界，即便他也不指望观众能在这些角色最不堪的时刻与之共情[5]197。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森在这个角色的设计部分仿照了恐怖片的经典形象(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在整个故事中我牢记着我们其实是在制作一部恐怖片。”他说，“我们去看一部惊悚片可能是因为想看有什么意外发生，就好像当我们看到一场车祸时可能会特别兴奋。在某些方面，普莱恩维尤的故事就像一场车祸，所有的事情向更为糟糕的局面发展。”[10]由

此可见,影片把丹尼尔这一角色提升为核心人物,不仅仅是出于电影改编上的考虑,作为20世纪初的风云人物,丹尼尔这一形象本身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黑暗面。

像丹尼尔这样迅速累积起来的石油资本,其本质往往是在欺骗盘剥城乡居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厄普顿·辛克莱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揭示财富积累的实质,油井成为能源的来源并持续不断地供给原油,靠的是对现场开采工人的压榨,他在小说中写道:“工人们在油井上卖命劳动,累得走路打晃,眼睛被汗水和油污的混合物糊住。四周连靠一靠喘口气的地方都没有,压根就没有能扶一把的支撑物,因为到处都是油,所有东西都黏糊糊滑溜溜的。”[9]26在影片中,导演安德森并没有这样刻意安排,他同样依托外在空间环境的变化来推动故事中人物性格转变,契合自然主义环境决定论的创作主张。无论是荒凉的戈壁、污浊的钻井平台,还是沾满油污的工人身体,影片中大量镜头均能在原著小说找到对应文字。影片通过两次矿井事故强化了作品主题,同时解构了辛克莱小说的自然主义框架。借助于小说《石油!》和电影《血色将至》,人们与石油意象及文化、工业资本之间达成了某种粗暴的现实和解。就像小说里说的:“整个地球的内部宝藏似乎都从那个洞坑里源源不断地向外喷涌,浓稠乌黑黏滑的液体,像从地底冲向云霄的尼亚加拉瀑布。”[9]26影片中石油工人父亲将石油涂抹在孩子脸上,似乎完成了对他的洗礼。

辛克莱认为文学应该考虑解决社会问题。在辛克莱的叙事中,不存在天生的恶人,所有人物的冷漠、贪婪、利己,都是资本逐利环境长期规训的必然结果。影片中普通勘探者到冷血石油大亨的转变,正是身处资本丛林经受“客观暴力”逐步异化的结果。电影《血色将至》不仅沿用了原著中“适者生存”的隐藏主题,而且还试图研究影响人的行为的潜在力量。例如,小说中突出的人物保罗·沃特金斯和他几乎被忽略的兄弟伊莱经过电影改编,重要性明显发生了转换,伊莱被提升到了故事的中心位置。在《血色将至》影片大半篇幅里,丹尼尔与伊莱这两个利欲熏心的生意人维系着一份互惠却充满隔阂的合作协议:身为小镇牧师的伊莱稳住丹尼尔手下工人的精神情绪,让他们安分顺从;丹尼尔不断壮大的石油产业,则为伊莱带来更多信徒、财富与权势[5]196。

小说《石油!》“大体上是在暴露美国资本主义的丑恶,同时也就在暴露着建筑在这种丑恶上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机构的丑恶”[11]。电影《血色将至》将贪婪、暴行和癫狂植根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父权主义中,但当时的资本主义和父权主义依靠宗教和家庭来支撑,因而渐遭破坏,所以,安德森鸿篇巨制的历史剧试图触及美国不安和疯狂之根本,呈现出深植于其核心体系和价值标准的根本问题,并最终为当今时代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断[12]156。

二、“无可避免的进化”

厄普顿·辛克莱写《石油!》这部小说,是在他创作成熟的时期,之前他在成名作《屠场》(*The Jungle*,1906)中对“芝加哥大企业做了深刻、细密、而且从很多方面看来可说是十分杰出的研究”[13];此后,他又以丹佛、波士顿等城市与石油、煤炭、金融、汽车制造各类产业为题材创作小说,以自然主义视角剖析完整的经济运行体系,与左拉的创作路径高度相似[3]199,并且开创了那种“把艺术当做直接宣传”[14]的创作方式。《石油!》这部小说的创作延续了这种风格,同时这位“美国左拉”始终无法摆脱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影响,尽管他努力摒弃了左拉推崇的生理遗传、生物本能的决定论,但他的文学实践囿于环境决定论和社会批判,无法真正拓展他的自然主义本土化改良。相比之下,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导演在改编过程中的删减改造更具特色。前文已经提到他在对辛克莱作品的强烈忠实和对其故事和主题的反传统漠视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但是,对《血色将至》的分析越深入,就会发现其与原著之间的关联也就越多。不但小说情节被改头换面地套到电影情境中,还能不失时机地抓住小说的细节,甚至直接从书中截取了一部分对话段落。

辛克莱在《石油!》再版序言中提到:“我走访了一众石油行业从业者,听闻了无数石油行业的趣闻、冒险故事与全民疯狂追油的狂热往事。也正因如此,我才得以沉下心,动笔创作这部长篇小说。”[15]自然主义小说家注重观察与实验的基本理念在辛克莱身上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与发展。相比之下,电影《血色将至》在改编过程中并没有过多考虑故事的编排、前后承接和结局,而是对一个事先构思好的观念进行展示。“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

那里有很多石油。我住的地方离贝克斯菲尔德不远，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初发现石油的地方。他们仍在抽水。我想我一直想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是如何把它弄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如此喜欢它，故事是什么。”[7]安德森想讲一个他感兴趣的关于发展与野心的故事，小说《石油！》很好地提供了这个故事，电影只需要忠实地记载这个人或这群人的行为即可。为了让电影能真实还原20世纪初加州采油的盛况，安德森导演同样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处的石油博物馆里徘徊——让那个时代丰富、富有氛围的照片进一步激发他的想象力，“真正了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7]。电影改编不仅体现出对石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同时贯穿了一条自然主义研究的核心脉络。

左拉认为“人只是环境与遗传影响下的行动的动物机器”[2]145，社会环境是最直接、最核心的支配力量。辛克莱有意识地强调父子二人的不同人生道路，切断了遗传因素的作用。经过电影改编的H.W.虽然在剧情里的位置等同于兔宝，导演安德森却有意将普莱恩维尤与孩子H.W.设定为领养关系，明显有别于他在原著小说中的地位。更具嘲讽意味的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其石油开采的潜在主顾们认为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关于与家庭作斗争”[7]的故事是安德森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在他看来，“最有趣的事情——银幕上唯一有趣的东西——是人”[16]。因此，在影片的最后部分，当H.W.长大成人，宣布自己将独自勘探油田时，普莱恩维尤便断绝了和他的关系，告诉他自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只是“一个篮子里的杂种”。类似的秩序失衡的家庭模式还涉及电影中的森迪一家。从这一角度来看，普莱恩维尤对其同父异母的兄弟亨利说的那一句：“有些时候我望着旁人，却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半点值得喜欢的地方”，就显得主题深刻。丹尼尔的“家庭”与“家人”全部建立在经济依附之上，这种依附关系最终必然摧毁人为构建的血缘纽带；而这份毁灭，又反向强化了他极端竞争主义的世界观，带有一种自虐式的满足[17]。

与《煤炭大王》（*King Coal*，1917）一样，当厄普顿·辛克莱逐渐到达他创作的顶峰时，通过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与命运的影响，看到了这个“命中注定的时代的真实写照”[18]，并开辟了小说创作一条新的道路，这使他成为一名革新者。相比之下，在环境与时代的双重维度下，影片《血色将至》进一步依托影像空间放大环境的支配力量：封闭银矿坑道塑造丹尼尔隐忍偏执的底色，广袤荒漠油田放大其掠夺欲望，矿区工业噪音及油污环境持续侵蚀人的精神世界，外在物理空间决定着人物的精神走向，完全呼应左拉环境支配人的核心论断。

“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同样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写”[19]169。有了石油垦荒者的故事和这些加州油井遗址的“现成的场景”，也就有了进一步进行分析与研究的基础。安德森在电影中将小说前100页的内容作为故事题材，然后他就从辛克莱观察到的事实出发，进行他的一系列实验。导演安德森和主演丹尼尔·戴-刘易斯把丹尼尔这一人物放到实验中去，让他经历种种磨难，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包括来自亨利、H.W.，还有伊莱的考验，以逐渐表现出他作为“社会怪物”[20]的特点和他神秘的生活。显然在这里丹尼尔的设定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本身，而是一个石油巨头的成长史与社会史。影片所要展示的是一个人“如何被一种社会的必要性所控制和消灭”[21]的故事。因此，安德森在影片拍摄中将观察与实验并置，让人物处于他所控制的条件，包括色彩与音乐之中。丹尼尔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生存的斗争”，个人的力量和智慧还要面对那种“经济机体的像大自然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和盲目的强力”[22]140，他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电影中那个“从痛苦到更痛苦”的弧线[7]，也就是影片开始与结束时经历的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影片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人被卷入这些机体的复杂的齿轮中，卷入这样的场合、环境和情感之中，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电影《血色将至》是这样一部实验电影，情节只不过是让主人公丹尼尔在观众的注视下重现一遍的实验而已。

除了影像实验，客观性理论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左拉主张“小说家只是一名记录员，他不准自己作评判、下结论”“他仅仅陈述他所见到的东西”[19]169。科学客观性是一种写作策略，但还需要补充的是：社会和经济力量能够而且应当被改变。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小说”依赖详细的文献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修辞来促进制度的变革[23]。左拉的客观理论被辛克莱继承，同时被保罗·托马斯·安德森转化为影像语言。整部《血色将至》没有刻意批判丹尼尔的贪婪，也没有同情底层农户的愚昧，更不直接讽刺传教士的虚伪，他只是

客观记录“生活的一个片断,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人生的若干岁月,人生传记的一页而已”[19]177。它让资本环境之下所有人的行为选择,契合客观纪实的核心要求。可见,《血色将至》讲述的不只是石油产业的发展史,还有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变迁[5]23,就像左拉说的真正具有“自然史与社会史”小说特征的自然主义作品:“它涉及一切题材,记录历史,论述生理学和心理学,一直登上最高的诗歌的巅峰,研究最为多种多样的问题:政治、社会经济、宗教、习俗无不成了它所研究的对象,整个自然界都是它的领域。”[19]177

自然主义只是在它自己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的地方,并且知道从内在的本质上去理解一个崭新世界的开始时,它所起的作用才是革命的,它才成为一种艺术表现的新形式[24]。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曾经坚定地相信,这个方法,在历史学和批评中取得了胜利之后,将会所向披靡,即使在戏剧和诗歌中也不例外。这是无可避免的进化[2]164。无论是《石油!》还是《血色将至》,都很容易让人想到左拉的《萌芽》,两者在展现依托资源掠夺积累资本方面何其相似,只不过左拉笔下那个“贪馋的畜生蹲伏在那里,准备吞食人类”[25],在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中置换成“地下藏着只喷油大怪兽,压榨你的体力、将污物喷你一脸,以显示它傲人的存在感”[9]26。但是电影《血色将至》的“进化”尤其明显,它重塑了石油资本无孔不入的强权形象,为追逐石油财富的资本博弈塑造出新的代言人:巧舌如簧、内心暴怒、充满病态竞争欲的丹尼尔[17],甚至严厉谴责了大男子主义式的美国权力意志,这对带有掠夺性的贪婪的资本主义造成了毁灭性影响[12]156。由此可见,电影《血色将至》匹配的是世纪之交全球化发展的真实语境,借丹尼尔这个全新、令人恐惧的人物形象,进一步放大了资本完胜一切的深层危害。

三、“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飞跃”

安德森导演出于对加州题材的兴趣选择了《石油!》这部小说,在他的少年时代,“一批坚韧、执着的石油勘探者正重塑这片土地”[26]。安德森经历过类似的生活,同时也“被辛克莱笔下那个年代的加州图景深深触动”[26],所以他把重心放在了小说的前半部分,而没有继续去探索后半部分的主题。对于作为电影探索者的安德森而言,他在电影核心部分的主题改换深受阿尔特曼(Robert Altman)导演风格的影响,还从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那里获得了许多视觉和听觉线索[5]22。同时,来自爱森斯坦的理论与艺术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使他在影片结构上开始追求一种“激情”(pathos)的类型,而不只是先前在这部小说阅读过程中的“心潮澎湃”(exciting)。

爱森斯坦认为,激情就是使观众从座椅上跳起来的那种东西;就是使他们坐不住的那种东西;就是使他们拍手,喊叫的那种东西;就是使他们眼睛里闪出狂喜的光芒,甚至因狂喜而流泪的那种东西[27]38。“矿井大火”一幕在《血色将至》影片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一幕的表现以客观真实为基础,摄影机镜头拍出了粗粝、满是烟火尘土、带有史书质感的旧日美国。在影片中,“矿井大火”选取主人公丹尼尔的主观镜头,正在打钻的油井突然喷涌而起,气浪将在一旁观看的H.W.打翻在地上,喷涌的力道强劲可怖,四周人群跑动赶来救援,丹尼尔冲过去救回H.W.。这一部分快切镜头呈现井口炸裂、原油喷涌、矿井及人员受损,凸显出紧张急促感,对应原著标题用一个单词配上感叹号刻画出油田喷油那一刻的狂热。到了夜间,钻井塔起火、油井架熊熊燃烧,四周人群再次跑动准备灭火,画面色彩有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这一场景与爱森斯坦论及的“惯常环境的材料处理的例子”[27]38相契合。从情节本身来看,安德森对厄普顿·辛克莱小说中有关矿井灾难性事故的几次描述进行了改动,一方面与影片前半部分的两次矿难相呼应,但并没有过多考虑表现矿难自身的细节;另一方面则刻意强调“矿井大火”这一连续性场景在影像表现中的完整性与重要性。如果说先前工友的死难事故只是凸显出丹尼尔与伊莱两人在村镇中位置的相互牵制,并延续他们之间缠斗的话,那么这一次“矿井大火”就是导演着力描画的重要场景与灾难载体。在这段场景中,荒原、大地、火焰、石油都不是单纯的拍摄背景,而是自带情绪与意识形态的表意载体。

虽然爱森斯坦在《并非冷漠的大自然》一书中认为“脱离常态”——转入另一个向度,以便引起激情的效果[27]38,这种表现手法“在左拉的自然主义流派,首先是左拉本人的作品中俯拾即是”[27]38,但在电影《血色将至》中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影像效果,或者说是一种交汇。也就是说,安德森导演在

无意中成为自然主义者(除了厄普顿·辛克莱,还有左拉)文学理论与爱森斯坦电影理论的践行者,当然他增加了很多他喜欢的元素:人物塑造、色彩、音乐、节奏感等。难怪有评论家提到在丹尼尔·普莱恩维尤的狂热中,有一种埃米尔·左拉式的冲动,即赋予他所选择的虚构主题一种包罗万象的宏伟感,通过他的攻击方式"迫使整个宇宙"融入他的主题[28]。丹尼尔为他自己挖到石油获得财富而狂喜,而与此同时,H.W.的受伤让他无法平静,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在同时发生的,悸动的音乐印证着主人公丹尼尔复杂不安的内心。作为整部电影的高潮部分,"矿井大火"这一场景深刻展示了丹尼尔的人性及其复杂性,井喷导致的人物表情变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激情结构的基本特征便是不断的"如痴如狂",不断的"失去常态"——就是随着一个镜头、一段插曲、一个场景、整部作品情绪内容力度在数量上不断增强,作品的每一个别元素或特征不断地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飞跃[27]50。《血色将至》中"矿井大火"这一幕的结构正是按照这一模式展开的。所以,当丹尼尔发现孩子受伤后情况糟糕时,他对孩子痛苦的同情,突然借助大火被转移到了油井的问题上。他的内心因财富激增感到欣喜,但另一方面却对"家庭"的变故感到恐惧。井喷的火焰最终得以控制,但痛苦的另一扇门却由此打开。丹尼尔努力通过迫使自己隐藏对儿子的爱来保护这份爱,但这份爱是脆弱的。影片不时切入H.W.的视角来展现他受到创伤之后的无声世界,也是在暗示观众,丹尼尔所有的解释,对H.W.来说都听不见,也是徒劳的。在这一部分中,场面所必需的结构规律并不表现于场景的纯结构性元素,而是对现象按这一规律的公式来描绘,让所描绘的人物按作者的意旨行动[27]39。这一点也呼应了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按照这一公式的结构处理完全是凭直觉产生的,完全是作为主题的激情本身形成的最有机的形式而自然产生的。在H.W.不停地在说"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而丹尼尔试图控制住H.W.的紧张情绪并表达自己的爱意时,所有充满矛盾和悬念的内容,都被移植到了井喷后不久,丹尼尔背着H.W.前往营地餐厅的长镜头中。这一段本可以简洁明了地传达叙事信息,但安德森却选择将其延长,创造"激情"并使其带有一定的虚幻感。这一片段揭示了某种真相:一个男人怀抱着他所珍爱的孩子,伴随着急促的音乐声,逃离并前往一个无法寻觅的"安全之地"。不久之后,丹尼尔把H.W.留在餐厅桌子上,尽管男孩恳求他不要离开,他还是跑回燃烧的井架旁,用斧头砍断了固定井架的几根绳索,这一意象用一种"脱离常态"的"激情"方式象征了他与H.W.之间亲情纽带的解除,而实际上导致这一后果的恰恰是他在大火中对油井与财富的无法割舍。

最后,安德森以三个截然不同的镜头结束了这一场景,分别来自H.W.、丹尼尔、伊莱,他们从各自的视角看着冲天火光中的油井。最初的镜头来自餐厅内惊坐起的H.W.,然后是丹尼尔,最后是在火光映照中的伊莱的视角。在"矿井大火"面前,影片创造了一种暂时的融合,而这些融合反过来触动了观众的内心。

全面描写的环境本身组成环境的细节,事件本身在每一场面中的发展阶段,在影片中处于结构所要求的状态之中[27]38-39。《血色将至》的结构手法正是如此,当影片力图引起"激情"的效果,或者是把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激情性质的事件也提升到激情的程度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在整个"矿井大火"过程中,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声时刻伴随着这一场景。一场灾难的降临好像是在映照出不同人对事故的看法,音乐也在间接地暗示,鼓声所带来的兴奋隐喻命运所伴随的激奋。这样一来,《血色将至》便脱离了"有音乐伴奏的"电影结构范围,达到了音乐形象与视觉形象的融合统一,从而创造出作品统一的声影形象[27]39。

结 语

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已给现代电影很多的预示。科学的方法、环境的理论,甚至于剧本的组织和细目的选择在两方面都有共同之点[29]。电影《血色将至》通过跨媒介形态,串联起从文学自然主义到影像自然主义的清晰脉络,让沉寂已久的自然主义思潮在当代影像创作中重新焕发活力。这不仅给自然主义文学的当代阐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是历史影片呈现社会矛盾冲突与经济机体(银行、工厂、矿山、巨大的百货公司)的斗争[22]140的大胆尝试。安德森电影的特点在于"与当下流行风潮、时代节奏之间这种略带对抗性的创作姿态"[30]13,这也使他在当代美国电影版图中赢得与众不同的地位。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创作瓶颈期后,安德森一改以往电影"情绪紧绷、叙事节奏强"

的特点,转而书写“情感疏离、叙事规整的年代史诗”[30]13,《血色将至》与后来的《大师》(The Master,2012)就是这一时期全新艺术表现形态的代表作。

参考文献:

[1]卢卡契.左拉诞辰百年纪念[M]//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470.

[2]左拉.实验小说论[M]//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55.

[3]Bloom H. American naturalism[M]. Broomall: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4.

[4]Lawrence D H.Critics on Upton Sinclair[M].Coral Gables: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5.

[5]Sperb J. Blossoms and blood: postmodern media culture and the films of Paul Thomas Anderson[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3.

[6]Coodley L.The land of orange groves and jails: Upton Sinelair's California[M].Berkeley:Heyday Books,2004:56.

[7]Hernandez E.Decade: Paul Thomas Anderson on "There Will Be Blood"[EB/OL]. (2009-12-24)[2026-04-23]. https://www.indiewire.com/features/general/decade-paul-thomas-anderson-on-there-will-be-blood-246085/.

[8]布莱克.黑金:世界石油政治经济史[M].阿德莱德,朱莹,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

[9]辛克莱.血色将至[M].孙壮丹,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0]皮兹罗.充满血腥的石油:《血色将至》摄影谈[J].电影艺术,2008(4):137-142.

[11]郭沫若.写在《煤油》前面[M]//辛克莱.煤油.上海:上海国民书店,1939:2.

[12]凯尔纳.好莱坞电影与政治(2009)[M]//詹姆逊.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13]麦格拉斯.20世纪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及文学:《纽约时报书评》精选[M].朱孟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0.

[14]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实[M]//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437.

[15]Sinclair U.Preface[M]//Sinclair U.Oil!.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6:5.

[16]Anderson P T.Foreword[M]//Rosenbaum.Altman on Altman. 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2005:16.

[17]Phipps.Making the milk into a milkshake: adapting Upton Sinclair's "Oil!" into P. T. Anderson's "There Will Be Blood"[J]. Literature/Film Quarterly,2015,43(1):34-45.

[18]朗松.自然主义流派的首领:爱弥尔·左拉[M]//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379.

[19]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M]//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0]左拉.左拉文学书信选[M]//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78.

[21]拉法格.左拉的《金钱》[M]//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340.

[22]米贝京.艺术与科学:问题·悖论·探索[M].任光宣,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23]多林.法律与文学:跨越边界的对话[M].孙达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77.

[24]梅林.今天的自然主义[M]//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445.

[25]左拉.萌芽[M].毕修勺,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7.

[26]Emanuel L.There Will Be Blood by Paul Thomas Anderson[EB/OL]. (2008-01-13)[2026-04-23]. https://emanuellevy.com/interviews/there-will-be-blood-by-paul-thomas-anderson-3/.

[27]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28]Toles G.Paul Thomas Anderson[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6:80.

[29]左拉与电影(1933)[M]//田亦洲.时间的特写:民国电影理论译文选续编.天始,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4:173-174.

[30]Warren E.The cinema of Paul Thomas Anderson: American apocrypha[M].New York:Wallflower,2023.

There Will Be Blood: From Literary Naturalism to Cinematic Naturalism

Wang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Directed by American filmmaker Paul Thomas Anderson and released in 2007, *There Will Be Blood* is adapted from Upton Sinclair's 1927 novel *Oil!*. The film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great American film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s adaptation not only inherits the naturalistic literary elements of the source novel, but also expands Émile Zola's naturalist theories and Sergei Eisenstein's cinematic aesthetic paradigm from fou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 the theory of the experimental novel,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the theory of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athos.

Keywords: *There Will Be Blood*; *Oil!*; film adaptation; naturalism

现象学视域下《老人与海》的超越之途

——从具身搏斗到本真照面的存在论阐释

樊佳奇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老人与海》向来被视作海明威“硬汉精神”的文学注脚，但其深层的存在论意蕴远未得到充分开掘。跳出传统意象分析与主题阐释的框架，将圣地亚哥三天三夜的海上搏斗还原为一次发生性的现象学经验，以意向性结构为基本线索，把具身此在的老人把握为意向活动（Noesis）的承载者，把大海、大鱼与鲨鱼构成的意义整体把握为意向相关项（Noema）的开展场域，最终将梦境中的狮子锚定为存在本身的绝对被给予性，便能从作品中提炼出“限度—回撤”的超越机制：真正的精神超越从来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征服，而是意向相关项在完成淬炼使命之后的自行退隐，使得意向活动摆脱中介的遮蔽，与存在本身达成无蔽的本真照面。这一阐释重新打开了“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存在论维度，既呈现出海明威从“迷惘一代”到本真生存的思想蜕变轨迹，也为现代性处境下的存在之思提供了文学性的应答。

关键词：《老人与海》；存在论差异；意向性；本真照面；海明威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8

引言：作为存在论寓言的海明威叙事

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次年为海明威斩获普利策奖，1954年更助其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作家毕生创作的精神收束之作。这部不足五万言的中篇，以近乎白描的极简笔法铺陈老渔夫圣地亚哥三天三夜的海上际遇，在最朴素的生存场景中叩问生命尊严、意义限度与超越的可能。诺贝尔授奖词称其彰显了“卓越的叙事艺术”，但这只是海明威“冰山原则”浮出水面的部分；隐没在水面之下的，是对人之存在方式的深度勘探——人如何在有限的、被抛的苦难处境中，穿越意义的遮蔽，最终与存在本身达成直接的、无蔽的照面。这才是这部作品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所在。回顾既有研究，国内学界的阐释大致沿三条路径展开：其一为伦理路径，聚焦“硬汉精神”的道德感召力，将圣地亚哥塑造成人类意志力的化身；其二为象征路径，对大海、大鱼、狮子、鲨鱼等核心意象逐一拆解，赋予其多重隐喻内涵；其三为存在主义路径，借萨特、加缪的理论框架解读生存困境与荒诞反抗[1]。国外研究则多侧重叙事技法、冰山原则的文体实践，以及作家生平与文本的互文性考察[2-4]。这些研究极大拓展了作品的阐释空间，但始终存在一个根本的局限：始终停留在散点式的意象解读或主题归纳，未能建立起一个统摄全部核心意象、贯通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整全性存在论结构，也因此无法回应一系列深层追问：为何搏斗恰恰持续三天三夜，而非更短或更长？每日的意识状态经历了怎样的存在论层

收稿日期：2026-06-02

作者简介：樊佳奇(1984—)，男，河北石家庄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解释学。

面的跃迁？这一过程与现象学还原的发生机制有何隐秘的对应？为何早期“迷惘的一代”始终困在虚无的闭环里无法突围，而圣地亚哥能够实现超越？被鲨鱼啃噬殆尽的鱼骨，究竟是失败的耻辱标记，还是精神凯旋的见证？这些追问共同指向一个理论上的空白：人们始终缺少一套能够同时解释“失败”与“超越”、肉身受苦与精神凯旋的存在论框架。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白：不把三天三夜的搏斗看作单纯的故事情节，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发生着的现象学还原过程，借意向性理论打开其深层的“限度—回撤”超越结构。需要先行申明的是：理论从来不是外在强加给文本的框架，而是从文本自身的生存经验中生长出来的照亮之力；不是用文学去印证哲学命题，而是借哲学的眼光，去敞亮日常阅读中被遮蔽的生存真相。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核心概念做简要的存在论澄清。现象学的基本命题是“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种先天的指向性被称为意向性。其中，具身的、实践性的意识指向活动，称作“意向活动”（Noesis）；意识在自身中构造出来的意义对象与意义境域，称作“意向相关项”（Noema）；而一切意义的终极源头，那种在直观中被直接给予、无需任何中介的存在本身，就是胡塞尔所言的“绝对被给予性”（absolute givenness）[5]。

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并非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而是意识行为与其所构意义的一体两面。意向活动是动态的意识运作，意向相关项则是在这些行为中被意指、被显现的内容本身，并不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外物，而是对象在意识中的显现方式，是意识构造出来的意义世界。这对概念所标记的，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映射，而是一个意义生发与构成的场域。这一意义场域之所以可能，其最终根基端赖——绝对被给予性。所谓“绝对”，并非指外在实体的坚不可摧，而是指意识内在体验的无可置疑性。绝对被给予性所担保者，非物之实存，乃意义之明证。一切意向构造，最终皆须回溯至这一直观源泉，否则便陷入空衍与虚无。在文学叙事中，人物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正是一种意向性关系。作品中的自然景物、他者形象，乃至整部文本的意义织体，均可视为意向相关项的流动与变异。它们既是存在向此在显现的通道，亦可能成为遮蔽存在的帷幕。它们既要足够丰盈，足以激发此在的全部感知潜能；又要最终退场，为更本真的照面腾出空间。而绝对被给予性在这一过程中所担保的，正是文学体验自身无可化约的明证性：读者虽无法确证虚构世界的实存，却无可否认正沉浸于文学虚构世界这一体验的绝对被给予。作品的意义正在于以其自身的方式，构造出一个要求被直观、被体验的意义世界，并在此直观中自我奠基、自我成全。对应到文本中，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和绝对被给予性三者分别指向圣地亚哥的肉身此在、大海与大鱼构成的意义世界，以及狮子所象征的纯粹存在归宿。这样的对应绝非生硬的比附，而是从文本的生存经验本身凝练出来的阐释路径。

一、肉身此在：圣地亚哥意向活动的实际性锚定

现象学从一开始就拒绝把意识封闭在内在的心理剧场之中。胡塞尔“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6]的论断，本身就已经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指向了存在论层面：意识的本质就在于不断超越自身，指向世界。海德格尔进一步将意向性收归到此在的生存结构之中：意向活动不是主体的某种心理属性，而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方式[7]。梅洛-庞蒂则把这一问题推进到具身层面：身体不是有待被意识支配的物体，而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媒介，是活的身体（Leib），是意向活动的具身化实现[8]198-199。《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那具饱经风霜却始终挺立的肉身，正是意向活动最鲜活的文学具象，构成了一切超越得以发生的起点与根基。

（一）被抛与筹划：肉身的存在论二重性

小说开篇的白描，几乎就是一次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直接呈现了意向活动的二重维度：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被抛性”与“筹划性”。“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9]139 老迈的肉身，是此在无法选择的实际性。连续84天一无所获的厄运、手掌上被钓索磨出的陈年疤痕、时常抽筋的左手，都是时间与劳动在肉身上刻下的存在论印记。这具身体会疲惫、会疼痛、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站在衰败的边界上，构成了主体存在的绝对限度。圣地亚哥对这份有限性没有

任何怨怼，左手抽筋时，他只是带着自嘲的语气催促它恢复。这份清醒的接纳没有滑向绝望，反而成了一切行动最坚实的起点——只有真正站稳了有限性的根基，超越才不是悬空的幻想。而那双“像海水一般蓝”的眼睛，则代表着意向活动的筹划本质。纵然肉体衰老、失败如影随形，意识的光芒依然清澈而坚定，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敞开、对存在的热爱。这份“愉快”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是源于对存在本身的忠诚：无论境遇如何，都始终准备着迎接、见证、承担。海明威通过这一老一明、一衰一坚的对比，为全书奠定了生存论的基石：真正的意向活动，既植根于脆弱的肉身，又超越了肉身的脆弱；有限的肉身不是需要被克服的缺陷，恰恰是超越得以发生的唯一场所。

（二）身体图式：搏斗作为前反思的“我行”

大鱼上钩的刹那，具身化的意向活动得到了最充分的绽出。当钓索传来异动，老人立刻“攥着它，在座板上死劲撑住了自己的身子，仰起上半身来抵消鱼的拉力”[9]162。整个过程没有“思考—决断—行动”的线性推导，身体本身就已经是前反思的理解。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图式”，正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状态：身体不是空间中的一个物件，而是人们对空间的把握本身，它通过习性化的运动，直接“理解”了世界[8]148。圣地亚哥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身体图式的直接运作。数十年的海上生涯已经内化为身体的记忆，他仅凭钓索的震颤就能精准判断鱼的大小、深度与游动方向，钓索成了身体的延伸，在两个生命之间牵起了张力与对抗的纽带。更值得深思的是老人对待疼痛的态度。左手抽筋时，他不像对待异己之物那样诅咒它，而是像对待一个伙伴一样与之对话，接纳疼痛，而不是逃避疼痛。疼痛是什么？疼痛就是意向活动抵达肉身极限的信号，它标记着被抛性的边界。对边界的接纳而非逃避，恰恰是意向活动完成自我锚定的关键。圣地亚哥没有因为疼痛而放弃、而自怜，他只是让疼痛成为搏斗的真实组成部分，继续做必须做的事。这不是斯多葛式的麻木冷漠，而是一种更深的存在抉择：搏斗本身，已经比舒适更重要。

（三）从碎裂到挺立：与早期“迷惘者”的谱系学对照

把圣地亚哥放回海明威的创作谱系中考察，更能看清其意向活动的独特性。早期“迷惘的一代”之所以困在虚无的闭环里无法突围，根本原因就在于“意向活动的碎裂”——肉身之弓或是已然断裂，或是失去了指向，再也无力射出超越的箭矢。《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杰克·巴恩斯，战争带来的伤残不只是生理功能的缺失，更是意向活动“生成”与“联结”能力的断裂。他无法通过爱与繁衍确证存在的意义，意向活动始终找不到超越性的落点，只能在酒精、斗牛与派对的循环里耗散能量，像一张断了弦的弓，再也张不开张力[10]。《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在看穿战争叙事的虚伪之后彻底幻灭，转而把爱情当作逃避世界的避难所，这本质上是对现实的逃遁；当凯瑟琳离世，依附于外在对象的意向活动便彻底失了锚，坠入彻底的空无[11]。《乞力马扎罗的雪》里的哈里，更是因为背叛了写作的本真追求，意向活动既回不去无憾的过去，也投不出有意义的未来，困在腐烂的肉身里等待终结[12]。三者的困境呈现出结构性的一致：意向活动或是碎裂于身体的完整性，或是碎裂于意义的可信性，或是碎裂于自我的忠诚性，最终落入“无指向”的存在状态——意识还在运转，却不再有力地指向能够淬炼精神的他者，只是向内打转的漩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圣地亚哥更老、更穷、更不走运，却因为坦然接纳了自身的有限性，反而获得了挺立的力量。他的身体不是障碍，而是与世界、与存在对话的根基；84天空手而归仍每日出海，明知可能一败涂地仍不退让，肉身之弓始终张开着，始终保持着指向世界的张力。

二、境域与中介：作为意向相关项的海洋世界

如果说圣地亚哥的肉身是意向活动的起点，那么大马林鱼、鲨鱼，以及包裹着二者的大海，便是意识所指向的“意向相关项”。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相关项，不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外物，而是对象在意识中的显现方式，是意识构造出来的意义世界。它既是存在向此在显现的通道，也可能成为遮蔽存在的帷幕：它既要足够强大，足以激发此在的全部潜能；又要最终退场，为更本真的照面腾出空间。在《老人与海》里，大海、大马林鱼、鲨鱼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意向相关项系

统，分别承担着基础境域、肯定性淬炼、否定性解蔽的功能，一步步把圣地亚哥引向本真的存在之照面。

（一）大海：显隐二重的敞开域

大海是全部叙事展开的基础境域，它兼具孕育生命与吞噬一切的双重属性，恰是海德格尔所言“世界”与“大地”之争的具象——世界是意义敞开的领域，大地是自行锁闭的根基，二者的争执，构成了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基本张力。老人对大海的称呼里，藏着他的存在论态度。他总用西班牙语的阴性形式la mar称呼大海，而不是把它当作竞争对手的阳性el mar。在他眼里，大海不是需要被征服的对手，而是有自己脾性的存在者，它时而馈赠恩惠，时而收回馈赠，全不随人的意愿转移。他不抱怨84天的坏运气，也不夸耀曾经的丰收，深谙大海的节律自有其法度，非人力所能左右。大海规定了圣地亚哥生存的可能性，也划定了他的边界。他对水深、洋流、鱼群、天象的判断，都来自经年累月的具身经验，这份“在世界之中”的熟悉感，正是此在与世界的原初亲密性。但与此同时，大海又是流变莫测的：它可以送来前所未见的大鱼，也可以派来鲨鱼群夺走一切，在馈赠与剥夺之间，保持着绝对的主权。大海就是这样一个“敞开域”：它是意义显现的空间，却不保证任何特定的意义。这份双重性，正是搏斗最深处的内核：圣地亚哥从来不是在征服一种自然力，而是在与存在本身的显—隐二重性共舞。

（二）大马林鱼：从猎物到他者的镜像

大马林鱼的出现，把抽象的境域凝聚成了具体的对抗，它是意向相关项的核心。在三天三夜的拉扯里，它完成了从功利性猎物，到具有独立尊严的他者的深刻嬗变。最初，鱼只是可估量、可交换的目标，老人估算它的重量，盘算它能卖多少钱，这是意向活动对相关项的功利性把握。但随着搏斗的延续，鱼渐渐显现出了超出经济价值的壮美。当大鱼跃出水面，流线型的身躯、舒展的鳍翼呈现出崇高的姿态，老人的赞叹里已经没有了占有的欲望。再往后，老人开始对着鱼说话，从“奉陪到死”的对峙，到“我爱你，非常尊敬你。不过今天我得把你杀死”[9]168的坦诚，最后称它为“老弟”，赞叹它的“庞大、美丽、沉着、崇高”[9]191。称呼的层层递进，背后是存在论层面的转变：大鱼不再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客体，而是与主体对等、有着自身尊严的他者。老人要杀死它，却并不否定它的价值；搏斗的两端，两个生命被看不见的纽带绑在一起，共同完成了比捕获本身更本质的事情。从列维纳斯的现象学视角看，大鱼已然呈现出“他者面容”的特质：它超出了主体的概念把握，承认它的权利与尊严，正是伦理回应的开端[13]。大鱼的壮美无法被主体消化、占有，它以自身的辉煌唤醒了老人心中的崇高感，二者互为镜像，在对抗中共同完成了生命力量的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鱼完成了“精神淬炼中介”的使命：它足够强大，逼得老人调动起全部的生命潜能；它足够崇高，让搏斗超越了功利层面，成为一场与他者相遇的极致经验。

（三）鲨鱼群：否定性的意义悬置

如果说大鱼是意向相关项的肯定性维度，鲨鱼群便是否定性维度，承担着意义悬置与解蔽的功能。它们的到来不是偶然的灾难，而是存在法度的必然：一切有形的外在成果，终究要走向消解。鲨鱼一拨接一拨袭来，老人的武器从鱼叉到绑了刀子的船桨，再到舵把，最后只剩下一双空手。他一次次击退进攻，大鱼的血肉也一点点被啃噬殆尽。这一过程的存在论意义在于：鲨鱼群迫使圣地亚哥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被动悬置”。胡塞尔的“悬置”（Epoché）是主体主动的方法论操作，把外部世界的存在信念放进括号，让绝对被给予性显现出来。但在生存论层面，人对外在价值的执念往往深到无法主动放下。鲨鱼群便以否定的力量强行介入，用最残酷的方式剥夺了所有外在价值：作为物质成果的鱼肉、作为荣誉象征的完整鱼身，甚至搏斗的武器，都被一一夺走。这份被动的剥夺，反而更接近海德格尔所言的“泰然任之”：不是人主动放下，而是存在把人带入了放下的境地。当老人最后挥舞着舵把徒劳地击打海水时，他的搏斗已经彻底摆脱了功利目的，成了纯粹的生命意志的表达。当他拖着只剩骨架的大鱼回到岸边，世俗层面他已经一无所有；但存在论层面，这份无可抗拒的剥夺，完成了对所有世俗意义的彻底悬置——意识不再黏着于任何外在之物，意向相关项在完成了淬炼与解蔽的双重使命之后，以自我牺牲的方式退场了。被啃光肉的鱼骨不是失败的证明，而是意向相关项使命圆满的标记：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然后消失，为最终的照面扫清了所有障碍。

（四）与早期作品的对观：作为遮蔽的意向相

关项

对比海明威早期作品里的意向相关项，更能凸显本作的突破。早期主人公并非没有意向相关项，但这些相关项从来没有完成精神淬炼的使命，反而成了遮蔽存在的麻醉剂。《太阳照常升起》里，酒精、斗牛、派对构成的相关项网络，只能提供短暂的快感高潮，循环往复却带不来任何上升性的改变，永远把人抛回空虚的起点。这些相关项从未把足够强大的他者推到主人公面前，逼他直面自身的极限。《永别了，武器》里，亨利把爱情当成逃避战争的避难所，而不是对峙与淬炼的对象；当爱情崩塌，他便一无所有，因为他从未在关系里完成自我的淬炼，只是转移了依附的对象。《老人与海》的超越性正在于此：意向相关项圆满走完了从肯定到否定的完整路径——大海以双重性教会人谦卑与勇敢，大鱼以他者尊严唤醒崇高感，鲨鱼以否定暴力完成意义悬置，而后全体退场。意向相关项的回撤不是意义的崩溃，而是使命的终结，为更本真的照面腾出了存在的空间。

三、自行显现的存在：本真照面与超越的终极形态

当意向相关项完成了全部使命，圣地亚哥回到窝棚沉沉睡去。正是在这里，作品完成了最关键的一跃：从搏斗到照面，从意义境域到存在本身。从现象学的眼光看，当中介性的意向相关项全面回撤，具身的意向活动便有可能与作为存在本身的“绝对被给予性”达成无蔽、直接的本真照面。这就是超越的终极形态：它不是对某物的占有，不是某种成就的达成，而是存在方式的整体转变——从“执着于对象”转向“与存在同在”。

（一）“毁灭”与“打败”的存在论差异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9]197这句流传最广的箴言，常被简化为励志口号。放在存在论差异的框架下，它才能获得本真的阐释。“毁灭”与“打败”的区分，本质上是两个存在层次的分野。“毁灭”属于肉身的、外在的意向相关项世界：失去大鱼、失去渔具、失去他人的尊重，甚至失去生命，都属于可毁灭之物。它们是此在的附属物与外在标记，其得失无法触及存在的核心。圣地亚哥失去了全部鱼肉，还要面对世俗眼光的误解——女游客把鱼骨错当成鲨鱼的骨头，侍者只把它当作无用的垃圾，这些都是世俗价值尺度的讽刺。如果把自我价值寄托在外物之上，他无疑已经被彻底毁灭。但“被打败”关乎的是意向活动本身的完整性，关乎此在与存在的联系是否存续。被打败，意味着放弃对存在的回应，意味着意向活动的彻底瓦解，是存在论层面的溃散——这在圣地亚哥身上从未发生。搏斗的全程，身体在衰竭、工具在丧失、成果在消逝，但意向活动始终挺立着。即便他脱口说出“它们把我打垮了”，也只是对世俗事实的坦然承认；话音刚落，他便立刻筹划起下一次出海，证明他的生存意志、与大海的联结、对生命的热爱，全都完好无损。这一区分，道破了海明威式超越的核心：它不依赖对世界的征服，不建立在外在的占有之上。人可以被剥夺一切外物，却依然可以是“不可击败”的——因为不可击败的从来不是可毁灭的外物，而是此在对存在的忠诚，是意向活动在极限处的挺立。圣地亚哥的胜利，不是世俗的胜利，而是本真生存的存在论胜利。

（二）梦中的狮子：澄明中的自行显现

老人入睡之后，再次梦见了非洲海滩上的狮子。这一意象在小说里前后出现三次，构成了一条隐秘的精神线索，也是整部作品的精神收束点。小说开篇，老人已经不再梦见风暴、女人、大鱼和争斗，只梦见非洲的海滩和狮子，此时意象还只是静默的铺垫；搏斗最疲惫的时刻，短暂睡梦中的狮子为他重新注入了力量；小说结尾，拖着鱼骨归来的老人沉入最深的睡眠，狮子再次显现。梦中的狮子“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耍着”[9]150，它们不需要证明什么，不需要征服什么，只是“如其所是”地存在着。这份状态，正是海德格尔“本真存在”的意象化：存在者在无蔽中自行显现，不被外在的目的所规定，力量内在于存在本身，自然地流溢出来。从现象学的视角看，深度的梦境构成了独特的绝对被给予性场域。当搏斗完成了对所有世俗意义的悬置，清醒时的全部意向相关项——大海、大鱼、鲨鱼、荣辱、他人的眼光——全都退场了。这份悬置不是主动的哲学操练，而是存在通过搏斗的历程，替他完成的淬炼。在被剥夺至空无的境地里，最纯粹的东西得以显现：没有猎物需要征服，没有敌人需要抵御，没有价值需要证明，只剩下意向活动的梦中

之身，与作为存在本身的绝对被给予性，在梦境里达成了直接的、无蔽的本真照面。傍晚的沙滩、柔和的光线，都暗示着和谐的存在状态——不再有对抗与征服，一切存在者和平共处。世俗层面的空手而归，在此转化为精神的绝对凯旋。不是“尽管失败仍保有尊严”——那终究还是在用世俗的尺子衡量；准确地说，是通过接纳彻底的世俗失败，超越了成败的二元逻辑，进入了成败不再有意义的存在领域。梦中的狮子，就是这本真照面的永恒见证。

（三）创作的蜕变：从“迷惘”到“超越”的存在论轨迹

从作家整体的创作脉络看，《老人与海》不是孤立的巅峰，而是海明威一生精神求索的总结与升华。早期“迷惘的一代”写作，其核心困境可以概括为：意向活动碎裂—意向相关项遮蔽—绝对被给予性缺席。身体创伤、意义幻灭、自我背叛，让主人公的意向活动断裂涣散，无法指向超越性的目标；酒精、战争、金钱等相关项，或是麻醉剂或是幻象，从未承担起精神淬炼的使命，存在本身始终被遮蔽着。这便是“迷惘”的存在论根源：它不是情绪上的迷茫，而是存在结构的断裂。而《老人与海》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形成了“意向活动挺立—意向相关项圆满—绝对被给予性显现”的完整闭环。圣地亚哥肉身脆弱却意向坚定，大鱼完成了精神淬炼，鲨鱼完成了意义悬置，大海承载了全部历程，最终意向相关项功成身退，绝对被给予性在梦中自行显现。这是一个完整的、从迷惘到照面的现象学还原过程。这一转变，也是海明威自身生命体验的凝结。写作《老人与海》时，他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四次婚姻、数度重伤与创作瓶颈，曾执着于荣誉、胜利等外在的“意向相关项”，也因此饱尝痛苦。通过圣地亚哥，他完成了对外在羁绊的超越，塑造出世俗层面彻底失败、存在论层面彻底胜利的人物，安放了对生命最深的领悟：真正的凯旋，从来不是抓在手里的东西，而是放下一切之后仍然挺立的东西。

结语：“限度—回撤”结构与本真生存的可能性

从《老人与海》的文学经验里，可以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论洞见，即“限度—回撤”结构：人类的超越，永远无法通过意向活动征服意向相关项以抵达绝对被给予性的线性征服模式实现，只能通过意向相关项在完成淬炼使命之后的自行回撤，让意向活动摆脱中介的遮蔽，与绝对被给予性达成直接的本真照面，才得以完成。这一结构包含三个层层递进的环节：其一，意向活动必须足够坚实，挺立的具身此在是一切超越的根基；其二，意向相关项必须完成双重使命——既要以足够的强度淬炼精神，又要最终以回撤或牺牲完成意义的悬置；其三，当一切中介退场，本真照面才得以发生，它不是对外物的占有，而是对存在本身的见证。这一结构并非仅适用于《老人与海》。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里，《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死亡带来的面具剥落、《饥饿艺术家》中肉身耗竭的绝对忠诚，都隐约呼应着同一逻辑：意义的终极发生之地，不在征服与拥有之中，而在放下与接纳之中。这一阐释框架，或可为不同文本之间的深层对话，提供可延伸的思想路径。这份来自文学的洞见，对深陷现代性困境的人们而言，尤具启示意义。此刻所处的时代，正是“意向相关项”极度膨胀的时代。消费主义与技术资本制造出无穷无尽的虚假意义境域——迭代的商品、遥不可及的成功标准、被精心策划的完美生活展示，把人训练成了欲望的永动机。人们误把中介本身当成了终极目标，在追逐外物的过程里耗空了自身，陷入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的遗忘”：忙于和存在者打交道，却忘记了存在本身。圣地亚哥的超越之途，昭示了另一种可能。他的“被动悬置”是苦难带来的解放，而身处安逸中的现代人，无法等待外力悬置欲望，更需要从中获得启示，践行“主动的简朴”：主动培养悬置外物诱惑、回归具身体验的能力。当剥落了成功者或失败者的社会标签，那个在身体的真实疲劳里感受存在、在无功利的联结里感受温度、在对自然的凝视里感受敬畏的自我，本身就承载着不可剥夺的生命意义。这不是虚无主义的放弃，而是现象学式的解放。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全世界，而是在纷繁的关系里保持内在的独立，在拥抱有限性的同时见证存在的无限性。当圣地亚哥在梦中与狮子相遇，他不再是倒霉的老人、失败的渔夫，而是回归了存在家园的本真之人。肉身之弓得以安歇，狮子如其所是地在沙滩上玩耍，不需要征服任何东西——因为存在本身，已经是最高

的酬报。这便是《老人与海》超越时代的精神魅力，也是这部经典为所有在意义迷雾中摸索的现代人，燃起的不灭灯火。

参考文献：

[1]杨敬仁.海明威在中国[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2]董衡巽.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Young P. 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M].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
[4]Baker C.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M].New York：Scribner，1969.
[5]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1-42.
[6]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24-725.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89.
[8]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9]海明威.春潮/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10]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M].赵静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11]海明威.永别了，武器[M].林疑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12]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M].汤永宽，陈良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1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M].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0.

The Path of Transcendence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from Embodied Struggle to Authentic Encounter

Fan Jiaqi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literary footnote to Hemingway's "tough guy spirit", but its profound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have yet to be fully explored. Moving beyond conventional image analysis and thematic exposition, it reconstructs Santiago's three-day maritime struggle as a dynamic 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 unfolding along the intentionality structure. The old man's embodied Dasein is grasped as the bearer of Noesis (intentional act), while the sea, the marlin, and the sharks constitute the unfolding field of Noema (intentional correlate). The lions in Santiago's dreams are finally anchored as the absolute self-givenness of Being itself. On this basis, a transcendence mechanism of "limit-withdrawal" is distilled: authentic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is never a subject's objectifying conquest of an object, but the self-retreat of the noematic correlate after fulfilling its tempering mission, thereby allowing the noetic act to cast off all intermediary veils and enter into an unveiled, authentic face-to-face encounter with Being. This interpretation reopens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of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illuminating Hemingway's philosophical trajectory from the "lost generation" to authentic existence while providing a literary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ity.

Keyword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ontological difference; intentionality; authentic encounter; Hemingway

在解构之后如何言说共同体？

——米勒“复数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边界

杨 奇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希利斯·米勒的文学共同体思想是其晚期批评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米勒并非在南希与威廉斯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而是试图以“复数共同体”作为一种后解构主义的伦理回应。这一回应并未真正解决非功效共同体所揭示的沟通断裂问题，反而在“异质并存”的表象下回避了共同体构成的规范性难题。此种重读在批判性审视米勒的基础上，旨在为其文学共同体思想划定理论边界，并为当代文学共同体研究提供一种更具问题意识的进路。

关键词：希利斯·米勒；文学共同体；复数共同体；后解构主义伦理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09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1928—2021），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解构主义耶鲁批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文学共同体思想，作为其晚期批评理论的基石之一，在学界引发了持久而广泛的关注。然而，综观国内既有研究，大多沿袭一条“模式归纳”的阐释路径：研究者倾向于将米勒的共同体思想划分为“乡村共同体”“非功效共同体”“复数共同体”三重模式，进而阐释各模式的核心内涵、代表人物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征形式。这类研究无疑具有拓荒之功，为理解米勒的思想提供了清晰的概念地图。然而，其局限性也同样显而易见。其一，缺乏问题意识，将米勒的思想简化为分类学对象，却遮蔽了其背后更深层的理论动机；其二，缺乏批判距离，对米勒的论述基本持接受态度，致力于阐释其“是什么”，而鲜有对其理论限度进行系统的、内在的检视；其三，文献基础狭窄，对米勒晚期，特别是《共同体的焚毁》（*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文学作为行为》（*Literature as Conduc: Speech Acts in Henry James*）等关键著作的解读尚不够深入，对国外学界围绕米勒共同体思想展开的争论，例如其与南希、德里达、朗西埃等人的理论异同，吸纳严重不足，导致研究视野局限于米勒一人之论，缺乏更广阔的理论参照系。

本文针对上述局限，尝试完成一次从“描述”到“追问”的范式转换。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有三：其一，米勒的“复数共同体”在理论上是否真正超越了“乡村共同体”与“非功效共同体”的二元对立，抑或它只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异质性”概念，回避了前两者所揭示的核心矛盾？其二，复数共同体所主张的“异质并存”，是一种建设性的、指向未来的共同体构想，还是一种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时，在理论上妥协、在政治上无力的描述性模型？其三，米勒的文学共同体思想能为当代共同体理论，特别是文学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提供何种独特的理论资源？它又在何处暴露出其自身不可回避的限度和盲点？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以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重新审视米勒对“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收稿日期：2026-06-18

作者简介：杨 奇（1985— ），男，山西晋中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揭示其看似清晰的标准下所蕴含的内在张力与策略性含混；第二，重构“乡村共同体”与“非功效共同体”的对立逻辑，重点论证两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系统性解构，并揭示米勒在挪用南希思想时所进行的策略性“误读”；第三，聚焦“复数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分析其理论来源（福柯、德勒兹）及其转译过程中产生的伦理困境，论证其作为对“解构主义伦理回应”的性质及其理论困境；第四，为米勒思想划定边界，并指出文学共同体研究的可能出路。

一、共同体概念的张力：米勒的界定及其含混性

米勒对“共同体”的界定，主要见于其晚期著作《文学作为行为》第三章。表面上看，他提出了三个相互支撑、逻辑清晰的标准：其一，“共同持有的、理所当然的信念和责任”[1]87。即共同体不依赖于血缘、地缘等实体性因素，而根植于成员间共同持有的信念以及由此衍生的相互责任。其二，适度的群体规模。米勒认为，共同体的维系需要成员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面对面的交流，规模过大则会导致共同信念的稀释和责任的匿名化；规模过小，如“情人共同体”，则无法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共同体”。其三，共同体不受地方意识形态的影响[1]87。米勒明确将“意识形态”排除在共同体的构成条件之外，认为受意识形态支配的集体不过是阿尔都塞意义上或福柯意义上的“机器”，它通过“质询”将个体改造为主体，从而剥夺了主体的自主性与真正的共同体归属感。然而，细究之下，米勒所定义的这三条标准之间存在着界定的含混性，使其充满了理论的张力。

1.信念共同体的去实体化困境与再同一焦虑。米勒强调共同体依赖于“共同持有的信念”，这一界定明显受到南希“独体共在”思想的启发。南希主张，共同体不再是实体性的有机整体，而是“独体”（singularities）之间因无法弥合的“陌异性”（alterity）而构成的“共在”（being-in-common）[2]。米勒似乎接受了这一前提，将共同体从地缘、血缘的实体性束缚中解放出来。但问题在于：米勒并未说明，这种非实体的、纯然精神性的信念共同体，如何在社会—历史时空中维持自身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如果说乡村共同体尚有“篝火仪式”“节庆狂欢”与“当地方言”[3]作为可感知、可复现的维系媒介，那么米勒式的信念共同体则完全悬置于个体意识层面，其再生产机制成了一个谜。他在批评“情人共同体”时，否认两人可以构成共同体，理由是其缺乏足以超越私密关系的“普遍性”。但他并未回答：多少人才足以构成“适度”的共同体规模？信念的“共同性”如何被识别与确认？当一种信念失去其社会载体和符号化形式时，它如何能有效地将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这些问题在米勒的论述中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暴露了其在将共同体“去实体化”之后，未能为其“再同一”提供有效路径的困境。

2.对意识形态的排斥与复数共同体理论内核的结构性冲突。米勒将“意识形态”排除在共同体构成条件之外，认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组织不过是福柯所谓的“机器”（dispositif，又译“装置”）[4]41。这一立场体现了米勒对主体自主性的坚持。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在于：其后期提出的核心概念——“复数共同体”——恰恰以福柯所定义的“装置”为理论原型。福柯的“装置”是一个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法律、行政措施等异质性要素构成的网络，其运作的本质正是通过意识形态质询和规训权力来生产和管控主体的[4]41-42。米勒一方面拒绝意识形态，认为它扼杀了真正的共同体精神；另一方面又将“装置”这一充满权力管控色彩的机器，视为复数共同体的理想模型。他从未正面处理这一冲突：复数共同体作为“装置”，其运作是否必然依赖于某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复数共同体与被他斥为“机器”的意识形态组织之间，究竟有何本质区别？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个缺乏任何“共同信念”的异质性集合，又如何能被称为“共同体”？这一理论盲点，是理解米勒共同体思想内部张力的关键。

综上所述，米勒对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并非一个自足的、逻辑严谨的系统，而是一个充满了含混与内在张力的理论起点。含混的产生，或许是因为共同体思想贯穿了米勒学术思想的全部，存有前后的矛盾。这种含混，既为其后的三重模式建构埋下了伏笔，也为从内部解构其理论、暴露其限度提供了最初的入口。

二、从有机整体到断裂经验：“乡村共同体”与“非功效共同体”的深层对立

前人的研究经常把“乡村共同体”与“非功效共同体”视为米勒笔下两种并列的存在，甚至是两种前后相继的共同体模式。这种理解错失了米勒对于二者之间更为深层的理论认识。在米勒看来，非功效共同体的提出，系统性地解构了乡村共同体所依赖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预设。米勒并非中立地呈现两种模式，而是通过“先立后破”的策略，完成了一次对传统共同体想象的彻底清算。

（一）乡村共同体的同一性逻辑及其文学表征

米勒对乡村共同体的理论阐释主要来自于威廉斯。其对乡村共同体的文学阐释主要体现在托马斯•哈代的《还乡》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巴塞特的最后纪事》。在对这两部小说的细读中，他精准地提炼出乡村共同体的两个核心特点：一是基于地缘/血缘的集体，二是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主体间性”式的全知沟通。然而，他并非像威廉斯那样，在乡村共同体的消逝中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怀旧与失落；相反，他在这种怀旧式的集体当中，捕捉到了某种“同一性”的暴力。

1. 空间的“根深蒂固”与主体的蒙昧化。在对《还乡》的分析中，米勒敏锐地指出爱敦荒原不仅是地理背景，更是一个吞噬异质的黑洞。他强调荒原居民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纽带。这种“关联性”在威廉斯那里是抵御资本主义抽象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文化资源，但在米勒的解构视域中，却表现为个体的“非主体化”和“去差异化”。爱敦荒原居民的生活被季节、气候和世代相传的习惯所规训，个体的自省、欲望和决断被集体性的无意识所淹没。游苔莎•维伊所代表的“过剩的主体性”，因其与荒原的格格不入而最终走向毁灭。米勒借此暗示：乡村共同体的同一性，是以牺牲个体的差异性为代价的。这种“无知而幸福”的图景，实际上是米勒设下的伏笔：通过将乡村共同体与主体蒙昧状态相关联，暗示了任何追求绝对同一的集体秩序，本质上都带有对个体差异的抹除。小说中的主人公因拥有“过剩的主体性”而与荒原格格不入，这种张力预示了传统共同体在面对现代意识时的必然崩塌。

2.“心灵感应”：叙事透明性背后的极权阴影。在对《巴塞特的最后纪事》的分析中，米勒提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性的概念——“心灵感应叙事者”（telepathic narrator）[5]。他认为，巴塞特郡的人们之所以能实现无需言语的沟通，是因为他们共享了一套如“全知全能的上帝”般的集体意识。这种“主体间性”的极端形式，使共同体成员互为镜像，彼此之间毫无隐秘可言。

米勒在论述语调中保持了一种解构主义者的冷峻反讽：他将这种沟通模式比作一种“透明的监狱”。所以米勒担心过分强调“共同体”之“同”，即同一性，必然导致一种同质化，从而失却“通”（交互相通）的意义。如果每个人都能像读开着的书一样阅读他人的思想，那么个体的独异性将无处遁形。这种全知沟通并非民主的对话或协商，而是一种叙事层面的社会监控。它预示着，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对“共识”和“共同情感”的迷恋，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对异质性的深层排斥。

3. 策略性构筑：为解构而进行的“理想型”塑造。米勒选择这两部作品作为范本，其真实意图并非赞美乡村共同体，因为“对个体和个体价值以及个体自足性的尊重，始终是米勒文学批评行为背后的起点、支点和终点”[6]。米勒的目的在于完成一次“模型化建构”：他借助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将乡村共同体推向逻辑上的完美巅峰——一个空间闭合、沟通透明、信念统一的“理想型”（Ideal Type）。

米勒并非威廉斯意义上的怀旧者，他是一个深谙“欲抑先扬”之道的修辞家。他将乡村共同体塑造成这种看似完美无缺的“无缝的整体”，正是为了在随后的“非功效模式”中，利用卡夫卡式的断裂、南希式的独体理论，对这一整体进行更具摧毁性的内部爆破。这种“先立后破”的策略，使米勒能够有力地证明：那种被普遍怀念的、被寄予厚望的、具有同一性的“真实共同体”，在逻辑终点上必然走向对个体的压迫或主体的消解。

（二）非功效共同体：从南希到米勒的理论位移

米勒对非功效共同体的理解，主要源自他对让-吕克•南希思想的吸收。然而，既有研究往往忽视了米勒在引入南希思想时进行的策略性位移。

南希在《解构的共通体》中提出的核心在于“有限性”（finitude）：个体（在南希那里被称为“独

体”）在死亡面前的绝对暴露，构成了共通体得以显现的唯一可能。共通体并非主体的联合或融合，而是主体在面向死亡时的“外展”（ecstasis），一种向外的、无法回收的绽出[7]21。南希的“解构共通体”包含两个核心命题：共同体不可能被“造就”，它只能作为“共在”（being-in-common）被经验；独体的有限性与陌异性，使得任何以理解和共识为目的的“主体间性”式沟通，在本体论上都是不可能的。

米勒完整接受了前序学者对于“乡村共同体”的定义，却在“非功效共同体”这一命题上发生了策略性偏移。在他对卡夫卡的小说，特别是《城堡》和《审判》的分析中，反复强调小说文本中的非功效情节，称之为“巴别语的特征”[4]68，反复强调沟通过程中的“无法确知”“无法确认”[4]180，这表面上是在呼应南希；然而，他始终拒绝走向南希更为激进的结论——共同体不仅无法造就，甚至根本不可能作为一种“存在”而被言说，它只是一个不断延异、不断退却的踪迹。相反，米勒将“沟通失败”保留为一种可以在经验层面被描述、被分析的文学状态，而非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不可能性。换言之，对南希而言，沟通的失败是“本体论的”；对米勒而言，它更接近于一种“叙事学的”或“修辞学的”特征。

这一位移至关重要。它表明：米勒并非南希的信徒，而是一个试图在南希的彻底解构与威廉斯的社会构想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一片理论飞地的行者。复数共同体的提出，正是这一中间地带的理论投射。

米勒在此处完成了从本体论高度向叙事修辞层面的降维转换。在分析卡夫卡时，米勒将南希那种“无法造就的共在”转化为“语言学意义上的沟通失败”。这种转换产生了两重后果：首先，米勒将“本体论的不可抵达”替换为“修辞性的悖论”。他在《共同体的焚毁》中反复利用“铜壶逻辑”[4]109等悖论来证明，沟通的失败源于语言内在的逻辑冲突，而非存在本身的无法接近。其次，这种处理方式带有明显的审美化倾向。南希谈论共同体时始终伴随着对奥斯维辛创伤的深切伦理沉思，而米勒则更倾向于将非功效共同体视为一种抗拒确定性阐释的、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学文本属性。这种位移使米勒避开了南希理论可能导向的彻底虚无或神秘主义，从而为其“复数共同体”这一更具包容性和描述力的折中方案，预留了必要的理论空间。

（三）卡夫卡：米勒策略性误读的典型案例

米勒对卡夫卡的解读，是其共同体思想中最具启发性的部分，但同样充满了选择性。他集中分析《城堡》中K.始终无法与城堡建立有效联系的徒劳，《审判》中K.至死未能明白自己为何被审判的荒谬，以此作为非功效共同体瓦解乡村共同体同一性逻辑的绝佳佐证。然而，他刻意回避了卡夫卡作品中可能蕴含的、比其论述更为激进的维度：如果K.终其一生也无法进入城堡，如果他至死也未能获得那张决定其命运的“无罪判决”，这或许不仅仅意味着“沟通的失败”，更可能意味着，那个名为“城堡”或“法”的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幻象。卡夫卡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示了现代人寻求归属的徒劳，更在于揭示了那个被寻求的“归属”本身，可能只是一个由语言、权力和欲望共同编织的虚空。

换言之，米勒需要卡夫卡为他提供“共同体难以实现”的经验性证据，却不需要卡夫卡告诉他“共同体在根本上不可能存在”这一更具颠覆性的结论。这一取舍，构成了米勒共同体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悖论：他既承认非功效共同体对乡村共同体的逻辑前提进行了彻底解构，又不愿放弃“共同体”这个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伦理感召力和理论建构潜力。卡夫卡对米勒而言，是一个绝佳的“证据”，但绝不能是思考的“终点”。越过卡夫卡，米勒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在解构的废墟上，重建关于共同体的言说。这正是“复数共同体”出场的历史语境和理论使命。

三、复数共同体：解构主义是伦理转向，还是理论妥协？

复数共同体是米勒共同体思想中的“第三项”，也是其理论野心的最终体现。它试图整合前两种模式的合理成分，同时规避其极端后果：既吸收乡村共同体对“联结”的渴望，又接纳非功效共同体对“断裂”的强调。然而，这一整合是否成功，其理论根基是否稳固，值得深入剖析。

（一）复数共同体的理论来源：福柯、德里达与德勒兹的“杂糅”

复数共同体的理论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

在对福柯“机器（装置）”概念的借用上。米勒指出，复数共同体是由“话语、机制、建筑形式、法律”[4]41等异质要素构成的集合。这些要素之间缺乏系统性沟通，却仍能维持运作。这一描述与其说是在界定共同体，不如说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治理的常态——一个由权力、知识、技术和社会规范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然而，深究其逻辑，可以发现其理论建构存在明显的伦理风险。

首先，是权力装置对伦理价值的僭越。福柯对“装置”（dispositif）的定义本质上是权力的编织，旨在实现某种治理术的目标。当米勒将“黑奴贩卖制度”“互联网媒体”[4]42-43乃至纳粹的官僚化灭绝机器，都纳入其“复数共同体”的谱系时，他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描述性的伦理中立。如果一个基于暴力与剥削的系统仅仅因为其构成的异质性便被称为“共同体”，那么该词长期以来所承载的相互承认、情感纽带和伦理关怀，便被彻底稀释了。米勒关注的是机器如何运作（How it works），却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机器运作的压迫性本质。

其次，是“非同一性”对主体责任的消解。复数共同体继承了“非功效共同体”的部分特质，强调要素间的异质性与非关联性，这种“断裂式”的运作逻辑，必然导致责任主体的碎片化和责任的分散化。在米勒的视阈中，复数共同体并不依赖于成员的共同意志或情感纽带，当其置于“装置”的语境下时，是由一系列脱节的机制、法律与话语勉强拼凑而成。当“人”被简化为装置中的一个零件或一个环节时，个体的伦理判断力和道德敏感性便被系统性的程序和技术理性所替代。在这种逻辑下，奥斯维辛式的官僚屠杀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高效运作的“机器”，而身处其中的执行者仅需对程序负责，而非对生命负责。尽管米勒撰写《共同体的焚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言说“共通体（共同体）的分裂、错位或动荡的见证”[7]11-12，但当他试图缝合“乡村共同体”中的“同一性”与“非功效共同体”中的“异质性”时，无形中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恶”提供了一个解构性的注脚，使得道德的批判在异质性的洪流中变得苍白无力。

最后，是“文本主义”倾向对历史伤痛经验的遮蔽。尽管米勒声称复数共同体揭示了共同体内部的断裂、冲突和不可通约性，但在实际论证中，他往往倾向于将这种断裂性从社会历史领域，转移和转化为一种语言学或解构性的“文本游戏”。从实在到隐喻，米勒将极具压迫性的现实结构（如集中营、殖民机制）视为一种复杂的“修辞形式”，这种转化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被压迫者真实的肉身痛苦。他过于关注共同体如何通过异质性达成了“非功效”（unworking），却未能在解体之后重建一套具体的政治伦理。

米勒的“复数共同体”虽打破了传统共同体那种温情脉脉、实则排外的“同一性”神话，但其对福柯“装置”概念的激进借用，却使其理论滑向了形式主义的深渊。这种共同体既不需要相互的承认，也不需要共同的价值，它只是一台自顾自转动的、冰冷的权力机器。如果理论的深度是以牺牲对正义的坚守为代价，那么这种“复数性”最终可能沦为一种对权力现状的默认，而非一种真正的解放可能。

此外，米勒还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根茎”（rhizome）理论也纳入复数共同体的谱系。然而，德勒兹与加塔利从未以“共同体”作为其理论建构的目标，他们的“根茎”是对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树状思维（等级制、中心化、二元逻辑）的替代，是一种旨在描绘思想生成和联结方式的认识论模型，而非对社会组织形式的规范性构想。米勒在此进行了一次概念嫁接：他将“根茎”所具有的多元联结、异质生成、非中心化等认识论特征，悄悄转化为“复数共同体”这一社会组织模型的合法性依据。这一嫁接虽富有理论想象力，却也暴露了复数共同体理论根基的脆弱性：它试图用描述“如何思考”的概念，来回答“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

（二）复数共同体的理论功能：以“异质并存”回避“何以可能”

复数共同体的核心主张可概括为“异质并存”：多种共同体可以同时共存、交叉作用于同一主体，而无须彼此同化。在描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方面，这一主张无疑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任何现代社会个体都同时隶属于家庭、职业、兴趣、信仰等多种群体。然而，在规范性维度上却显得乏力。米勒在论证个体如何在复数共同体中保持自主性时，陷入了德里达式的“不愿归属”与现实“必然归属”的矛盾之中。

“异质并存”这一看似包容的口号，实际上掩盖了不同共同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残酷的权力博弈和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米勒用“彼此交叉、相互联系”[4]41轻描淡写地处理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仿佛它们只是度量衡的不同，可以找到一种中立的兑换率。但在现实的政治和伦理困境中，异

质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静止的、和平的“并存”，而是紧张的“吞噬”与“排斥”。复数共同体模式，恰恰精准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病理状态”——即个体被各种碎片化的、相互矛盾的机构和话语强行分割，却缺乏一种能够缝合这些碎片、并对其施加统一伦理约束的公共视野或主体性核心。米勒的“复数共同体”最终呈现为一种“修辞性的乌托邦”：他用解构主义的理论灵活性，成功地避开了乡村共同体的排他性暴力，却在现实的权力墙垣和伦理抉择面前，退守到了文学批评那看似安全、实则无力的审美领域。

复数共同体从未回答两个根本问题：

1.异质共同体之间如何共处？米勒承认复数共同体内部存在“本质性差异”，却仅以“可通约性”一笔带过。这种可通约性来自何处？是理性协商、权力强制，还是历史偶然？如果缺乏这种可通约性的来源和机制，那么“异质并存”就只能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事后承认，而非对未来可能性的一种规范性构想。

2.个体如何在复数共同体中保持自主性？米勒赞赏德里达“不归属于任何共同体”[8]的批判姿态，却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纯粹的解构姿态在经验世界中无法彻底实现。既然如此，个体是否必然被多重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质询所撕裂？复数共同体是否为这种撕裂提供了抵御机制？

“复数共同体”的“异质并存”，更像是一幅关于现代性复杂性的清晰X光片，它精准地照出了病灶，却没有开出任何药方。它是对“共同体何以可能”这一难题的回避，而非解答。

（三）米勒与德里达的隐性分歧：关于“归属”的本体论之争

米勒在论述复数共同体时多次援引德里达，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阵营。然而，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德里达本人对“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态度，远比米勒更为审慎，甚至充满疑虑。

德里达在《无条件的大学》等一系列晚期文本中，明确表达了“不愿归属”的立场。他不愿“归属”于任何既定的共同体——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语言的还是学科的——因为这不仅是保持个体“独异性”（singularity）的条件，也是与他人建立非占有、非从属伦理关系的前提。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所设想的，是“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9]60，一种不基于任何共同属性（如血缘、地缘、信念）的、纯粹的“生存的敞开状态”[9]30。这一立场，与米勒的“复数共同体”设想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米勒认为个体在经验上“必然”属于多重共同体，而德里达则认为“归属”本身，即“属于……”这个句式及其背后的逻辑，正是需要被解构、被质疑的对象。将“与他者共在”理解为一种“归属”，恰恰可能错失了与他者相遇的绝对陌异性。米勒将德里达的实际社会交往（讲学、参加会议、出版著作）解读为“归属”于学术共同体的经验证据，这无疑是一种基于经验层面的误读。德里达反对的是本体论层面的“归属逻辑”，即那种将“共在”建立在某种共同属性之上的形而上学冲动，而非拒绝与任何人发生社会联系。

这一被学界普遍忽视的分歧，深刻地揭示了“复数共同体”的核心困境：它试图在解构主义之后，以一种更为复杂、更包容的方式，重建“共同体”这个概念；然而，它却无法回应来自解构主义内部（以德里达为代表）对“归属”概念本身所进行的更为彻底的根本性质疑。如果“归属”本身就是需要被解构的暴力，那么任何关于“复数共同体”的言说，无论它如何强调异质性，都可能在悄悄地为这种暴力提供新的合法性外衣。米勒的复数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恰恰可能背叛了解构主义最激进的核心遗产。

四、结语：米勒文学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边界与遗产

通过对希利斯·米勒文学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性审视，本文认为，其所谓的三重模式并非线性的进化过程，而是一场在解构主义伦理转向中未能彻底完成的理论突围。

首先，米勒的“复数共同体”在本质上并非对“乡村共同体”的同一性逻辑与“非功效共同体”的断裂逻辑的真正超越，而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理论缝合。他借用福柯的“机器”与德勒兹的“根茎”为异质并存进行了合法性辩护，却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南希和德里达的“误读”，回避了共同体构成的本体论困境。

其次，复数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否定性的伦理姿态，而非建设性的规范模型。它揭示了当代社会个体被多重权力装置切割的真相，迫使我们承认任何试图重返“有机整体”的愿望都带有极

权主义的危险；然而，它也因过度沉溺于“异质性”的修辞而丧失了对共同体如何达成契约、如何处理内部冲突等现实政治问题的回应能力。这使得复数共同体更像是一种理论姿态，而非一种理论模型。

最后，米勒留给当代文学共同体研究的真正遗产在于他划定的理论边界。如果“复数共同体”无法在逻辑上回答“共同体何以可能”，那么文学的独特意义便在于其呈现了“不可能的共同”。文学的形式特征（叙事断裂、视角切换、语体杂糅）恰恰为那种无法被实体化的共同体提供了主要的可感形式。文学并非现实共同体的摹本，而是一个允许悖论存在、允许主体在断裂处相遇的修辞实验室。未来研究应以此为起点，探寻文学形式如何为那种无法实体化、却在伦理上不可或缺的“共在”提供感性显现。米勒的局限，恰恰为文学研究转向更具政治性与伦理深度的进路扫清了障碍。

参考文献：

[1] Miller J H. Literature as conduct: speech acts in Henry James[M].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2]王琦，南希.后理论时代的共同体构建：与斯特拉斯堡大学让-吕克·南希教授的学术对话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6)：150-156，208-209.

[3]米勒.小说中的共同体[M].陈广兴，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

[4]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M].陈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5]陈广兴.共同体何以可能?希利斯·米勒的沟通共同体思想研究[J].外语教学，2024，45(4)：100-106.

[6]刘江凯.大同之异：当代文学批评话语里的“共同体”[J].文艺争鸣，2022(11)：116-121.

[7]南希.解构的共通体[M].郭建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 Derrida J, Maurizio F. A taste for the secret[M].Donis G, Trans.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

[9]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上[M].夏可君，编.胡继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How Can We Speak of Community After Deconstructi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imits of Hillis Miller's Concept of "Plural Communities"

Yang Qi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Hillis Miller's concept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central themes of his later critical theory. Miller does not seek a "third way" between Nancy and Williams, but rather attempts to offer "plural communities" as a post-deconstructionist ethical response. However, this response does not truly resolve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ve rupture revealed by unworking communities; rather, under the guise of "coexistence of heterogeneity", it sidesteps the normative difficulties inherent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ommunity. Building upon a critical re-reading of Mill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lineate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his concept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and to offer a more problem-conscious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literary communities.

Keywords: Hillis Miller; literary community; plural communities; post-deconstructionist ethics

双路径视角下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HSM模型的实证分析

曾绚琦，汪曙华，吴湘湘

（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高质量的知识信息的需求持续增长，播客逐渐成为用户获取知识信息的新渠道。研究以启发式-系统式模型（HSM）为核心框架，结合信息生态理论，构建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影响机制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文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既受系统式路径的影响，也受启发式路径的影响；搜索容易度、信源可信度、知识期望、信息素养和内容质量均正向影响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其中信息素养的作用最为突出；平台氛围和表达质量未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中文播客平台可从降低信息素养门槛、健全信源认证机制、弥合知识期望落差、完善搜索功能体系等方面优化用户服务。

关键词：中文播客；信息获取行为；HSM模型；双路径；信息生态理论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10

一、引言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既诞生于社会生活之中，也依赖媒介的传递与扩散。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取高质量的知识信息，已成为当代人应对不确定性、保持竞争力的一项基本能力，人们需要频繁地搜寻、筛选、获取能满足自身需求的知识信息。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迅速发展的环境下，公众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但能够有效传递高质量、可持续、可深度吸收的知识信息的传播渠道并不多。

近年来，在以视觉影像为主的短视频快速发展的同时，以声音为载体的新兴传播形态，如播客、有声书等，也逐渐兴起并获得相当一部分用户青睐，成为互联网行业发展中新的关注点。其中，播客以声音为载体，重建了更适合分享信息、阐释知识和深度表达的传播场景。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2024年中文播客听众人数规模达到1.34亿，预计到2027年中文播客听众人数规模将达1.79亿。21~35岁的年轻群体是播客的核心受众，七成以上听众因为播客具有“专业性”“干货多”而订阅节目，他们收听播客主要是从中收获知识、引发思考[1]。如今，播客已成为传播知识信息的重要价值载体。JustPod发布的《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显示，有82.8%的用户持续使用播客的原因是为了开拓视野、打破信息差，81.1%的用户使用播客是为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2]。

知识与信息关系密切，知识是经过提炼加工

收稿日期：2026-06-12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闽台出版业融合发展研究”（FJ2023B104）

作者简介：曾绚琦（1979— ），女，广东汕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硕士，研究方向：新媒体；汪曙华（1973— ），男，安徽池州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知识服务；吴湘湘（2001— ），女，广东潮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

的信息，信息是承载和传递知识的载体。一般而言，用户通过媒介收集自身所需信息的行为被称为信息获取行为。有学者将信息获取行为界定为用户为了获取所需信息而采取的一系列搜寻行为[3-4]。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播客作为重要知识信息收集来源的背景下，深入探讨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信息接受与扩散的基本规律，也对优化信息传播生态、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信息获取行为是信息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Wilson（2000）指出，“信息行为”涉及主动信息搜索、无意或被动信息获取以及信息使用，信息获取行为是其中的一个维度[5]。就信息获取行为而言，既有研究大体遵循两条脉络展开：一是围绕特定领域（如健康、医疗、教育等）、特定群体（如女性、老年人、学生等）考察用户的信息搜寻、评价与采用行为。如Naleef等（2021）发现个体对健康信息获取的信心与信任度与其收入及教育水平呈正相关[6]。二是着眼于新媒体环境，研究网络社区、音视频平台等场景下的信息获取逻辑。如赵小曼（2022）研究了主流短视频平台用户的风险信息获取行为[7]。

2020年的新冠疫情意外引燃了播客这一声音媒介，此后播客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现有播客研究在功能价值、用户、内容生产、平台运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较多成果。其中，在功能价值层面，徐小涵等（2023）认为，在大数据和算法的信息环境中，受众易深陷“信息茧房”的围困，难以真正满足自身获取信息的内在需求；而播客的回归是当今时代对获取多元信息、深度知识的呼唤[8]。在用户层面，播客用户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用户的收听动机和播客使用的影响因素上。如刘晓梅（2023）探析了播客用户的使用偏好，指出播客长效深度的知识议题与社会话题是播客的独特优势，播客用户十分关注播客的内容质量及观点输出[9]。但播客用户研究的现有成果更多将用户置于听众、陪伴性收听者或社交参与者的位置，较少将其视为具有明确知识需求、媒介筛选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主动获取者，对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机制揭示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国中文播客用户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启发式-系统式模型（HSM）和信息生态理论展开实证研究，从而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影响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因素有哪些？第二，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强度和路径差异如何？第三，在HSM模型和信息生态理论框架下，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三、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一）启发式—系统式模型（HSM）

本研究借助Chaiken（1980）所提出的启发式—系统式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HSM）重新理解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过程。该模型认为，个体在处理信息时通常存在两种并行或可切换的认知路径：其一为启发式加工，主要依赖情景线索判断信息的重要性及其可信任程度，它侧重于运用表层提示快速得出结果，此类提示即“启发性线索”（Heuristic Cues）；其二为系统式加工，即对信息内容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审视与评价，据此形成对感知刺激的理性评判与选择，这被称为“系统性线索”（Systematic Cues）[10]。HSM模型曾被广泛应用于行为决策研究（见图1）。近年来，该模型逐步被应用于网络用户的信息行为研究。本研究也采用HSM模型构建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假设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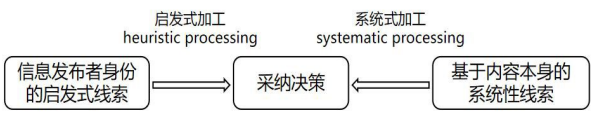


图1　启发式—系统式线索模型

（二）信息生态理论与双路径框架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率先将自然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息科学研究，开启了信息生态学的学术探索。有学者在信息生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信息生态因子”概念，将其视为构成信息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而信息生态理论则探究各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11]。学界关于信息生态因子的具体构成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王晰巍等（2016）提出，信息生态不仅包含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

还包括信息技术[12]。

对于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而言，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均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信息技术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采纳四元构成说，将信息生态因子界定为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本研究借鉴信息生态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中文播客用户及播客内容创作者界定为信息人维度，将用户在播客中获取的知识信息界定为信息维度，将播客平台的交互环境界定为信息环境维度，将信息获取所依赖的技术手段界定为信息技术维度。

本研究整合HSM模型与信息生态理论构建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其中，HSM模型作为宏观认知理论，为解释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提供总体逻辑，并提供认知加工路径（包括启发式路径与系统式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信息生态理论获取分析变量。信息生态因子只有进入用户的信息判断过程，才会转化为启发式或系统式线索。在初步接触阶段能帮助用户快速选择的因素，如信息人、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等，主要构成前端筛选条件，归入启发式路径。需要用户对内容进行细致评估的因素，如信息维度主要构成内容评估对象，则归入系统式路径。两条路径并非截然分离，搜索容易度也会影响系统式加工能否发生，长期稳定的内容质量也会沉淀为信源可信度，启发式线索与系统式线索应以用户加工深度作为划分依据。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1.*启发式线索相关假设*。已有研究表明，启发式加工中的线索一般由信息内容以外的其他因素构成，如信息形式特征、行为外部特征和信息发布者的个人信息等。Sundar（2008）阐述了信息技术作为启发式线索能够影响用户判断[13]；Metzger等（2010）提出信息发布平台即信息环境会被用作判断信息可信度的启发式线索[14]；Chaiken（1980）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信息人维度是典型的启发式线索[10]。需要强调的是，启发式路径并不等同于表层或非理性判断，而是指用户在有限认知资源下，借助前置条件、主体经验与外部线索完成初步筛选。

（1）信息技术对播客用户信息获取的影响。在播客用户的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技术主要指用户为获取信息所依赖的技术工具。胡媛、黄依琳（2017）强调，信息平台的易用程度会显著影响用户通过平台获取信息的意愿与行为[15]。技术接受模型中“搜索易用性”是“感知易用性”的具体化，搜索易用性主要指用户对信息平台操作难易程度的主观感知，是影响用户搜索意愿与行为的关键因素[16]。因此本研究将信息技术操作化为搜索容易度。理论上，用户搜索积极性与难度感知紧密相关：感知难度高时，积极性降低；感知难度低时，搜索行为更为主动。当然，搜索容易度并非只产生启发式作用，它也会影响用户是否进入完整收听和内容理解，但其首要功能在于降低初始搜索与筛选门槛。据此，本研究假设：

H1：搜索容易度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2）信息人对播客用户信息获取的影响。在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人被视为主体要素，对其他子系统发挥着影响，是重要的启发式线索[17]。本研究中的信息人主要指参与播客信息传播的内容创作者和用户。在内容创作者方面，用户对信息发布者可靠程度的主观感知，即信源可信度[18]，通常被视为重要的启发式线索[19]。相关研究表明，当信源的可信度越高时，用户更容易接受、信任该信源发出的信息，且可信度高的信源显著地影响人们的信息决策[20]。在播客场景中，信源可信度并不完全来自主播身份等外部标识，也可由长期内容质量、观点稳定性和专业表达持续积累而成，一旦这种积累沉淀为用户对主播或节目的总体信任，就会在后续选择中被快速调用。

在播客的用户方面，不少研究表明，知识期望和个人信息素养是影响个体信息获取的重要因素[21]。孙萍、牛天（2019）研究表明，知识期望正向影响用户对网络课堂的使用意愿和效果认知[22]。信息素养作为影响个体信息行为的关键变量，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个体信息获取行为的效率与质量。陈则谦（2013）从能力要素出发，揭示出信息素养在信息获取行为中的具体表征：知识需求编码能力、知识搜寻过程的控制能力以及知识搜寻结果的评价能力，三者均对个体的信息获取质量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3]。据此，本研究假设：

H2：信源可信度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H3：知识期望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H4：信息素养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3）信息环境对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在信息环境方面，高灵等（2014）研究显示，网络社区的“软环境”，即成员间社交互动所衍生的氛围特征，被研究证实为影响用户信息获取的关键因素。活跃的氛围能够激发用户的参与动机，进而正向促进其信息交流行为[24]。蒋知义等（2020）研究表明，平台氛围是信息环境的主要构成因素[25]，并对用户信息使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26]。平台氛围指用户对平台使用场景中环境基调与交互氛围的主观感知与综合体验。据此，本研究假设：

H5：平台氛围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2. 系统式线索相关假设。结合信息生态理论，信息维度在本研究中被归入系统式线索范畴。Petty 和 Cacioppo（1986）将“论据质量”（亦即信息质量）定义为影响中心/系统路径的核心变量[27]。曹瑞昌、吴建明（2002）指出信息质量可分为信息内容质量和信息表达质量[28]。结合播客属性，播客作品传递的信息质量不仅体现在内容质量上，还包括主讲人的表达质量。故在本研究中，将信息维度分为内容质量和表达质量两个变量。信息内容质量的评判维度通常包括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与完整性四个维度[29]。杜智涛（2017）指出，知识质量越高，用户获取知识的行为越容易被激发[30]。信息表达质量指的是信息在呈现与传递过程中，其表达方式所具有的可理解性、明确性、准确性、一致性与简洁性的程度。张星等（2015）研究发现，用户在网络社区讨论中获取的表达质量较高的健康信息，有助于其更好地理解所咨询的健康问题[31]。据此，本研究假设：

H6：内容质量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H7：表达质量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3. 研究模型构建。以 HSM 模型和信息生态理论为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模型从信息技术、信息环境、信息和信息人四个维度提取变量，各维度下设若干子变量，以信息获取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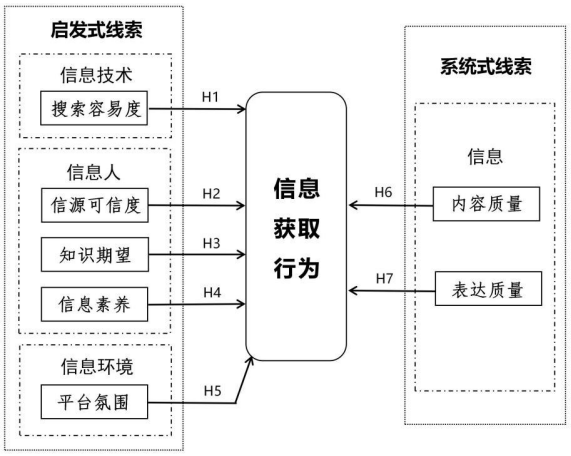


图2　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研究模型图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与问卷构成

本研究的假设主要涉及信息技术、信息环境、信息、信息人、信息获取行为五个维度，其中有搜索容易度、平台氛围、内容质量、表达质量、信源可信度、知识期望、信息素养、信息获取行为八个潜变量。测量变量的量表均参考以往研究中的量表，以李克特五级计分。结合播客的特点，本研究对具体题项的表述进行一定修正与改编，从而形成适合中文播客平台使用情境的测量题项。

其中，搜索容易度改编自 F.D.Davis（1989）的研究[32]，预设四个题项；平台氛围改编自 Lee（2005）的研究[33]，预设四个题项；内容质量改编自 Bhattacherjee 和 Sanford（2006）的研究[34]，预设四个题项；表达质量改编自 Riding 等（2006）的研究[35]，预设四个题项；知识期望改编自孙萍和牛天（2019）的研究[22]，预设五个题项；信息素养改编自 Tsai 等（2003）的研究[36]，预设四个题项；信源可信度改编自 Bhattacherjee 等（2006）的研究[34]，预设四个题项；信息获取行为改编自 Subramanian 和 Soh（2009）[37]、Zahra 和 George（2002）的研究[38]，预设五个题项。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用以说明研究目的与保密原则；第二部分为筛选题，用于确认被调查者是否收听过播客；第三部分为量表题项，用于测量用户使用播客时的真实感受；第四部分为人口统计学信息。为确保正式问卷题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研究于

2025年7月进行了小范围的预调研。预调研结束后，本研究运用SPSS 25.0软件对预调研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并结合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值（AVE）等指标对量表题项进行筛选。结果显示，信源可信度变量中的题项“播客上的信息来自可靠的个人或机构”、表达质量变量中的题项“播客主的讲述风格是我喜欢的”、平台氛围变量中的题项“播客的信息更新频率很高”，以及信息获取行为变量中的题项“我通常会使用播客来查找信息”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低于0.7，未达到较理想的题项保留标准。基于此，本文在正式问卷中删除上述四个题项[39]。删除相关题项后，再次对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7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水平较高。同时，效度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对应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高于0.7，量表具备良好的结构效度，整体问卷设计合理。正式量表的所有题项均围绕中文播客的搜索、收听、评价与知识获取过程进行语境化改写，未简单移植既有研究量表。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代表性

本研究于2025年9月9日正式启动问卷调查工作。借助“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发放，主要通过播客平台社群、播客节目微信社群、豆瓣播客小组、小红书播客社群及微博播客超话等多个线上渠道邀请用户填写问卷。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采用了目的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非概率抽样策略，样本边界限定为具有实际中文播客收听经验的用户。在邀请播客用户填写问卷的同时，也鼓励其邀请身边符合条件的朋友参与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工作历时40天。问卷回收后，依据以下标准进行有效性筛选：（1）筛选题项选择“否”者，视为无效问卷。（2）作答时间不足60秒者，予以剔除。（3）所有题目答案一致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4）年龄与职业信息明显不符合逻辑者，如年龄不足18岁、职业填写为企事业单位员工，明显不合乎常规逻辑，亦予以剔除。基于上述标准，剔除无效问卷82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608份，有效回收率为88.12%，满足回收的有效样本数量超过量表题项总数的十倍的要求[40]，适宜开展后续统计分析。

为检验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将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播客行业报告的用户画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本研究样本的特征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小宇宙App联合发布的《“对话的力量”——中文播客的公共价值报告》[41]的播客用户画像较为接近，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1）。

（三）信效度分析

在题项处理上，本研究先通过预调研检验语义清晰度和场景适配度，再结合校正项总计相关性系数（CITC）、标准化因子载荷、AVE和CR判断题项质量，保留能够覆盖各潜变量核心内涵的题项进入正式模型。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25.0与AMOS29.0软件完成统计分析。信度分析主要采用Cronbach's α系数、CITC和CR进行检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量表整体Cronbach's α值为0.927，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7，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各测量题项的CITC均大于0.5，说明题项与量表之间有较好的关联性。各个潜变量的CR基本都大于0.8，远高于临界值0.6，说明量表的组合信度也较为理想。

本研究的效度分析通过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检验。聚合效度分析的结果显示，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7，AVE均在临界值0.5以上，说明量表在各维度上表现出良好的聚合效度。各个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AVE的平分根，各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良好（见表2和表3）。

表1 样本用户画像数据的横向比较

变量	播客行业报告数据	本研究收集的问卷数据
男女比例	0.68:1	0.76:1
25~35岁的核心用户群/%	45.17	53.2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用户占比/%	58	63.7
学生占比/%	29	21.4

表2　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量化测量指标

潜变量	测量指标	标准化因子载荷	CITC	Cronbach's α系数	AVE	CR
搜索容易度（PEU）	1	0.770	0.625	0.789	0.549	0.829
	2	0.779	0.580			
	3	0.711	0.597			
	4	0.701	0.584			
信源可信度（CRE）	1	0.748	0.559	0.783	0.561	0.793
	2	0.747	0.604			
	3	0.752	0.605			
知识期望（KE）	1	0.732	0.602	0.834	0.559	0.863
	2	0.743	0.638			
	3	0.770	0.655			
	4	0.727	0.605			
	5	0.765	0.673			
信息素养（IL）	1	0.719	0.598	0.800	0.545	0.827
	2	0.724	0.587			
	3	0.754	0.640			
	4	0.756	0.606			
平台氛围（PA）	1	0.769	0.565	0.765	0.571	0.799
	2	0.751	0.574			
	3	0.746	0.555			
内容质量（CQ）	1	0.758	0.580	0.776	0.542	0.826
	2	0.751	0.588			
	3	0.714	0.570			
	4	0.723	0.589			
表达质量（EQ）	1	0.777	0.616	0.793	0.584	0.808
	2	0.720	0.569			
	3	0.794	0.618			
信息获取行为（IAB）	1	0.751	0.603	0.852	0.601	0.858
	2	0.777	0.657			
	3	0.768	0.687			
	4	0.806	0.671			

注：表中测量指标为正式量表保留题项编号。

（四）共同方法偏差与共线性检验

本研究使用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验证量表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样本的KMO值为0.901，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达到显著水平（P<0.001），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接着采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分析，总体提取8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为63.871%，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5.533%，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各变量间的关联程度。分析显示，所有变量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在0.292至0.433之间。由于各相关系数均远低于0.70的临界值，可初步判定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这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依据。

表3 区分效度检验

	PEU	CRE	KE	IL	PA	CQ	EQ	IAB
PEU	**0.748**							
CRE	0.478	**0.740**						
KE	0.354	0.348	**0.747**					
IL	0.358	0.493	0.409	**0.738**				
PA	0.333	0.397	0.351	0.371	**0.755**			
CQ	0.345	0.444	0.411	0.455	0.426	**0.736**		
EQ	0.388	0.459	0.449	0.449	0.443	0.515	**0.764**	
IAB	0.398	0.442	0.370	0.463	0.310	0.433	0.401	**0.775**

注：表中斜对角线的数值为AVE平方根值，已加粗显示。

五、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为评估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本研究运用AMOS 29.0软件进行分析。在绝对适配度指数方面，卡方自由度比（X^2/df）值为1.496，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值为0.029，残差均方根（RMR）值为0.037，拟合优度指数（GFI）值为0.944；在增值适配度指数方面，规范拟合指数（NFI）、增量拟合指数（IFI）、塔克-刘易斯指数（TLI）、比较拟合指数（CFI）等指标也均达到适配标准。综合来看，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见表4）。

（二）结构方程的路径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用于探究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是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相较于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能准确检验模型中多变量间的路径关系，并最大限度控制测量误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法对模型进行验证。路径分析结果表明，除平台氛围和表达质量的研究假设未通过验证外，其余假设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删除两条不成立的路径“PA→IAB”“EQ→IAB”后，修正后获得的模型数据见表5。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主要检验各变量对信息获取行为的直接效应，未考察相关间接路径。平台氛围和表达质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仅表明其直接效应不成立，不能据此否定其潜在

表4 测量模型拟合指标

适配指标	X^2/df	RMSEA	RMR	GFI	NFI	IFI	TLI	CFI
标准	<3	<0.08	<0.05	>0.9	>0.9	>0.9	>0.9	>0.9
实测值	1.496	0.029	0.037	0.944	0.917	0.971	0.966	0.970
适配判断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5 修正后的模型数据检验结果

假设	研究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H1	PEU→IAB	0.234	0.089	2.631	**
H2	CRE→IAB	0.224	0.082	2.753	**
H3	KE→IAB	0.156	0.068	2.268	*
H4	IL→IAB	0.310	0.084	3.695	***
H6	CQ→IAB	0.222	0.093	2.38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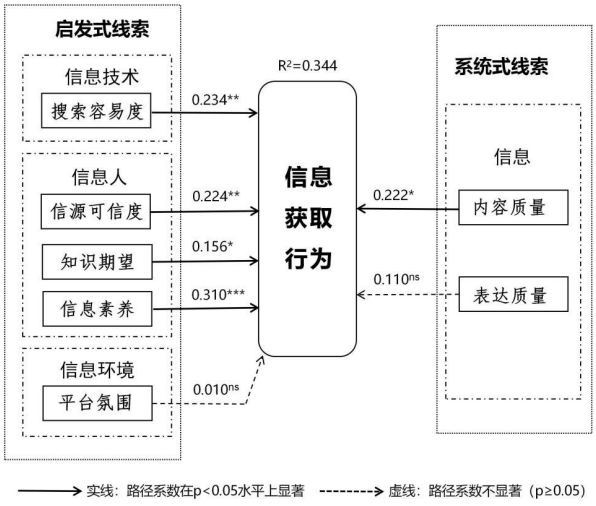
注：SE为标准误；*P<0.05，**P<0.01，***P<0.001。

间接作用。

（三）假设检验结果

综合路径分析结果，本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基于上述假设检验结果，对原研究模型中的变量关系进行了修正，最终形成我国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路径系数图（见图3）。



注：*P<0.05，**P<0.01，***P<0.001；ns表示不显著。

图3　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六、结论与实践启示

（一）研究结论

1.启发式路径：信息人、搜索容易度与快速筛选机制。作为信息生态系统的主体，信息人对其他子系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发现，信息人维度下的三个变量：信息素养、信源可信度与知识期望，均对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信息人作为启发式线索的主体性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其在HSM模型启发式路径中的具体表现：用户并非被动接收信息，而是凭借自身的信息素养、对信源的信任判断以及对知识内容的期望来主动筛选和获取播客信息。

信息素养是影响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首要因素。在播客场景中，信息素养高的用户更能精准筛选高质量节目，能够判断观点真伪，并有能力主动整合多方信息、建构知识体系。当播客用户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时，其对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信心也随之提高，从而增强信息获取行为。信息素养高的用户能在播客平台中精准定位与自己需求匹配的节目，快速评估播客节目的质量，从而满足自身知识需求。

信源可信度作为典型的启发式线索，对中文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认知资源有限，难以对所有信息内容进行精细加工。信源可信度由长期的内容质量信任评价沉淀而来，从而在后续选择中转化为启发式判断。可信度高的信源作为一个启发式线索，能有效帮助用户快速判断信息的潜在价值与风险。知识期望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即用户对播客知识价值的预期越强，其主动通过播客获取信息的可能性越高。

作为启发式线索的搜索容易度对播客用户的

表6　假设检验结果

编号	研究假设	结果
H1	搜索容易度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成立
H2	信源可信度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成立
H3	知识期望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成立
H4	信息素养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成立
H5	平台氛围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不成立
H6	内容质量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成立
H7	表达质量正向影响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	不成立

信息获取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使用播客过程中，用户往往抱有明确的知识获取目的，因此尤为看重播客平台的搜索功能。搜索容易度作为衡量播客平台搜索功能的关键指标，直接体现着播客平台在功能设计上是否真正符合用户需求。启发式路径的核心功能在于帮助用户降低信息筛选成本，使用户在尚未进行深度内容加工前，能够先通过平台技术、主体判断与信源线索完成快速选择。因此，搜索功能既是快速筛选线索，也是深度加工得以发生的入口条件。

2. 系统式路径：内容质量与精细加工机制。内容质量作为系统式线索，对中文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发现验证了HSM模型中启发式路径与系统式路径在用户信息处理过程中是同时存在的。内容质量主要体现为价值性、说服力和信息量等特点。在播客语境下，听众并不只是因播客形式新颖而收听节目，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收听判断节目内容是否具有知识价值和实际帮助。

系统式加工意味着用户会对内容质量这一核心线索进行精细判断。与短视频中快速滑动、即时反馈不同，播客通常具有较长的收听时长和更强的陪伴性，用户在完整收听节目、反复回听关键段落、对观点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过程中，对节目的内容质量与价值形成判断。启发式线索降低了用户利用播客获取知识的门槛，而系统式加工则让用户对内容质量形成较稳定的评价。

3. 双路径协同机制。启发式路径与系统式路径在用户信息获取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既包含前端快速筛选，也包含后端深度加工，两条路径并非相互排斥，二者形成互补互馈的认知加工机制。启发式路径承担快速筛选的功能，帮助用户在信息过载环境中降低选择成本；系统式路径则承担深度判断功能，帮助用户在收听过程中形成稳定的内容质量评价。当用户发现某一播客的内容质量持续稳定时，其对主播的信任感会随之增强，该信源在未来信息获取中将被优先调用，形成从系统式反馈到启发式强化的正向循环。双理论整合的关键并非把生态因子静态分配到两类线索中，而是揭示生态因子如何在不同阶段转化为用户的信息加工依据。

4. 平台氛围、表达质量影响不显著。平台氛围对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并没有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相比于抖音、小红书等强互动平台，收听播客作为高度个人化的用户体验，更多体现为用户与播客主之间的交互，评论区的氛围并不影响核心收听行为。另一方面，用户利用播客获取信息时更关注节目内容本身和主播信源特征，而非平台社区氛围。

从HSM模型看，平台氛围属于情境性启发式线索，它更可能作用于前端的节目发现、口碑推荐和社群认同等，而不一定直接转化为信息获取行为。中文播客用户进入具体节目后的信息加工更依赖主播信源与内容质量，因而平台氛围的直接效应被削弱了。

表达质量对信息获取行为同样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多数情况下表达质量并非用户选择收听某播客的主要原因，而更像是“加分点”。播客主优质的音色和生动的讲述方式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用户愉悦感，但并不能直接促进其信息获取行为。最终决定用户选择播客来获取信息的主要因素仍是内容质量，用户更关心“说什么”而非“怎么说”。

表达质量不显著并不意味着表达无关紧要。对于播客而言，高质量表达是内容理解的重要条件，但在以知识获取为目标的场景中，内容质量更直接进入系统式加工路径，表达质量可能通过情感陪伴、收听愉悦感和持续收听意愿等因素，间接影响信息获取。

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直接效应模型中，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首先受内容质量、信息素养、信源可信度等变量驱动，而平台氛围与表达质量的作用则可能体现为间接效应或情境边界效应。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检验了相关用户感知变量的直接影响，由数据支持的直接实践启示是：围绕信息素养、搜索容易度、信源可信度、知识期望和内容质量五条显著路径，平台应降低用户检索、识别和评估播客信息的门槛，优化关键词搜索、分类标签、节目简介和内容深度分层提示等，提升用户对内容价值、知识深度和信源可靠性的判断效率。基于此，可对平台治理和功能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1. 优化新手引导与知识标签。播客的知识获取需要用户具备较高的信息识别、检索、评估

与利用能力。平台可建立分层式新手引导机制，通过关键词搜索、时间轴跳转、节目订阅等核心功能演示，帮助用户快速了解平台使用方法。同时，平台可借助知识标签建立标签化的内容知识体系，使用户在点击收听前对节目形成基本预期。

2. 建立信源认证机制，增强平台可信度。信源可信度作为启发式线索，帮助用户在信息过载时代快速判断内容价值。然而，当前播客平台普遍存在信源识别困难和权威认证不足的问题，制约了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作为提升信源可信度的治理性延伸措施，平台应建立创作者认证体系，在主播个人主页显著位置增设信源资质展示、专业身份标识、认证状态可视化标识等，并要求涉及医疗健康、财经投资、法律咨询等高专业性领域的内容创作者提交相关资质证明。

3. 弥合知识期望落差，完善内容供给机制。知识期望反映了播客用户希望通过播客获取有用知识的心理预期。平台可建立差异化内容供给体系，在对播客节目进行知识属性甄别后，将具备知识属性的节目划分为轻量知识与深度内容两个层级，分别适配碎片化收听场景与深度学习场景。平台还可联动主流媒体和权威出版机构的播客资源，搭建高质量知识内容矩阵，引导创作者优化内容生产。

4. 完善搜索功能体系，提升知识获取效率。搜索容易度是影响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当前中文播客平台的搜索功能仍存在一定缺陷。平台应突破以关键词精确匹配为主的搜索逻辑，引入模糊搜索与高级搜索功能，升级语义理解能力，使用户能够以日常语言句式进行查询，完善分类检索、标签导航等搜索功能。同时，基于AI等技术的发展应用趋势，本研究进一步建议平台优化AI搜索工具，提升语音识别功能，在搜索结果中提供关键段落的文字转写及对应节目的时间轴跳转功能，以帮助用户快速定位感兴趣内容。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将HSM模型与信息生态理论结合，较好解释了中文播客用户信息获取行为的双路径机制。HSM模型揭示了用户在信息获取中的认知加工差异，信息生态理论则帮助识别平台、主体、内容与环境等具体影响因子。二者结合能够同时解释“用户为何选择某一播客”和“用户为何持续通过某一播客获取知识”两个问题，从而为播客传播研究提供较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样本虽覆盖不同地区和人群，但主要通过线上平台发放，可能存在一定样本偏向，样本代表性主要体现为对中文播客活跃用户的覆盖，而非对全部潜在音频用户的概率代表。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对用户实际收听过程中的情境差异、平台功能使用细节以及信息内容理解过程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最后，随着视频播客、AI搜索和平台推荐机制的发展，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可能出现新的变化。未来研究可结合访谈、实验、平台行为数据等方法，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播客用户的信息获取路径，并考察算法推荐、AI摘要、语音转写等技术变量对播客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

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检验搜索容易度对系统式加工的促进作用，以及内容质量对信源可信度的累积效应，从而更细致地刻画双路径之间的转换机制。后续研究还可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或竞争模型，将持续收听意愿、主播信任、情感陪伴等变量纳入模型，以检验平台氛围与表达质量是否通过间接路径影响信息获取行为，并比较直接效应模型与扩展模型的解释力差异。此外，本文所提的信源认证、AI搜索、语音识别等建议主要基于显著变量的实践转化和平台发展趋势，并非均由现有模型直接检验，未来研究可将认证机制、智能搜索功能等纳入模型，进一步检验其效应与作用。

参考文献：

[1]艾瑞咨询.2025年中国长音频市场竞争格局分析报告[EB/OL].(2025-09-30)[2026-03-26]. https://finance. sina. cn/2025-09-30/detail-infsfrrt2523252.d.html.

[2]JustPod.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EB/OL].(2024-10-15)[2025-11-26]. https://justpodmedia. com/document/JustPod-Podcast-Report-2024.pdf.

[3]巢乃鹏.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2001年研究进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3)：84-88.

[4]黄慕萱.情境模式在解释资讯寻求行为之适用性探讨[J].图书馆学刊(台大)，1994(9)：49-70.

[5]Wilson T D.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 Emerging Trans-

disciplinary[J].Ininform Science,2000(3):49-56.
[6]Naleef F,Pallavi J,Swoboda C M.Socio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trust over time: evidence froma cross-sectional,pooled analyses of HINTS data[J].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AJHP,2021,35(8):1084-1094.
[7]赵小曼.媒体功能视角下主流短视频平台用户风险信息获取与处理的实证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5):134-141.
[8]徐小涵,赵鑫.播客的文化传播研究:以"小宇宙"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23,44(14):64-67.
[9]刘晓梅.播客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23.
[10]Chaiken S. Heuristic versus syste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use of source versus message cues in persuas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0,39(5):752-766.
[11]王晰巍,杨梦晴,王楠阿雪,等.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社群情境信息共享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群落视角[J].情报学报,2017,36(10):1050-1057.
[12]王晰巍,杨梦晴,王楠阿雪,等.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信息生态链演化机理与优化策略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6(4):6-12.
[13]Sundar S S. The MAIN model: a heurist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effects on credibility[M]//Metzger M J, Flanagin A J. Digital media, youth, and credibil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8:73-100.
[14]Metzger M J,Flanagin A J,Medders R B.Social and heuristic approaches to credibility evaluation onlin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60(3):413-439.
[15]胡媛,黄依琳.网络用户社会化信息搜寻能力实证研究[J].现代情报,2017,37(3):73-78.
[16]Koufaris M. Apply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flow theory to online consumer behavior[J]. Information system sresearch,2002,13(2):205-223.
[17]葛幸幸,刘慧.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潜水向分享行为转变的动机机理分析[J].信息与管理研究,2021,6(增刊2):60-68.
[18]王秀丽,赵雯雯,袁天添.社会化媒体效果测量与评估指标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7,39(4):6-24.
[19]张新,马良,王高山.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微信用户浏览行为研究[J].情报科学,2017,35(12):136-141.
[20]Wixom B H ,Todd P A.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f user satisfaction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05,16(1):85-102.
[21]刘虹,李煜.学术社交网络用户使用动机与功能采纳的特征构成及关联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20(6):78-87.
[22]孙萍,牛天.知识获取V.S.娱乐享受:基于UTAUT拓展模型的网络课堂使用探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5):77-95.
[23]陈则谦.基于互联网的知识获取行为动力模型及实证分析[J].情报杂志,2013,32(4):149-154.
[24]高灵,胡昌平.网络知识社区服务中的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分析[J].现代情报,2014,34(1):14-17.
[25]蒋知义,曹丹,谢伟亚.信息生态视角下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信息共享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0(21):32-44.
[26]孟玺,王玥,杨伟强,等.生成式AI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影响因素与生成路径: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5,21(8):23-34.
[27]Petty R E, Cacioppo J T.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e[M]. New York: Springer,1986:123-205.
[28]曹瑞昌,吴建明.信息质量及其评价指标体系[J].情报探索,2002(4):6-9.
[29]李晶,漆贤军,陈明红.信息质量感知对信息获取与信息采纳的影响研究[J].情报科学,2015,33(3):123-129.
[30]杜智涛.网络知识社区中用户"知识化"行为影响因素:基于知识贡献与知识获取两个视角[J].图书情报知识,2017(2):105-119.
[31]张星,夏火松,陈星,等.在线健康社区中信息可信性的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5,59(22):88-96.
[32]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MIS quarterly,1989,13(3):319-340.
[33]Lee T.The impact of perceptions of interactivity on customer trust and transaction intentions in mobile commerce[J].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2005,6(3):165-180.
[34]Bhattacherjee A, Sanford C. Influence processe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J]. MIS Quarterly,2006,30(4):805-825.
[35]Riding D,Lonsdal D,Brown B.The effects of average fundamental frequency and variance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on male vocal attractiveness to women[J].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2006,30(2):55-61.
[36]Tsai M J,Tsai C. Information searching strategies in web-based science learning:the role of interest self-efficacy[J].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2003,40(1):43-50.
[37]Subramanian A,Soh P.Contributing knowledge to knowledge repositories:dual role of inducement and opportunity factors[J].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2009(22):45-66.
[38]Zahra S A,George G.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and extens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185-203.
[39]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M]. 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Prentice Hall,2010:617.
[40]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实务进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8.
[41]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小宇宙App."对话的力量":中文播客的公共价值报告[EB/OL].(2025-11-10)[2026-06-11].https://cics.fudan.edu.cn/87/89/c40232a755593/page.htm.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Among Chinese Podcast Users from a Dual-Path Perspec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Zeng Xuanqi, Wang Shuhua, Wu Xiangxi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nd podcas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channel for user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e study adopts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HSM) as its core framework and integrates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to construct a mechanism model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podcast user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re tes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podcast user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both the systematic route and the heuristic route. Search ease, source credibility, knowledge expectation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ontent quality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user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among which information literacy plays the most prominent role. By contrast, platform atmosphere and expression quality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Chinese podcast platforms can optimize user services by lower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barriers, improving sourc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s, narrowing the gap in knowledge expectations, and enhancing search function systems.

Keywords: Chinese podcast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dual path;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

(上接第40页)

and Taoism, and thus formed an ideological realm of moderation through integrating diverse doctrines. In literary creation, his poems inherit the elegant and subtle aesthetic style of late Tang poetry, and possess the integrated features of simplicity, elegance, purity and magnificence. His prose follows the parallel prose fashion of gorgeous diction prevailing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yet avoids excessive embellishment and superficial floridity. Both his poems and essays achieve a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 literary form and intrinsic substance, embodying a unique aesthetic conception of moderat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 cultural envoy bridging Tang China and Silla, he maintained a modest yet confident cultural stance. He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Tang culture into Silla, and further conducted localized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ounding the voice of moderation for inter-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three perspectives embodied in Cui Zhiyuan's pursuit of moderation serve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ancient East Asian scholars' practice of the harmony doctrine. As a shared cultural memory of East Asia, the harmony doctrine acts as an essential spiritual foundation to facilitate contemporary dialogu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Keywords: Cui Zhiyuan; harmony doctrine; realm of moderation; aesthetics of moderation; voice of moderation; inter-civiliz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宋宗佩，白 亮

（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体育）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是社会性别文化的重要缩影，深刻影响着女性体育发展、公众性别认知与社会价值认同。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有职业形象、角色形象，正面形象、负面形象等类型，具有符号化、商业化、他者化等多元特征。体育媒体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生成，除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媒介管理制度的内在规定性、传播媒介的外在变化性、新闻类型的注意偏向性等因素制约，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

关键词：体育媒体；女性形象；形象塑造；性别传播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11

体育媒体是指专门报道体育活动的新闻媒体，它不仅是体育赛事转播、体育文化普及的载体，更是传播体育价值观的重要场域。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战略推进、女性参与体育提升以及新媒体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引起大众及学者的关注。通过梳理当前相关学术研究动态发现，国内外学者多运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针对某一特定媒体、某一特定时间段，呈现体育媒体传播中女性形象的塑造现状，揭示出有关女性体育报道数量少、报道质量有偏差等共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以助力体育媒体的性别主流化发展[1-2]。但体育媒体传播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其自身独特的类型和特征，其生成受特定因素的制约，对社会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这些体育媒体传播中有关女性形象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未见学者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对体育媒体传播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内涵进行系统阐释，以期引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一、体育媒体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类型

按照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参与程度，分为职业形象和角色形象；按照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精神状态呈现，分为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

（一）职业形象和角色形象

1. 职业形象。职业形象指女性在体育领域以专业身份出现时，体育媒体中所呈现的形象，侧重于呈现女性的岗位职责和专业能力。依据职业是否从属于体育领域，可以将体育中有关女性的职业形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女性体育本体职业形象，指女性从事以体育为核心内容的领域，直接参与训练、竞赛、科研等核心活动；另一类是女性体育衍生职业形象，指女性从事服务于体育行业的周边领域，这类从业者未必具备高水平运动能力、教学能力、执裁能力等，但需要具备岗位所需的管理、运营与传播等专业

收稿日期：2026-05-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女性体育的媒介建构及价值研究”（23YJC89003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一般项目“当代中国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24HQZZ048YB）

作者简介：宋宗佩（1983— ），女，河南许昌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白 亮（1981— ），男，河南驻马店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能力（见表1）。

2. 角色形象。角色形象直接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较低，按照与职业运动人士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可以将体育中有关女性的角色形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职业运动人士的亲密关联度较低的角色形象；另一类是与职业运动人士的亲密关联度较高的角色形象。（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同一女性在体育媒体中呈现的形象，可能因为叙事焦点的转换，兼具职业形象和角色形象。比如，一名职业女运动员，体育媒体在报道中既可能突出其“前奥运冠军”的职业成就，也可能强调其作为某职业男运动员“绯闻女友”的情感关系。职业形象和角色形象的最大区分在于，前者以职业身份作为判断依据，后者则以关系身份作为判断依据。

（二）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

1. 正面形象。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正面形象，聚焦女性的竞技价值与精神内核，集中呈现体育领域女性形象的真善美，可分为三类。其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的体育竞技者形象。如《人民日报》1981年起就对中国女排进行持续性报道，其塑造的女排形象不仅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更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放弃”为核心内涵，体现了激励几代人的中华体育精神[3]。其二，独立自信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体育媒体持续关注女运动员的个性表达和自我认同，展现新时代女性的自信和力量。如新华社专访谷爱凌时用《敢于上场，比纪录更重要》为题，呈现了她“展现最好的自己”的宣言，将自信定义为“练出来、摔出来”的清醒，展现了不唯奖牌论、自我定义成功的新时代女性形象[4]。其三，多元跨界的体育从业者形象。体育媒体持续关注女运动员退役后在体育管理、商业、教育等领域的多元发展。如体育媒体对邓亚萍近30年的多次转型进行了持续的报道，从国际奥委会官员、剑桥博士，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及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再到体育产业投资人、青少年体育推广者等，展现了女性体育从业者不断突破身份边界、开拓多元价值的当代图景[5]。

2. 负面形象。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负面形象，是指在公众或他人心中形成的具有消极、不良特征的印象或形象。负面形象往往对个人、组织、社会、国家等各利益方造成损害或伤害。比如，女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仅对自身身体造成严重伤害，还对体育比赛的公平机制提出挑战，甚至损害国家形象；女运动员年龄造假、成绩造假等问题，直接损害了其他参赛选手的利益；女教练员野蛮、专制、非科学的训练，伤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女体育官员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负面丑闻，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利益，有损国家机构的威信；女球迷的过激反应、行为失当等问题，影响了比赛的正常进行等[6]。

二、体育媒体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特征

波伏瓦认为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7]8，杰梅因·格利尔也提出女人的意义是靠她身边的男人所赋予的[8]。体育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受传统两性二元对立文化的影响，呈现

表1　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职业形象

分　类	典型示例
体育本体职业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科研人员等
体育衍生职业	体育官员、体育企业家、体育记者、体育节目主播等

表2　体育媒体传播中的女性角色形象

分　类	典型示例
亲密关联度较低	粉丝、球迷、拉拉队队员、体育社群发起人、体育公益资助人等
亲密关联度较高	妻子、女友、母亲、姐妹等

出多元化的特征。

（一）女性形象的符号化

女性形象的符号化，主要是指体育媒体运用视觉、文字、影像、叙事等符号，将女运动员简化为固定、可复制、带有性别预设的符号编码。作为女性形象的意义化符号，大量充斥在体育媒体中，构建起人们对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角色定位，强化或改善了社会中原有的性别逻辑[9]。符号化的传播具有片面化、简单化倾向——突出女性形象的身体化、标签化、弱化等符号，而遗漏或故意忽视更多的其他信息。比如，美国体育媒体对于女运动员的报道突出其身体、着装、发型等，而对于男运动员的报道则主要强调其运动能力[10]；西班牙体育媒体将女性呈现得更被动和情绪化，而将男性塑造得更主动和理性化[11]。体育媒体的报道中，女性主要以男运动员的女友、妻子，以及漂亮性感的女主播、拉拉队队员等形象出现，如2025年6月5日搜狐体育首页的报道，多集中于“鲁加尼妻子社媒晒照 大秀性感好身材”“英媒盘点欧冠决赛 太太团成员有才有颜气质好”“胡梅尔斯女友分享近照 身着白裙翩若惊鸿”等新闻[12]。这些展示并非偶然，而是权力结构的表达。符号作为支配阶级的权力表达工具，其传播过程不仅由支配者主导，也通过被支配者的主动合谋得以维系。受支配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被支配者甘愿做支配者的同谋，共同维护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其最终后果将是，女性通过外塑和内塑相结合的方式，达成了社会的性别期待，最终无意识地参与并强化了原有的性别不平等。

（二）女性形象的商业化

女性形象的商业化，指体育媒体充当“加工厂”的角色，将现实社会中广泛、真实的女性形象当作“原材料”，通过媒体从业人员的无差别劳动，对女性形象进行加工、改造，并成批量“生产”，最终将女性形象塑造为待出售、形形色色的媒介“产品”。当商业逻辑过度支配体育媒体的内容生产时，女性的身材和外貌常被转化为具有视觉吸引力的商业资源。这是因为身材和外貌好的女性体育参与者，更容易获得媒体报道资源和商业代言机会，媒体对其形象塑造也多呈美化倾向，突出其服饰、表情、姿态等外在形象，而忽略其职业精神、专业能力等内在价值。体育媒体的这种报道方式隐含了一个前提性假设，即媒体假设受众更关注女运动员的外貌而非竞技表现。然而，受众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与这一假设并不一致。有研究显示，受众对女性形象的积极认识，从强到弱依次为仅强调竞技能力的形象、突出竞技能力和性化特征的形象以及仅展示性化特征的形象[13]。这说明，经过商业包装，以性化形态呈现的优美化女性形象，受众对其的认可度反而较低，媒体端与受众端之间存在深层断裂。

（三）女性形象的他者化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相对于主体性的男人来说，女人是他者[7]9。“他者”理论中，男性是主体、主要、自我的，女性则是他者、次要、依附的。在体育媒体的传播场域里，男子竞技、男运动员是天然、标准的参照主体，女子竞技、女运动员、女性体育从业者则被塑造为被审视、非标准的补充者，这一媒介建构过程即为他者化。女人作为他者角色的呈现，话语权被损害或丧失，处于沉默、缺席和边缘的状态。有学者研究证实，在体育新闻中，女性形象存在着明显的“他者化”特征。比如，在西班牙受关注度最高的四家体育媒体，连续五个月在推特上发布的6 544条推文中，男运动员相关内容占96.19%，女运动员相关内容仅占3.81%[14]。且相对于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多刻画女性非竞争性的一面，如展现其外貌、着装、家庭和社会关系，呈现其心理弱势、技术缺陷和赛场失利等内容，以达到将其他者化、弱势化以及边缘化等目的[15]。

三、体育媒体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生成因素

体育媒体中女性形象的生成主要受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影响。从宏观方面看，世界各国文化大多深受父权制的影响，普遍表现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性别等级观念。虽然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女性地位不断提升，性别平等不断推进，但父权制的根基并未根本动摇。此外，体育作为具身化的实践，男性在力量、速度、耐力等方面具备先天优势，女性则相对劣势。文化中的性别观念以及体育中的性别秩序，为体育媒体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宏观基础。而从微观方面看，即从体育媒体自身出发，管理制度、传播媒介、新闻类型等，是影响女性形象生成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

（一）媒介管理制度的内在规定性

媒介管理制度主要指国家对传播主体的控

制，即媒介的所有权归属。有学者将媒介管理制度分为公营、私营、国营、混合四种类型[16]。其中以苏联为代表的国营体制，随着冷战的结束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关注其他三种类型。

公营体制以英国媒体为代表，媒介为公共财产，旨在服务公众利益，强调传播内容的客观、公正与有益，表现出相对尊重女性的倾向。私营体制以美国媒体为代表，媒介为私人所有，追逐利润是首要目标，体育媒体受其影响，传播女性形象易出现身体化、符号化、商业化等倾向。混合型体制以中国为代表，媒介为国家所有，同时面向市场运营；该体制兼顾国家利益与商业利润，传播内容易多样化，女性形象可能出现正负面并存的现象。媒介管理制度因受公众、市场、政府等因素影响具有稳定性。相应来看，体育媒体在呈现女性形象时，具有内在规定性，即不同媒介制度下的女性形象有其自身的相似性和统一性。

（二）传播媒介的外在变化性

当前传播媒介主要分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存有偏向，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体育媒体，受国家利益与社会责任的约束，呈现的女性形象较为客观、正面。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体育媒体，以私媒居多，传播渠道丰富，更容易摆脱来自社会、国家和伦理的约束，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表现得更为多元、开放，有时甚至滑向暴露、色情。相对于媒介制度对塑造女性形象的内在性、统一性要求，媒介技术对塑造女性形象表现出外在的、变化性特点。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平台，虽然打破了传统媒体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但并未能从本质上扭转女运动员在媒体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现状[17]。

（三）新闻类型的注意偏向性

按照新闻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新闻可以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硬新闻是指关系国计民生以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新闻，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指导性；软新闻是指富有人情味、知识性、趣味性等的新闻，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和主观性[18]。从两性角度看，体育媒体新闻可细分为男性硬/软新闻、女性硬/软新闻。男/女性硬新闻与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紧密相关，报道需第一时间客观、公正、准确、具体地呈现事件真相，不能隐含性别歧视，更不能放大男性硬新闻而矮化或歧视女性硬新闻。男/女性软新闻通过轻松愉悦的方式传递有趣的知识和体验，发挥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等功能，但不能借此迎合低级趣味。然而，目前体育媒体在两性硬软新闻报道上存在明显的注意偏向。比如，绝大多数男记者承担报道在社会中影响力较大运动项目的硬新闻；而女记者则承担报道在社会中不太有影响力的运动项目及周边的软新闻[19]。体育媒体在硬软新闻的划分上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化特征：男性往往与影响力大的体育项目绑定，划归为“硬新闻”；女性与影响力较小的体育项目则被归入“软新闻”。这种划分不仅遮蔽了女性体育中同样存在的硬新闻，如竞技成绩、国家荣誉等，也忽视了男性体育中同样存在的软新闻，如运动员个人故事、伤病与情感叙事等。

四、体育媒体传播中女性形象对社会的影响

（一）正向社会影响

1. 引导价值认同。体育媒体持续传播女运动员拼搏进取、自律自强的竞技形象，展现女性的力量感、意志力与专业素养，对受众尤其是女性受众，产生身体模仿、价值指引、精神鼓舞等多方面的正向影响。比如，体育媒体呈现女运动员在重复训练中的坚持、在伤病中的隐忍、在低谷中的奋起、在极限中的突破等，使受众在情感共鸣中获得前行的勇气和耐挫的信念。又如，体育媒体展现女运动员健壮的身体、精湛的技能、辉煌的成绩、优良的品质、独特的外表以及鲜明的性格等，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向价值的熏陶。体育媒体通过深入报道女运动员运动场外的社会参与和人生选择等，将其影响力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引导受众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主动探索人生的多元可能。通过以上体育媒体对女运动员的立体化塑造，使正面女性形象从赛场文化的符号上升为社会文化的象征，持续引导受众建立独立、自信、有担当等价值观。

2. 传播健康观念。体育运动作为一项宏观的社会行动和公共政策，可介入女性个体与社会生活以促进女性的全面健康[20]。体育媒体通过呈现运动中的女性健美的体型、进取的状态，有利于指引女性树立健康的审美，且传达给受众这样一个信息：有魅力的女性，身体是健康、协调的，精

神是自信、有活力的；而不是弱不禁风的纤细、极度不协调的身体比例，甚至没有生机与活力的病态，更不是女性永远难以达到的、臆想中的“理想体型”。体育媒体通过塑造女性热爱运动和喜欢体育的形象，传达给受众这样一个信息：运动不是男性的专利，发达的肌肉、健硕的身体也不是男性的专属，而是生命发展的根本需求；只要热爱运动，所有人都可能拥有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神，自主的人生、璀璨的生命。有学者研究证明，ESPN女性频道（ESPNW），始终将女运动员呈现为严肃的竞技者，这一报道策略激发了女性受众的运动参与热情，推动了健康生活方式在女性群体中的传播与内化[21]。

3.提振女性消费。女性作为家庭经济开支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家庭体育消费的主力军。其通过为家庭成员购买体育服饰、体育器材，通过观看体育比赛、参与体育活动培训等，拉动体育消费尤其是女性体育消费的增长，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媒体中传播的正面的女性形象能改善女性体育消费观。这是因为，正面的女性形象塑造了正向的女性体育价值观，女性体育价值观的提升，又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体育消费观的发展。比如“买化妆品保养不如买体育服务出汗”“家务劳动不能替代体育活动”等新观念，能推动女性体育价值观、消费观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助力女性体育消费。

4.促进社会和谐。体育媒体中正面女性形象的展现，不但可以促进体育领域中的性别和谐，还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整体和谐。体育天然具备超越种族、阶层、地域界限的特质，能够形成跨年龄、跨圈层、跨地域的集体情感共鸣，是大众共通的情感载体。公众为女运动员表现出的竞技魅力所折服，为她们的成就而喝彩，这种共享的共同情感，能够减少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营造团结友善的社会氛围。体育媒体塑造的正面女性形象，以媒介叙事重塑社会性别认知，推动包容文化发展，持续消解各类群体隔阂，最终从观念、文化、实践等方面促进社会和谐。

（二）负向社会影响

1.消解女性主体意识。目前，体育媒体将女性客体化的呈现比比皆是，即把女性作为附属、被看的对象来呈现，而不是把女性作为主体来展示。网络体育媒体充斥着大量对女性性感身体的报道，这种行为满足男性凝视目光，将女性作为被看的对象呈现；部分体育媒体为女性打造“美丽神话”：“天鹅颈”“直角肩”“漫画胸”“A4/花瓶腰”“锁骨放硬币”“反手摸肚脐”等，成为广大女性争相学习的目标，这些行为均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有研究表明，过于展现苗条型运动项目（如体操、跳水），往往会使女性观众产生负面的身体形象认知；经常接触被美化、性化的女运动员图像，会导致女性对身体形象产生扭曲认识[22-23]。

2.加大社会性别不平等。性别平等是社会平等的重要内容。扭曲女性形象带来的现实误导，再现并加剧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格格不入。如果体育媒体长期宣扬女性苗条的身体形象，那么就等于无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现实社会中女性参与运动获得了健硕的身体，而不是纤细的身体。这种形象的反差，易使女性受众为了苗条的身形而远离运动的场域。又如，体育媒体呈现的女性角色，以性感球迷、拉拉队队员、男运动员的女友或妻子等角色居多，这传递给受众这样的信息：在体育的世界里，大部分女性作为男性的崇拜者、辅助者的角色而存在。若这种扭曲的女性形象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报道中持续出现，甚至还可能影响国家形象，向世界传递出该国在两性平等议题上仍存在显著不足的信号。

结　语

体育是人类战胜自我、挑战极限，展示生命活力、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女性天然拥有借由体育表达自我，实现身心发展的正当权利。体育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共话语载体，理应塑造、传播更加多元、真实、立体的女性形象，呈现女性体育的独特价值。

当前，体育媒体对女性形象的传播呈现刻板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特征，既存在长期物化、片面化女性等固有问题；又让人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勇敢、独立、专业的女性运动从业者为人们所熟知。体育媒体应当摒弃流量偏见、打破性别对立，推动全社会的性别观念进步，促进体育事业的繁荣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Lameiras A A, Rodríguez-Castro Y. The presence of female athletes and non-athletes on sports media Twitter[J].Feminist Me-

dia Studies,2021,21(6):941-958.
[2]王明枫,李芳,金秋龙.网络媒体冬奥会报道中的女性运动员形象呈现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49(1):74-80.
[3]张敬旺,任彤彤."女排精神"报道框架的构成与演变:基于《人民日报》(1981—2025)的内容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6,38(4):63-71.
[4]新华网.谷爱凌:敢于上场,比纪录更重要[EB/OL].(2026-02-24)[2026-07-20].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07e4b1229024c48c92ac50df8e3de437.
[5]余雷.邓亚萍:打不败的小个子[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
[6]新华网.前温网冠军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兴奋剂检查被禁赛四年[EB/OL].(2026-06-23)[2026-07-20].https://www.news.cn/sports/20260623/c39fe82078de40c09561e35bff30a0e7/c.html.
[7]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格利尔.女太监[M].欧阳昱,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08.
[9]刘坚.媒介文化理论的意义符号阐释[J].社会科学战线,2015(3):176-181.
[10]Romney M,Johnson R.The ball game is for the boys:The visual framing of female athletes on national sports networks' Instagram accounts[J].Communication & Sport,2020,8(6):738-756.
[11]Salido-Fernández J,Venuti M.Construction of the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of athletes in the Spanish sports press from an approach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Círculo de Lingüística Aplicada a la Comunicación,2025(104):183-194.
[12]搜狐体育[EB/OL].(2025-06-05)[2026-07-20].https://sports.sohu.com/?pcm=202.260_1_0.0.0&scm=10001.260_14-201000.0.0.0&spm=smpc.channel_259.block1_78_IMyVE0_1_nav.3.1749107248679RH2IF6p_1082.
[13]Daniels E A,Hood A,LaVoi N M,et al. Sexualized and athletic:viewers' attitudes toward sexualized performance images of female athletes[J].Sex Roles,2021,84(1/2):112-124.
[14]Organista N,Mazur Z,Lenartowicz M. "I can't stand women's sports": the perception of women's sports by polish Sports Journalists[J].Communication & Sport,2021,9(3):372-394.
[15]Yip A.Deuce or advantage?Examining gender bias in online coverage of professional tennis[J].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2018,53(5):517-532.
[16]栾轶玫.媒介形象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0-61.
[17]Adá-Lameiras A,Rodríguez-Castro Y.Analysi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of the Olympic Games on Twitter[J].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2023(3):683-699.
[18]姚琦,周赟.主观还是客观:AI写作对新闻可信度的影响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0):127-135,145.
[19]Schoch L.The gender of sports news: horizontal segreg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female journalists in the Swiss press[J].Communication & Sport,2022,10(4):746-766.
[20]熊欢.我国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策略与路径研究[J].体育学刊,2021,28(3):55-62.
[21]Wolter 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ESPNW: almost 10 years of challeng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J].Communication & Sport,2021,9(5):718-741.
[22]Yan Y,Yin Z Z .When appearance social comparison benefits women's body satisfaction: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viewing lean sports[J].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23,26(6):1062-1083.
[23]Smith L R.What's the best exposure? Examining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athletes and the impact on collegiate athletes' self-objectification[J].Communication & Sport,2016,4(3):282-302.

A Study on Female Image Construction in Sports Media Communication

Song Zongpei, Bai Lia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Female images in sports media communication serve as an important microcosm of gender culture in society,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ports, public gender perceptions, and social value identific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emale images in sports media communic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professional images, role images, positive images, and negative images,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features such as symbo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otherness.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sports media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gender culture but also constrained by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herent stipulations of the media management system, the external vari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the attentional bias of news types, thereby producing influence on society.

Keywords: sports media; female image; image construction; gender communication

说汉字字源,解汉字文化

——评邱龙升《字源识字》

单志鹏[1], 史晓丹[2]

(1.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2.大连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蕴含着殷商先民的智慧、创造力与思维心理,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思想表达和交流工具。追溯汉字形源、阐释汉字文化是了解汉字最重要的手段,邱龙升的《字源识字》从说解汉字字源、了解汉字文化出发,收字合理、解字科学、查检方便,对汉字字源研究、汉字字理讲解、汉字文化沟通具有指导作用。同时,该书以基础教育阶段常用字为中心,依类系联,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对汉字构形学、汉字文化学以及汉字教育、文化普及等研究工作都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字源识字》;字形;字源;汉字文化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6.04.012

引 言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且未曾中断的文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赓续千年,离不开汉字的记录、保存与传续。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0月底考察安阳殷墟时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1]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全民的语言文字治理能力;二是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汉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字形、字音、字义都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厘清古今文字形体演变的历史脉路,科学、系统地做好汉字文化阐释,向大众做好汉字文化普及教育,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讲述中国故事,了解汉字源流,让汉字从学术研究走向大众,让更多人体悟汉字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方式。

邱龙升《字源识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的出版恰逢其时。该书坚守汉字构形分析的历史传统,追溯汉字字源,科学阐释汉字所携带的文化内涵,详解汉字字义,是一部重要的识字教学普及型著作。全书共分为三个主体部分:一是前言;二是14个文化字群;三是附录索引。前言部分简述汉字演变序列的基本阶段、“六书”中的“造字之法”、汉字的“造字意图”、“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学术概念。14个文化字群部分主要将全书2 000①个常用汉字字源单字分为动物、植物、地理山川、天象矿物、人物、人体、手部动

① 据《字源识字》书中前言,2 000个单字中有36个简化字同时对应2个传统楷体字,实际汉字为2 036个。

收稿日期:2026-03-18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基于语篇字料库的宋元新出字研究”(L23CYY002)

作者简介:单志鹏(1993—),男,辽宁东港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汉字学;史晓丹(1993—),女,辽宁沈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汉字学。

作、足部动作、口部动作、衣食、住行、器用、祭祀刑伐、其他等14类，对组内字分别进行溯源和分析。附录索引部分附1988年1月26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以及音序检字表和笔画检字表。该书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分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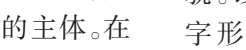
一、收字科学，分类合理

《字源识字》的收字选取合理。它选取通用的2 000个常用字进行字源梳理，常用字以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为蓝本，对其中97.7%的单字完成源流说解。虽然其中有47个单字是表外字，但对具有字根性质的汉字，依旧纳入字源识字的序列当中。识字教学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点之一，首要的是常用字的识字教学。不论是《仓颉篇》《急就篇》《训纂篇》《元尚篇》，抑或是《千字文》《三字经》《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等著作，均是社会重视童蒙识字的重要文献，其中都将社会常用字作为童蒙识字教学的主体。在现代义务教学阶段，对使用频度高的基础字进行系统溯源，可以进一步满足汉字教学的需要。

先贤的童蒙识字教材，便有在篇章中将内容按照名物类别进行分类的传统习惯，比如衣服、植物、地理、职官等。训诂专书《尔雅》也是依照类属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19篇。《说文解字》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更是将汉字的类属理念上升到学理高度，分为540部，“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3]319。《字源识字》将2 000个社会常用字分为动物、植物、地理山川等14个主要类别进行字源探析，将相同意义类别的汉字完整地类聚到了一起，具有鲜明的系统性。

《字源识字》以字频为选字的基本原则，以基础教育阶段常用字为中心，参考了最新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兼顾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原则，对具有字根性质的汉字也进行字源阐释，具有汉字构形的系统观。同时，书中类聚汉字构形中同质的文化属性，分类合理科学，便于按类系联，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实用性。

二、体例清晰，说解精到

《字源识字》的基础工作是要纵向梳理古今汉字形体发展的基本样貌。汉字发生与演变的源头并非都从殷商甲骨文开始的，汉字溯源的重点是要发现其首见字形与时代，随后梳理字形在不同时期的基本样貌，勾连出其谱系。《字源识字》按照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简化字等七个汉字发展的主要文字类型，以线性顺序展示各阶段字形，使读者能够直观了解汉字的首见时期，并可以系统明晰字形发展变化情况，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全书收录字图清晰美观，部分单字会例举古文字的异体字形，部分单字的隶书既例举古隶又收录今隶，做到以历时为主线，兼及共时差异，完整展示了汉字发展演变序列的基本样貌。以“创”字说解为例：  ，在汉字形体演变上，指明甲骨文“办”的形体是在“刃”上加指事符号表示以刀刃伤人的意义特征，篆书在承袭甲骨文形体的基础上，产生了从刀仓声的异体字，同时指出后代规范汉字形体为“创”，异体字“办”“剏”废除不再使用。“创”字字形发展链条直观展现了汉字构形从指事到形声、从繁到简的整体发展趋势。

字源说解部分，首先讲解汉字构形类型与演变概况，同时将造意与实义和谐融入字形说解之中，既分析了汉字字形的造字意图，又说解了造意反映的词义，在每个字的后面，还会附带出能够代表字意的其他词组，便于系统了解汉字在具体词语中的意义信息。例如对“配”字形源的说解，甲金字形象一人跪坐在酒器前，战国文字人形讹作“己”，阐述汉字构形从会意字到形声字的演变规律，同时对《说文》中“配，酒色也”的释义信息进行解读，“配”为酒的颜色，由配酒义引申而来。在说解字义信息后，附带对“配”的其他意义以及词组进行举例，如“配合”“配偶”“调配”“匹配”等。此外，在对汉字说解的过程中，《字源识字》还旁征书证，以《说文解字》《尔雅》《广韵》《诗经》《周礼》《国语》等文献为主，引用简洁。

字头部分，直接在右上角标注汉语拼音，若简化字有对应繁体字时，则标指繁体字，若存在一简对多繁时，则分开说解。如简化字“获”对应捕鸟之“獲”和收割庄稼之“穫”，该书则分组阐释字源，保证字源梳理的科学性。同时，兼顾通俗性。例如，“体”一音“bèn”，《广韵》训为“粗貌，又劣也”，意思是愚、劣，与“體”从人从本的新造会意字“体”是同形字。但该书并未过度梳理说解，而是以现行汉字的形音义为主，避免给大众带来困惑。《字源识字》标识读音、溯源字形、说解字义，贯通古今的同时，兼具科学性和通俗性。

三、解字科学，类聚字群

《字源识字》在汉字的说解方面，坚持字形溯源的科学准确性。汉字是自源文字，从甲骨文到发展至今的楷书，其表意的特质没有发生变化。汉字造字往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首先以“依类象形”的方式构造出一批基础字符。例如，“心”就是描摹出心脏的样子（“  ”），“自”就是鼻子，字形取象就是鼻子的样子（“  ”），“人”就写出侧立的人（“  ”），“犬”是翘起尾巴的狗（“  ”），“豕”就是大肚的猪（“  ”），抓住事物的典型特征，这是对客观世界的初步认知。在基础独体字的基础上，形声相益，孳乳浸多，构造出合体字。例如，“休”，甲骨文作“  ”，会合人倚靠树下休息之意；“企”，甲骨文作“  ”，会人举踵远望之意。《字源识字》在说解每个基础汉字时，都能做到溯源充分、描写充分、阐释充分。例如对“牢”字的说解，通过甲骨文构形分析上“  ”象栏圈之形，“牢”的意思就是圈养牛、马、羊等牲畜的栅栏，同时又指出了隶变后的形体，即“宀”。再如，对“牛”的说解上，除了对“牛”的构形解释之外，还进一步指出了古代有关牛的传统文化。牛在古代农耕文化早期作用显著，标志着生产力的提升。由此类聚了甲骨文中以“牛”作为表意偏旁的“牢”“告”“物”“牡”等字，意义都与牛有直接关联。汉字“依类系联”的类聚方式，形成了以“部首”为核心的字群，可以进一步掌握汉字的造字规律，为深入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提供理论依据。

无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汉字的形体是可以分析的，文化密码是可以被解读的，逐渐聚合凝结成的汉字字类群，直观再现了古人观察世界、认识宇宙的基本状态以及造字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印记。比如，手持一个禾苗即“秉”（  ），手持两个禾苗即“兼”（  ），手逮捕一人即“及”（  ），聚合成“手”字文化字群；以目视树即“相”（  ），跪跽照镜即“监”（  ），举目远眺即“望”（  ），聚合成“目”字文化字群；犬从洞穴窜出即“突”（  ），犬嗅觉发达即“臭”（  ），聚合成“犬”字文化字群。

在宏观上，《字源识字》分为14个字源义类文化群；在内部微观上，坚持以类相从的观念，有着明显的“部首”特点。比如“动物类”中依次形成“牛”“羊”“豕”“犬”“马”等各个小类文化群，“手部动作类”直接类聚了“手”“拳”“掌”“指”等部位名称以及“拿”“摩”“扶”“搏”“择”“抱”“把”“握”“操”“持”“扬”“援”“拾”“拔”“折”“拱”“推”“拘”“捕”“捉”“招”“投”“接”“抚”等手部动作相关汉字。可见，该书坚持以类相从、据形系联的“小学”传统，建立起了清晰的汉字阐释逻辑，有助于读者更加直观地按照意义类别进行汉字学习，构建系统的汉字知识网。

四、挖掘字意，阐释文化

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创造。饶宗颐曾言：“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4]《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5]可见汉字作为文化事项的产生，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人认为，汉字是上古时期圣人创造的，因此，其被赋予了神性特质。“敬惜字纸”（书写汉字的纸张不能随意丢弃与践踏，需要郑重焚烧）这一民俗学事项可证一斑，这也是尊重汉字的文化表现。“在世俗仪式中还能见到文字‘崇拜’的余光。‘福’‘寿’‘喜’这类字在有关的喜庆场合或物件上表现出祥和吉利的愿望和气氛。”[6]可见，汉字中不仅承载了字符所携带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凝聚了古代先民的思维方式、文化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

封建社会，汉字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便成为训治万民的工具，“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3]314，逐渐成为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载体。《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7]820从中可以发现，对汉字文化的阐释，主要集中于对汉字构形的分析。从春秋战国开始，文献典籍中就收录了大量分析汉字的构形。例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7]843《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8]《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9]这说明古代先贤已关注到汉字构形的文化信息对社会、政治、思想发展所发挥的教化功能。

汉字与文化传承关系密切。《字源识字》系统发掘了单个汉字的文化信息，并由此将其置于整个构形系统中阐释文化信息，做到了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说解汉字文化。正确阐释汉字构形、系统梳理汉字字源、类聚汉字字群，不仅可以直观感受汉字文化的魅力，还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制度与文化。例如，甲骨文的“天”，作“  ”，突出人的头部，因此，许慎说“天”就是“颠”，就是人头[3]7，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山海经》中“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10]中“刑天”名字由来。再如，“录”的甲骨文作“  ”，这就是汲水的“辘轳”，民众生活场景跃然眼前。不仅如此，分析汉字字源可以更好地理解成语的意义。“字”，从宀从子，《说文解字》训释作“乳也”[3]3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人及鸟生子曰乳”[11]，“字”具有生育义，由此成语“待字闺中”便知其谓。再如“本”是从“木”，下“一”标指树根，即根本；“末”也是从“木”，上“一”标指树端，当了解汉字字源之后，成语“本末倒置”，便可以畅然明晓。《字源识字》能够将汉字文化融入汉字字形、字理的说解当中，以“祭祀刑伐”类中的“示”字为例，在指明“示”的本义为“神主，受祭祀的死者牌位”后，指出汉字中部分以“示”作为义符的“神”“社”“祖”“祥”等字，大多与神灵或祭祀相关。在具体的阐释中，将单个汉字的信息融入整个“示”部字汉字构形系统中，进一步从汉字的训释当中，体现古代的祭祀文化。王宁先生在《汉字六论》中曾指出：“汉字在记录了汉语的意义同时，必然要负载中华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表述种种文化现象，成为文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揭示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就是要探讨汉字这个文化载体与文化内容的关系。”[12]《字源识字》将古代文化融入汉字说解当中，真正做到了揭示汉字与汉字文化的关系。

五、语言平实，查检方便

《字源识字》吸纳了学界关于字源研究的成果，但在说解过程中并未使用专业术语，在保证字源说解学术性的同时，以应用性为主，每条释文言简意赅、语言平实、通俗易懂，满足绝大部分人使用的需求。诚如作者所言：“在追求通俗性、可读性的同时，也尽量平衡好专业性和学术性，做到了字源说解合理正确，不标新立异，不哗众取宠，也不拘泥旧说，实事求是地分析字形，解释意义。”[13]例如，书中对“双”字的说解，以“一手抓二只鸟”直指“禽鸟二只”，真正做到“学术性”“实用性”“通俗性”的融会贯通。

同时，《字源识字》具有工具书性质，依照严谨的汉字属性和体例进行排列，方便读者查检和使用。在附录索引中配以音序检字表和笔画检字表，收入书中包含繁体字、异体字在内的所有字头，前者按照拼音字母顺序进行排列，多音汉字依正字头主音标注；后者将汉字按照笔画数量由少及多的顺序进行排列，始“一”终“龘”。

综上，《字源识字》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对促进汉字字源分析、字理讲解、汉字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书中存在一些小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书中在对部分汉字的分析中仍然沿用传统的说解。例如，对“视”和“见”差别的阐释为：“视，更侧重看的动作和过程；见，主要强调看的内容和结果。”而关于“视”和“见”的字源差异，裘锡圭先生的《甲骨文中的见与视》早已考证清晰：站立远视即“视”（  ），跪跽而看即“见”（  ）[14]，并且已得到公认，《字源识字》应当吸收裘先生的考证结论。

结　语

《字源识字》以汉字字源梳理和汉字文化阐释为中心，以其专业、科学的字源说解，平实、通俗的语言阐释，服务基础教育和社会大众，是一

部学理性和普及性兼具的著作。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汉字学的研究不仅要秉持学理性、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同时更要为社会服务，要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汉字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体悟汉字包含的文化信息，增强文化认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字源识字》在连接汉字文化与汉字文明传承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新华网.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EB/OL].(2022-10-28)[2026-03-09].https://www.ccps.gov.cn/tpxw/202210/t20221029_155506.shtml.

[2]陈寅恪.陈寅恪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2.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74.

[5]陈光忠.淮南子：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390.

[6]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83.

[7]郭丹，程小青，李彬源.左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郭丹，程小青，李彬源.左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2：1577.

[9]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709.

[10]方韬.山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6：266.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84.

[12]王宁.汉字六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145.

[13]邱龙升.字源识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前言13.

[14]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44-448.

Trac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erpreting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 Review of Qiu Longsheng's *Zi Yuan Shi Zi*

Shan Zhipeng[1], Shi Xiaodan[2]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y not only embody the wisdom, creativity, and cognitive patterns of the ancient people of the Shang Dynasty, but also have served as a medium for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ver millennia. Exploring the graphic orig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means to understanding them. Qiu Longsheng's *Zi Yuan Shi Zi* approaches this task by explaining character origins and interpreting character culture. Featuring rational selection,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and user-friendly indexing, this work holds a significant guiding value for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explanation of character structur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haracter culture. Meanwhile, centering on commonly used characters for basic education, the work groups characters by categories and establishes systematic connections. Balancing academic rigor and accessibility, i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for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Keywords: *Zi Yuan Shi Zi*; character form; character origin;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台州学院智能制造（航空工程）学院机械硕士学位点



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部分研究设备



学院教师获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师资力量

学院现有教职工115人，专任教师83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33人、博士70人，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35人。教师中有浙江省级人才1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人，台州市拔尖人才、台州市“500精英”、台州市“211工程”等人才15人，校级学科和学术带头人4人，有企业实践创新、产品设计经历的“双师双能”教师占80%。学院学术和创新氛围浓厚，教师近年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50余项，与企业科技合作紧密，每年承担企业技术委托项目超过100项，曾获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4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行业协会一、二、三等奖6项，市厅级奖12项。

科研实践平台

学院建有“高性能工业泵与真空装备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浙江省真空装备产业技术联盟”等省级产学研平台6个，以及台州市智能装备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3个。近5年，学位点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6项，浙江省重点研发、省公益技术等省级科研项目12项，获国家级行业协会一、二、三等奖5项，发表SCI论文133篇，授权发明专利128件，承担企业技术委托攻关项目和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254项，年科研经费突破千万元，导师队伍具有较强的科技攻关实力。此外，学位点深度开展教科人一体化培养，与温岭、玉环等地联合共建实践基地，拥有杰克股份、银轮股份、双环传动等20余家行业重点企业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无人机实训场所



学位点研究生参加业内交流活动

中国·台州
TAIZHOU CHINA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韩得满
Editor-in-chief Han Dema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317000
Postcode

网址 https://journal.tzc.edu.cn
The URL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xbb@tzc.edu.cn
E-mail

电话 0576-85137169
Tel.

双月刊
1979年创刊
第48卷 第4期
（总第258期）2026年8月20日出版
Bimonthly Started in 1979
(Issue No. 258) Vol. 48 No. 4 Aug. 2026
封面题字：沙孟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2-3708 / CN 33-1306/Z

定价：12.00元

ISSN 1672-3708